

延安时期毛泽东统战思想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陕西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延安时期毛泽东统战思想

韩泰华　牛桂云　刘宋斌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004号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延安时期毛泽东统战思想
韩泰华　牛桂云　刘宋斌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6插页　283千字
1993年11月第 1 版　1993年11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419－5141－2/G・4427
定　价：13.80元

总　序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组织一套大型的“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的编写工作。

这套丛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前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重点是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建立）这一历史阶段，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进行的艰辛开拓和卓越奉献。

这一历史阶段，即延安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人继井冈山时期之后，政治上更加成熟，组织上更加团结统一，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标志着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政治上开始成熟和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高超能力。后来，“左”倾的错误不仅在中央，而且在许多革命根据地也居于统治地位，中国革命和根据地的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转移。长征，有遵义会议之前和之后的区别。长征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客观的原因，但主要是中央内部“左”倾错误的干扰，不能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独立自主地驾驭中国革命持续胜利发展。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纠正了中央内部的“左”倾错误，进一步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有能力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

胜利。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后，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制定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运用整风学习的方法，教育全党的干部，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实现了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事业的成就更加巨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历史阶段，在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生涯中，是内容最丰富、成就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著作以这一历史阶段写得最多；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最为显著。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总结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划清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界线；制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完整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明确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以及对建设新中国的初步规划；找到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发扬和培育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克服了党内不良的作风，集中地形成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延安精神。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独创性的贡献，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指导理论。

这一历史阶段，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和积累的丰富经验，是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全国人民可以从中多方面地汲取营养，增长智慧，取得借鉴，开拓今日的事业，奔向光辉的未来。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应该把这一历史阶段作为最主要的时期。

“毛泽东在延安”这套丛书的编写，许多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们表示衷心地感谢！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这套丛书的编写出版，只是研究这一历史阶段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工作的开端，愿同各方面有志于此项事业的人士，共同把这项事业开展下去，逐步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以推动今天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3 年 7 月 1 日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彭　真　马文瑞

主　编　杨植霖　强晓初

副主编　李　鉴　吴　木　邵　华
王巨才　赵喜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巨才　王海珠　孙钱章
刘益涛　刘孟泽　杨植霖
李　鉴　吴　木　邵　华
宋　柏　范　平　赵喜民
萧少秋　曾宪新　强晓初
廖广洲

目　　录

绪　论 …… (1)

一、到达陕北前毛泽东的统战思想与实践 …… (15)

（一）毛泽东早期的统战思想 …… (15)

（二）九一八事变前后毛泽东的统战思想及其对党内“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批判 …… (34)

二、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 …… (50)

（一）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论述 …… (50)

（二）毛泽东关于联合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左派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思想 …… (63)

（三）毛泽东与西安事变 …… (84)

（四）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毛泽东提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任务…… (113)

三、抗日战争防御阶段，毛泽东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132)

（一）抗日战争的爆发，毛泽东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及其特点…… (132)
（二）党的洛川会议的召开，毛泽东阐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 (143)
（三）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反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 (154)
四、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全面展开…… (172)
（一）为坚持、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重大发展…… (172)
（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主根据地三三制政权的思想和减租减息政策的制定…… (199)
（三）毛泽东论抗日战争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 (218)
（四）毛泽东关于民族、宗教、华侨等方面的统战思想…… (236)
五、抗日战争反攻阶段，毛泽东关于以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为目标的统一战线思想…… (241)
（一）毛泽东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 (241)
（二）毛泽东同赫尔利会谈民主联合政府问题，《延安协定草案》的提出…… (251)
（三）毛泽东坚持民主联合政府主张，批判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 (264)
（四）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毛泽东对联合政府问题的阐述…… (275)
六、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关于以实现和平民主

为目标的统一战线思想…… (284)
（一）抗战胜利后的复杂局势，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284)
（二）重庆谈判前后毛泽东关于同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广泛联系和合作的统一战线思想…… (294)
（三）战后初期毛泽东在军事问题和经济问题上的统一战线策略思想…… (305)
（四）战后初期毛泽东关于中立美国的统战思想…… (313)
七、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彻底破裂，毛泽东关于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 (319)
（一）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对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关于建立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 (319)
（二）毛泽东关于解放区统一战线的具体政策的论述…… (331)
（三）国统区人民运动的高涨，毛泽东关于运用统战策略发展第二条战线的思想…… (342)
（四）第三条道路的破产，毛泽东关于团结民主党派的统一战线策略…… (351)
八、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继续发展…… (360)
（一）新政协的筹备与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360)
（二）在筹备新政协过程中，毛泽东对统战理论的发展…… (365)
（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统战思想的新发展…… (370)

绪　论

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在整个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为了叙述的方便，本书把毛泽东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即今吴旗县城）至1948年3月过黄河东进为止这段时间称之为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这期间对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工农民主联合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丰富经验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总结，独创性地形成了一整套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它是毛泽东思想在这期间全面发展、达到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统一战线基本理论的继承和运用，又是对这一理论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

统一战线理论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而产生的。它是共产党在争取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斗争中，为了实现一定的任务或目标同其他政党与社会力量所结成的政治联盟。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首先阐明和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他们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就明确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提出了共产党要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其他民主党派联合的思想，提出了像在德国、法国这样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度里，无产阶级要联合自己的天然同

盟军农民的思想。以上所指的是马克思关于统一战线的基本思想。马克思不仅提出了关于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基础，而且在19世纪60年代指导英国无产阶级支持爱尔兰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中，首次使用了“统一战线”这个概念①。

马克思、恩格斯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所初步阐明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原则，概括起来说，主要是：第一，无产阶级应当同其他进步阶级和民主政党团结，去反对一切反动阶级及其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②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坚决支持一切革命、民主和进步的运动，并努力争取同他们的团结和协议，即要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第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首先必须同农民联合。在农民占多数的国度里，要努力争取农民的支持，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最可靠、最广大的天然同盟军。无产阶级能否与其结成革命联盟，是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的革命经验时深刻指出，在革命还没有使农民“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③。但是，如果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

---

① 马克思在1869年11月致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4—28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3页。

的”[1]。马克思把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联盟看得极其重要，他并断言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2]。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指明了无产阶级在同其他阶级的联合中，首先应当坚持同农民联合的原则。第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在同各阶级、各民主政党的联合中，绝不能混淆自己的政治目标，更不能放弃自己的独立自主原则，并对其错误采取批评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提出了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基本原理，而且在实践中为始终坚持这个原理做出了历史贡献。

列宁在俄国领导布尔什维克党进行革命和建设以及指导共产国际开展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中，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斗争，必须“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并把“这种策略贯彻到底”[3]。列宁明确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他指出，“我们俄国人创始的事业，将由英国、法国或德国的无产阶级来巩固；但是我们看到，没有各被压迫殖民地民族劳动群众的援助，首先是东方各民族劳动群众的援助，他们是不能取得胜利的。”[4] 他进一步发展了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理论思想，并十分重视农民问题，强调布尔什维克党的策略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斗争中，不仅重视直接同盟军，而且重视间接同盟军。正如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4页。
(3)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97页。
(4) 《列宁选集》第4卷，第104—105页。

所指出的，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要同这些“大量的同盟者”进行“通融和妥协”，即使“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他认为，在无产阶级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谁要是没有“证明他确实运用这个真理，谁就没有学会帮助革命阶级去进行斗争，使全体劳动人类摆脱剥削者的压榨而获得解放。”①

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中，无产阶级的人数还不多，“他们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② 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为我们党制定了三大法宝，其中第一大法宝就是统一战线。他指出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即为帝国主义者入侵、民族矛盾特别尖锐时，无产阶级甚至可以争取代表另一些帝国主义利益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乃至于开明的地主阶级，参加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参加反帝斗争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223－22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6月第2版（下同），第645页。

或者在这个斗争中保持中立，以孤立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力量。毛泽东全面阐明了统一战线中的两个联盟：一个是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与劳动人民特别是与农民的联盟，这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和首要问题；另一个是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与非劳动人民的联盟。毛泽东强调，在中国，党的统一战线的重要问题，是正确处理与非劳动人民的联盟，即要处理好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他说，“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①]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正确处理了统一战线中上述两个联盟的关系，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同时在理论上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思想。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本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前期，毛泽东思想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全面展开并达到成熟。其中，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亦经过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在这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深刻地全面地总结了从大革命时期到遵义会议之前陈独秀、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所犯的右的和“左”的错误，并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根据新的历史情况，提出和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但在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影响下，由极左转向右倾，极力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5页。

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和步调，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发展。在整个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建立、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毛泽东创造性地制定了一整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方针、政策，从而使毛泽东的统战理论得到系统总结和全面展开并达到成熟。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许多分析和论述，在理论上极大地丰富、充实和逐步完善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他从多方面创造性地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可以说，这是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发展的特殊岁月和高峰期。从此开始，这一理论基本上定型化了。

第一，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不仅必须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而且必须始终争取和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革命领导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由时代和历史条件以及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它是我国革命统一战线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亦是我国革命统一战线的根本特点与优点。从鸦片战争开始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国家的独立和解放，进行了70多年坚持不懈的英勇顽强的斗争。历史经验表明，在中国不仅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等农民斗争，不可能独立地战胜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农民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其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它也不能领导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从而取得革命的真正胜利。1898年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特别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失败就是证明。中国的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阶级。正如毛泽东

所指出的，“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1] 这也就是说，在帝国主义时代，在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情况下，中国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国共产党都是领导核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全国各族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大团结和进步与发展，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还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反复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显然，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与发展，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能否胜利，关键亦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第二，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坚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农业大国，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毛泽东是我们党早期从事农民运动的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不仅自幼生长在农村，很早就非常注重中国的农民问题，熟悉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而且善于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在他看来，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亦是其首要问题。毛泽东强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无产阶级领导革命，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领导农民革命。无产阶级对农民革命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主要标志。无产阶级在革命统一战线中与非劳动人民的联盟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亦将取决于工农联盟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毛泽东无论从理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5页。

论上还是实践上，极为重视农民问题，他认为农民既是无产阶级最坚固、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又是革命主力军，并始终把无产阶级领导权与工农联盟联系起来。他强调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牢固的联盟，才能使革命取得胜利。正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并坚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才使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并胜利地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第三，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坚持革命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争取和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是以坚持革命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为前提的。众所周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而形成的。这就是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共两党。然而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实行的路线是不同的。国民党是执政党，它虽然现在抗战了，但仍然坚持其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制度，推行片面抗战路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它不给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以平等的权利，处处采取限制、削弱和歧视共产党的方针。因此，我们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正如周恩来所说：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就是指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他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他是去联合人家，而不是同化于人家。”①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必须贯彻到诸如政治、思想、组织、军事以及对群众组织的领导等各个方面上。毛泽东早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就明确指出要保持党的阶级的独立性问题。毛泽东针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深刻指出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15页。

们发展，我们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是错误的。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特别强调要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他说：“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在统一战线中，“如果只谈统一性，否认独立性，就是背弃民权主义，不但我们共产党不能同意，任何党派也是不能同意的。”当然，“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但是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在思想上也好，在政治上也好，在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是说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自由权，那就也会破坏对敌的总方针。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同时也是每个友党党员，应该明白的。”① 为此，毛泽东还在会上作了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结论报告。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坚持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纠正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自己始终处于不败之地，并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四，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总政策。这个总政策是毛泽东深刻总结过去右的和“左”的即“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两个极端政策而提出来的。毛泽东认为，在统一战线中，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4—525页。

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但同时又不能不辅助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他强调，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为了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总政策，必须正确处理这两者的关系。

要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必须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程度的联合与不同形式的斗争，特别要制定出又联合又斗争的有区别的具体策略、方针。为此，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始终坚持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将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派别都作了区别。诸如将民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亲日派的大资产阶级与亲英美派的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以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民党内的各个派别加以区别，等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作了上述区分，但其认识尚待深化，其实到抗日战争时期才真正彻底地全面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认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才形成的。关于这个问题，1940 年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毛泽东写给萧向荣的信中说："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①] 毛泽东这里所讲的 1940 年 3 月 11 日的文章，是指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的报告提纲，即《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

---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版，第 161－162 页。

题》。他在这篇文章中，从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上，不但将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作了区别，还将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以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不但对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抗日积极性作了充分肯定，而且还对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了剖析，全面地发展与完善了统一战线的理论与策略。后来，毛泽东在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的修改以及其他一系列文章中，都强调了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并分别不同情况制定了具体的策略。

在统一战线中，最根本的是如何处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从政党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国民党是一个成分复杂的党，其中有顽固派，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在同国民党的又联合又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党和毛泽东制定了一整套的策略原则。在整个延安时期，毛泽东始终坚持我们党同国民党的关系中的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并强调以斗争求团结的思想。毛泽东1940年7月在延安对此曾作过具体分析和精辟的概括，他指出：（1）我们历来是强调团结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抗战派；（2）我们历来是强调斗争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投降派；（3）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4）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抗战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5）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6）不论那一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那一方面都同时斗争，

因为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①]。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强调我们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基点要放在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上，并努力为争取时局的好转而斗争；在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时，必须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敌人进行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还要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以对付反共的两面政策，等等。为了正确地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毛泽东反复强调在我们党内必须注意防止“左”的与右的两种错误倾向，要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在反对某一种错误倾向时，又要注意防止另一种错误倾向的产生，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总结的国共合作的经验，他所提出和阐明的一整套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更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政策，是由过去特别是延安时期的统一战线理论思想发展而来的。正像李维汉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时所说的：“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是我国过去的统一战线的合乎规律的发展。我们要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就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和掌握中国统一战线的特色，并把它们同新时期的历史特点、党中央的政策结合起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灵活地加以运用，使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在实现党和国家的总任务的宏伟事业中，结出更丰硕的成果。”[②]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极为光辉的发展时期。现

---

① 毛泽东1940年7月6日在延安高级干部讨论会上的结论报告。

② 《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668页。

在的情况虽然与过去根本不同了，但毛泽东所阐明的许多策略思想、方法论原则，至今仍闪灼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光辉。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由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通过学习、研究和宣传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可以加深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认识，并进一步提高贯彻执行党的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政策的自觉性。第二，我们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通过学习、研究和宣传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努力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在中国现代史上，国共两党曾进行过两次合作。这两次合作均创造了好局面，即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第二次国共合作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其中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就是全面而深刻地总结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形成的。早在建国后50年代中期，我们党就向台湾当局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建议。特别是自70年代末期以来，我们党又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政策、方针、方法及步骤，并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统战理论，将给后人以启迪，给未来以借鉴，对于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将发挥重要的积极的作用。第三，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在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在这期间，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统一战线在我们国家得到了成功的运用和充分的发展，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统战理论和政策。这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历史上亦是十分突出的。毛泽东的这些理论和政策的形成与实施，把亿万群众最广泛地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保证了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各族人民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通过学习和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统战的基本理论与基本实践，可以更好地了解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和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现在，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毛泽东的统战理论，以利于指导当前的实践，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认真做好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一　到达陕北前毛泽东的统战思想与实践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到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以前，是毛泽东从开始探索团结同盟军和组织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到逐步形成统一战线基本思想的时期。它为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的全面展开并达到成熟奠定了基础。

（一）毛泽东早期的统战思想

1. 民众大联合的思想

早在1919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就在《湘江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在该刊第2、3、4号上连载）。他这篇文章在当时被誉为“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①。

毛泽东纵观古今中外历史经验，特别是从当时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我国的轰轰烈烈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开始看到了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巨大力量，从而在这篇文章中，对民众大联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进行的方式方法等，进行了非常深刻的论述。

毛泽东首先强调在中国这样一个严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

① （北京）《每周评论》第36期，1919年8月24日。

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度里实行民众大联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在文章中开宗明义地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农，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他总结历史经验说："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凡这种联合，于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的时候，最为显著。历来宗教的改革和反抗，学术的改革和反抗，政治的改革和反抗，社会的改革和反抗，两造必都有其大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或真妄为断。"特别是"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会社（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①

在毛泽东看来，民众的大联合，必须以小联合为基础，要首先从小联合入手来进行。只有这样才切实可行，并能达到目的。他认为，要先由许多个小的联合，逐步形成一个大的联合；再由许多个这种大的联合，进而组成一个最大的联合。许多什么诸如"协会"、"同盟"之类的联合组织，就是这样不断建立起来的。"因为共同利益，只限于一小部分人，故所成立的为小联合。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立为大联合。"②"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通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

---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版，第 338—339 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77 页。

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①

毛泽东在做了以上深刻论述和分析后认为，中国的民众大联合必定能够成功。他强调说：“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②

到后来的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等在法国的新民学会诸会友的信中，进一步深化了上述大联合的思想。他指出，“这项（工作）极为紧要，我以为我们七十几个会员，要以至诚恳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随时联络各人接近的同志，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不分男，女，老，少，士，农，工，商，只要他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能得互助互勉之益，无不可与之联络，结为同心。此节和森信中详言，子升亦有提及，我觉得创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人，人人注意及此。”③

《民众的大联合》这篇重要文章，是我们在研究毛泽东早期统战思想时不可忽视的重要论著。他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宏伟的气魄提出和阐述了发动与依靠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亦就是以民众的大联合反对反革命联盟的卓越思想。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及其所阐述的思想，不仅在湖南发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在当时也引起了全国思想界的重视，北京的《每周评论》和四川的《星期日》杂志都曾全文转载，并发表评论

---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41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90、393—394页。
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0页。

予以高度赞扬。我们探讨毛泽东早期的统战思想，也必须注重研究他在该文中所阐发的基本思想。

2. **积极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

从1923年秋到1927年春，毛泽东怀着崇高的共产主义信念，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与富强、为了人民的解放与幸福，以很大的精力从事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事业，并做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1923年4月间，毛泽东就在湖南《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外力、军阀与革命》的文章，认为外力和军阀的势力是很强大的，国内各派革命势力必须联合起来，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并明确指出，“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这说明在中国共产党三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已经明确认识到国共两党合作，推进国民革命向前发展的必要性。

同年6月，毛泽东在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参与制定关于国共合作的决策。这次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基本立场，以及使他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几个革命阶级联盟的可能性。在大会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毛泽东等同志坚持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中所指出的“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

的旗帜”[①] 这一正确的基本主张和原则。党的三大讨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重要文件，正式确定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和形式。它把党的二大提出的民主联合战线的原则和杭州西湖会议提出的“党内合作”的形式又进一步确定下来，从而促进了国共合作的迅速形成。与此同时，大会决定共产党员要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但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根据党的决定，毛泽东以个身分加入了国民党。在当时非常复杂的军事斗争形势下，他受中共中央派遣和国民党总务部的委托，冒着生命危险，赴湖南秘密筹建和发展国民党地方组织。他为在湖南发展国民党地方组织，积极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毛泽东在军阀统治的湖南秘密筹建与发展国民党地方组织，有力地扩大了国共合作的革命影响。

毛泽东以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名义，出席了 1924 年 1 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那时他刚过三十岁生日，就是在这里，他第一次以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人物出现在讲台上，这是一次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国民党领导者参加的会议。他已经为自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赢得一席之地，从下面一件事可以得到证明，他是审查国民党新党章的十九个委员中的三个共产党代表之一。他还经常参加讨论，强调共产党对孙中山主义的坚定支持。”[②] 毛泽东参加章程审查委员会是孙中山亲自指定的。会议讨论章程审查委员会关于中国国民党章程的审查报告时，针对国民党右派提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 2 月版，第 93—94 页。

②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毛泽东》，红旗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版，第 53—54 页。

出的“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所谓跨党案，毛泽东旗帜鲜明地赞同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所表明的态度：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目的，决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为国民革命贡献力量。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与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人，为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为建立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发挥了重大作用。他被选为第一届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标志着中国的国民革命出现了新的局面。国民党一大之后，毛泽东担负着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双重工作任务，在上海除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局的秘书外，还担任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和组织部秘书。他积极贯彻执行国民党一大的精神，帮助国民党整顿和发展组织，努力做宣传舆论工作，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右派的分裂活动，推动国民革命的不断发展。在这期间，毛泽东以很大的精力主持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的工作；为促进平民教育的开展，成立平民教育委员会；参与选派一些优秀干部（其中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到黄埔军校从事政治工作与教学工作；参与签署中共中央第十五号通告，强调“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①

1925 年秋，毛泽东开始代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是年 10 月中下旬，他应邀出席中国国民党广东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指导大会工作。他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参与起草大会宣言，为《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写了《发刊词》。毛泽东在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224 页。

《发刊词》和参与起草的大会宣言中，阐述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号召一切被压迫民众、一切爱国分子都站入国民党领导下的革命战线。强调团结革命战线上的一切势力，向反革命战线进攻，乃是我们唯一的工作。大家要为贯彻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而努力奋斗。为了推动国民革命的开展，坚持国共合作，揭露国民党新老右派的反革命阴谋，毛泽东主编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1926 年 1 月，他出席国民党二大，在会上做了《宣传报告》和《宣传审查委员会决议案》的报告。他在这次大会上继续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他在主持宣传部工作中，为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鸣锣开道，做了大量舆论宣传工作。

1924 年到 1927 年的中国人民大革命运动，是以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其开端的。无论是国民革命军的东征与南伐、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发动，都是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进行的。在这期间，毛泽东始终维护和坚持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并为贯彻执行这一正确政策做了不懈的努力。由于国共合作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迅速掀起了国民革命的高潮。特别是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以后，携手合作发动和进行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国共合作、没有像毛泽东那样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巨大努力，就不会有北伐战争，更不会取得战争的胜利。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

九二五年，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① 他又说：“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是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②

3. 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抵制和批判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随着工农运动的深入发展，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一步勾结起来共同镇压革命。与此同时，在统一战线内部也先后出现了国民党新、老右派，妄图破坏革命、排挤共产党，篡夺革命领导权。这种情况也对党内产生了影响。

在这关键时刻，在中国共产党内产生了两种错误倾向，即第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放弃了革命领导权；第二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上述这两种机会主义错误，都是感到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为反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进攻和党内的“左”右倾错误，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特别是根据自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以来各个阶级、阶层的实际表现，在其所发表的一些重要著作和言论中，从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4页。

理论上初步阐述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前提。

1925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上的答词中郑重申明："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①] 毛泽东填写的上述答词，不仅反映了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的萌芽，而且也充分体现了他的统一战线的思想。

从1925年12月到1927年春天，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以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著作。这些论著进一步发展了《在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上的答词》中申明的基本思想。毛泽东在这些论著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地批判了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了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和国共合作的正确方向。后来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曾说：在大革命时期，"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根据我的研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409页。

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应为《中国农民》——引者注）和《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①

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重要著作，其主旨在于反对党内的“左”右倾错误，解决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同盟军和斗争策略问题。毛泽东阐明了以下主要思想：

第一，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从深刻地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角度，论证了分清敌友的重要性和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必要性。他强调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② 毛泽东在这里讲的“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就是要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把一切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都联合起来，以反对我

---

① （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原名为《红星照耀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年 12 月版，第 135—136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 页。

们共同的敌人，并争取革命斗争的胜利。他认为制定和实行革命统一战线策略是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

第二，关于无产阶级争取统一战线中领导权和独立自主的思想。

毛泽东所阐述的在统一战线内争取和坚持领导权与独立自主的思想，是他自国共合作以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他在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就曾明确指出，国共合作几个月来，中国共产党只注重国民党的组织发展，却忽视了共产党组织的发展与独立性，也忽视了对国民党老右派的斗争。他提醒说，不要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组织混淆起来，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独立的秘密的组织。会后，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职务）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与陈独秀联合签署了《中共中央通告》第15号等文件。毛泽东参与签发的第15号通告，从实质来说，是国共合作初期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文件。该通告的核心思想是坚持共产党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坚决揭露和反对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这说明毛泽东从国共合作一开始就已经初步认识到要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

随着形势的发展，统一战线内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日趋紧张，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重要著作中，阐明党的正确路线和基本主张。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力量，是由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决定的。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著作中，充分论证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思想。毛泽东强调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他们“经

济地位低下”，革命坚决，力量集中，易于联合，因而“特别能战斗”[①]。在统一战线中，其他阶级包括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均不具备工业无产阶级的上述品质和特点，都不能成为领导阶级。显然，只有工业无产阶级才是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毛泽东在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后不久，在1926年9月1日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更加明确地强调指出：“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②]。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已经确立了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领导阶级的思想。

第三，关于农民是统一战线的基本力量的思想。

前边讲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只是说明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的问题，但还必须进一步说明无产阶级如何才能实现对民主革命的领导问题。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取得领导权，即实现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取得对农民的领导。农民是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是统一战线的基本力量。当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都在争取对农民的领导权，因为谁争取到农民，与农民建立起巩固的同盟，谁就将成为统一战线中的领导者。

在国民党新、老右派破坏和攻击工农运动、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者忽视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情况下，毛泽东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取得对农民的领导对巩固与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早在1925年底就对农民作了具体的阶级分析，他指出：雇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146页。

农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半自耕农和贫农属于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1]。而自耕农（即中农），虽然其经济状况有所不同，但都可以参加革命。

毛泽东在对农民作了具体分析的基础上，高度评价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热情地讴歌了正在兴起的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他在1926年9月1日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提出了“农民运动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如果没有农民的发动，没有农民的直接参加斗争，没有农村的大变革，要完成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是不可能的。因此，毛泽东强调：“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2] 他在同年12月20日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重申：“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3] 毛泽东认为，在国民革命中，农民获得解放的程度制约着对其他各阶级、阶层问题的解决，不解决好农民问题其他人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好。他还尖锐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7、9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145页。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148页。

地批评了当时轻视甚至反对农民运动的一些论调，并针对当时做农民运动工作的同志不多的状况，大声疾呼："我们的同志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①

基于上述认识，并为答复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毛泽东到湖南做了32天的考察工作，并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这个报告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像这样专门论述农民运动的论著，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史上尚属罕见。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领导农民运动的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② 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抵制和反对了陈独秀关于种种限制与压制农民革命运动的右倾错误，满腔热情地高度赞扬农民革命斗争的伟大意义，旗帜鲜明地主张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积极领导农民斗争，通过发动、组织、武装农民，建立农民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等问题，以全面取得对农民的领导权。

---

①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年9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146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精装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76页。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同盟军问题的理论上与实践上的正确代表。在这期间，他不仅从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无产阶级如何实现对农民的领导问题，而且用了很大精力从事领导农民运动的工作。

第四，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正确分析。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是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两部分即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并对民族资产阶级作了深刻分析，指出了其两面性的特点以及无产阶级同它的联盟是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系中走过来的。这是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已经根据中国特点和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与政治态度，明确地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即买办阶级和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妥协性的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① 后来，毛泽东对大资产阶级又作了更具体更深刻的分析，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阶级。毛泽东在《在少年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4页。

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上的答词》中，最早把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这个阶级作了具体而深刻的分析。中产阶级包括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小地主以及附属于他们的高等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分析》一文中说：“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① 显然，毛泽东认为这个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是分为左右两翼的。其右翼只要在国民革命迅猛发展的形势下，这种人就很快跑入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队伍里，成为买办阶级的伙伴；其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没有多大关系者，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但这是一个动摇不定的朋友。因此这个阶级不能担当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这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么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么多的买办性，它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而动摇于两者之间。毛泽东这些重要的分析，揭示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为中国共产党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实行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页。

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上述深刻分析并总结了历史经验后，得出结论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1]

但是，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的主要负责人，在制定统一战线政策和在国共合作中虽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却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还在北伐战争的准备阶段，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就在国民党二大上、"中山舰事件"中以及如何对待"整理党务案"问题时，便对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的进攻作了三次重大的妥协与退让。这虽然是在大革命初期与中期党的路线基本正确的情况下发生的，尚未成为全局性的错误，但它对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特别是到大革命的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其主要错误是放弃了无产阶级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中争取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陈独秀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坚决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工农群众运动特别是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陈独秀宁愿抛弃农

---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页。

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被动地位。结果造成了这次革命的失败。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基本地说，是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然而当着革命和战争的紧急关头，首先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同时也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的自动地放弃革命领导权，这次革命战争就失败了。"① 又说：中国共产党"英勇地领导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方面，却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到了失败。"②

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绝非偶然，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当然的领导者，无产阶级只能在资产阶级的统率下协助资产阶级革命，等到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无产阶级再进行自己的社会革命。这就是陈独秀的放弃革命领导权的"二次革命论"的根本指导思想。当然，陈独秀在统一战线中所犯的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除了他本人应负主要责任外，也是与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代表的某些错误指导与支持分不开的。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这次会议彻底结束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毛泽东在会上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6页。

所作的重要发言中，深刻揭露与批评了陈独秀在革命统一战线中自动放弃领导权的严重错误，阐明了必须正确处理国共关系、坚持统一战线领导权和工农群众当家做主人的思想。毛泽东在发言中首先谈了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指的统一战线问题。他说，同国民党的关系，在吾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毛泽东认为，首先是加入的问题，继又发生什么人加入的问题，即产业工人不应加入的问题。实际上不仅对产业工人，即对农民亦都无决心令其加入。他说“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张产业工人也加入，闻湖北亦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未能执行。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①] 显然，毛泽东在这里批评了陈独秀等始终没有决心把国民党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除了谈国共合作问题外，还谈了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党的组织问题。这四个基本问题，也就是他后来反复论述的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以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初步设想。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等问题的上述初步设想，对于在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前期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对于党的统战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23—24页。

（二）九一八事变前后毛泽东的统战思想及其对党内“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批判

由于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先后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破坏了两党的统一战线，加上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错误，招致了革命的失败。在这种形势下，革命营垒发生剧变，中国大资产阶级转到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革命营垒，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革命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这时只剩下了三个即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中国革命从此进入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地领导工农民众进行革命的新时期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此以后，国民党也就不再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变成为一个由代表大地主阶级、大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所以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

由于国共合作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反革命势力大大超过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势力，全国范围的革命潮流已经过去，革命转入低潮。当时的政治形势极其严峻，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这个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看成了仇敌，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这样，背信弃义地向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

一个突然的袭击；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1]

在上述极为严峻的形势下，中国还要不要继续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同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追随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作斗争的同时，还要不要争取其重新回到革命统一战线中来？这是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必须答复的带根本性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从中国的国情和革命实际出发，既反对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割裂开来的“二次革命论”，又反对了在党内反复出现的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企图在民主革命阶段即实行反对民族资本的“左”倾的盲动主义、冒险主义错误。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毛泽东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即警惕右倾错误，又着重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策略，开始提出和实行了若干有关统一战线的理论思想和政策。

第一，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正确方向，反对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强调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区别。

在八七会议前后，中共中央曾一度主张打起“左派国民党”的旗帜，开展“左派国民党”运动，即主张共产党人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国民党内组织在野的反对派，团结下层左派分子，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反动政策。八七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指出：“那种与武汉国民党中央领袖联合的

---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5—1036页。

路，已经走不通”，而“党应当明白以后还是要与国民党联合，但是要与国民党的左派联合，与他们的下层群众联合，与他们的劳动群众的党员，与他的下层的组织联合”。“所谓与左派联盟，实是与革命小资产阶级联盟，我们党应当首先注目于下层群众，如知识阶级、手工工人、店员等，赞助他们的政治经济要求，而时时记着一切和小资产阶级上层领袖的联络，大都是靠不住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① 这表明当时中共中央对少数左派国民党人士采取了团结与争取的政策。但是，随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背叛与屠杀政策的加剧，“国民党”的名义已经被广大工农群众所唾弃。毛泽东在领导中共湖南省委讨论秋收起义的旗帜时，首先抛弃了“国民党”的旗帜，决定用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单独来号召与领导革命，并毅然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鲜艳红旗。鉴于上述情况，中共中央于 1927 年 9 月 19 日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指出最近几个月的经验说明，“中央以前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估计不能实现”，“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重点号是原加的——引者注）② 中共中央从此宣告彻底抛弃国民党的旗帜，领导广大工农民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战争的高潮。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必须正确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党的六大根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见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

---

① 《八七会议》，中共党史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版，第 28 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14 册，第 13 页。

是，中共中央亦是按照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指示精神，采取了反对民族资本的错误政策。自从党的八七会议以来，党中央认为蒋介石集团的叛变就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汪精卫集团的叛变就是整个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叛变，从而提出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同时，还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与上层小资产阶级，这样就严重地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坚持了党的正确方向。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党的六大“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但“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并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①

根据大革命失败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并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8—959页。

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显然，毛泽东认为在现在的民主革命阶段，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同广大工农平民一样，都受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打击，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可能重新回到统一战线中来的。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还说：“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① 这就是说，在当时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只能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尽管民族资产阶级曾经一度附和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势力，但绝不能因此而超越民主革命阶段去执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反民族资本的任务。

第二，提出注意争取中小商人，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正确政策。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报告井冈山斗争情况时就明确提出了要争取中间阶级和中小商人的问题。他认为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期，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好中间阶级的问题。如果对他们处置失当，就不利于革命而利于反革命。他说：“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较地执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7—78页。

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指错误地撤消毛泽东的前委书记的职务——引者注），政策一变。四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厂归工人’的口号，也宣传得很普遍。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近年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豪绅对人民的税捐很重，遂川靖卫团在黄坳到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税，无论什么农产都不能免。我们打掉靖卫团，取消这些税，获得了农民和中小商人全体的拥护。”①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战到赣南、闽西的过程中，多次以红四军的名义发出布告，阐明了对中小商人和知识分子的政策。他们在布告中明确宣布：“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②；“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对“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并号召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要“赞助工农革命，服从工农阶级的指导，齐心一致向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政府三大任务上努力。”“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8页。

②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1929年1月），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第1页。

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① 同年7月，在毛泽东指导下召开的闽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指出：对商业资产阶级的土地，必须没收，但“对大小商店应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即不没收），对反动商人宁可杀人、罚款，不可没收商店”②。由于实行了争取中小商人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赣南、闽西和其他一些根据地都克服了或缓解了敌人经济封锁造成的困难，使根据地内的工商业得到了恢复与发展。

毛泽东在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期间，抵制和反对王明的“左”倾路线，坚持发展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的同时，实行争取中小商人、保护工商业和发展私人经济的政策。他说：“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经济，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的。”③ 我们要“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④

然而，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在推行政治

---

① 《红军第四军军党部布告》（告商人及知识分子，1929年），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第4页。

②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1927—193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1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3—13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0页。

上、军事上的“左”倾路线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实行了许多过左的政策，从而使农村革命根据地内的工商业纷纷倒闭，给军需民用造成了严重困难。毛泽东后来总结这一经验教训时说：“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分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如像我们党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间所犯过的那样（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得税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者，不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目标，而以近视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为目标），是绝对不许重复的。这些错误如果重犯，必然要损害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利益。”①

第三，发动与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巩固与发展工农联盟。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其中农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广大农民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压迫与剥削下，终年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迫切要求翻身得解放和渴望得到土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因此，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他们解决了土地问题，才能巩固与扩大工农联盟。也只有如此，中国革命才能有获得胜利的基本条件。

毛泽东很早就高度重视农民和土地问题。他不仅自幼生长在农村，熟悉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而且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大革命后期分管农村工作，在大革命失败后又率先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对农村群众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特别是他对只有发动农民起来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基础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他在八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5页。

七会议上指出："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1]。根据农民的要求，我们"要根本取消地主制"，也就是说不仅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还要解决小地主的问题。若"不没收小地主土地"，"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了。"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以安民"[2]。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土地革命的基础上，毛泽东先后在1928年12月和1929年4月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同年7月，在毛泽东指导下召开的闽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在一些具体政策上又有了新的改进与发展。随后，为了进一步做好争取与团结农民同盟军的工作，毛泽东先后做了农村社会调查，并写出了调查报告。1930年6月，红四军前委与中共闽西特委在福建省长汀县的南阳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又称南阳会议），决定在分配土地中，除了"抽多补少"之外，还必须实行"抽肥补瘦"的原则。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还必须进一步解决农民梦寐以求的土地所有权问题。1931年2月，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允许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和苏区中央局关于土地所有权归农民的新规定，他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写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信中，指示省苏维埃政府应通令各级政府，要发布告"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理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吃不

---

① 《八七会议》，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58页。
② 《八七会议》，第73页。

完的，任凭自由出卖，得了钱来供给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蓄起来，或改良土地，或经营商业，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也不得勒捐。”“农民一家缺少劳力，田耕不完，或全无劳力一点不能自耕的，准许出租，完租多少，以两边不吃亏为原则，由各处议定。还有红色区域准许自由作生意，赚得钱来均归本人。”[1]毛泽东的这封信标志着从理论与政策上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革命中的地权问题。到这个时候也就初步形成了党的关于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这条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土地革命路线，解决了在土地革命中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根本问题。它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工农联盟，充分调动了农民群众生产劳动和参军、参战支援革命战争的积极性。

第四，九一八事变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旗帜，号召全国人民联合起来，进行“抗日救国”、“抗日反蒋”的斗争，并反对王明“左”倾路线对中间势力的错误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其严重的经济危机，并趁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忙于内部事务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进行“剿共”内战的机会，于1931年9月18日悍然发动了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战争，这就是著名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的反动政策，日本侵略者用了仅仅三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并向中国内地步步逼进。九一八事变的炮声，激起了全国各阶层民众的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

---

[1]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1927—1937年），第389—390页。

这是自大革命失败以来群众革命运动由低潮转向高潮的新起点。这完全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卖国内战政策所激发起来的。全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市民群众无不义愤填膺，高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参加了抗日反蒋运动。国民党及其军队也开始分化，有一批爱国将领不顾蒋介石的阻挠而率部抗击日本侵略军。

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自从它一成立到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前，多次发表宣言、决议、通电等文件，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对内“剿共”、对外不抵抗的政策，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揭露国民党镇压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罪恶行径，号召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抗日救国”、“抗日反蒋”的斗争。在毛泽东签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中郑重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国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向全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宣言：要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才能直接的毫无障碍的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① 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对日宣言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通电》(1932 年 4 月 20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1932 年 10 月 6 日)中均表达了上述思想。

---

① 《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2 月版，第 229 页。

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主席毛泽东与朱德的名义发表《共同抗日宣言》，提出在三项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三项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①

上述宣言，不仅得到了广大民众和国民党军队中广大士兵与下级军官的热烈拥护，而且在国民党统治营垒与高级将领中也产生了强烈反响。其中最突出的就是1933年冬发生的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当时它给予十九路军广大官兵以很大的触动，他们认识到："如今红军敞开大门，我们迫切需要和中共建立密切的关系。"② 早在9月下旬，蔡廷锴就派其秘书长徐名鸿等为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的全权代表到瑞金与红军谈判，要求停战，共同反蒋抗日。毛泽东非常重视谈判工作，对十九路军采取了争取与联合的方针。他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分多次会见十九路军的代表，并以诚相待，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热烈欢迎他们与红军联合，表示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坚决支持他们的抗日反蒋斗争。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具体指导和参与了谈判工作。到10月26日，红军即与第十九路军签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抗日作

---

① 《六大以来》（上），第317—318页。

② 蒋光鼐：《对十九路军与'福建事变'的补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116页。

战协定》。蔡廷锴等领导的十九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影响下，公开打出了抗日反蒋的旗帜，发动了福建事变，这是一件好事。对此，毛泽东曾指出："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主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动。"① 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十九路军内部的种种原因，加上我们党内"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对福建事变采取了"左"倾关门主义的方针，在军事上没有给予必要的援助，致使福建事变迅速失败了。尽管如此，但参与福建事变的许多人后来都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在出卖了我国东北三省、内蒙古和平津之后，又把整个华北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1934 年 6 月 19 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重申在立即停止进攻红色区域、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武装人民的三个条件下，同国内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在中国共产党这一反帝纲领之下团结起来，用民族革命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为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的独立和解放而斗争。

另外，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争取、改造地方农民武装，对争取、团结民主党派，对国统区的士兵运动，对白区的左翼文化运动等方面的工作，亦都予以高度重视。在这些方面的工作，都不同程度的反映了毛泽东关于争取多数的统战思想与实践活动。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46 页。

然而，从九一八事变前后到遵义会议之前这段时间内，王明“左”倾路线正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毛泽东的正确的统战思想与实践活动，并不完全为中共中央所重视或接受。当时，中共中央一方面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揭露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退让的不抵抗政策，组织了武装反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工农红军的“围剿”，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做了许多工作。这些工作都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抗日反蒋斗争，都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则全面推行“左”倾路线，在统一战线工作中采取了关门主义的政策。在统一战线工作上，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者的主要错误为：第一，脱离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错误口号。第二，照搬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人的决议和指示，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提出要兵不要官的下层统一战线的口号。第三，其他诸如对知识分子、肃反、经济、劳动等许多方面和问题上的过左政策。在“左”倾路线统治下，特别严重的是打击中间势力。当时的“左”倾路线在理论上以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观点为指导，无视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国内阶级矛盾的下降的政治形势，尤其是无视国民党营垒内部的分化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反蒋的要求和活动，仍然对中间势力采取打击政策。他们错误地说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进行察绥抗日斗争，是“高挂抗日反蒋旗帜”，“藉着这抗日的招牌，欺骗士兵民众，掩盖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察哈尔、绥远，以便帝国主义准备反苏战争的阴谋”。[1] 中共中央认为蔡廷锴等人发动的福建事变和所建立的福建人民政府，是“一部分以前国民党的领袖及政客们的一种欺骗民

---

[1] 《红色中华》报，第105期。

众的把戏。他们并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为了要维持这个统治，为了阻止和防碍中国民众胜利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因此，“必须集中火力反对一切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派别（社会民主党，AB团，生产党等等）”，① 并提出对福建人民政府采取下列五条措施：即第一，“最坚决揭露‘人民政府’的政纲”，指出其政纲实际上是对帝国主义投降和反对土地革命。第二，利用他们对反日反蒋与民主权利的允诺，发动与武装群众，实现民族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第三，加强党的群众工作，实行下层统一战线。第四，签订协定，推动其反日、反蒋斗争，同时最严厉地“揭露‘人民政府’领袖的反动面目”。第五，号召十九路军士兵“反对反动长官”，“与红军联合与加入红军”。通过这五条措施“使它迅速的走到破产”。②

毛泽东对王明“左”倾路线在统战工作中的上述错误曾作了生动形象而又非常深刻地揭露和讽刺，他说：“左”倾关门主义者认为“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

---

① 《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4年1月18日通过），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第502页。

② 博古：《为着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和将做些什么？》（1934年7月8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演讲会上的演说），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第556页。

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1] 他们推行“左”倾关门主义的结果是给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

毛泽东后来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正是他在到达陕北前的统战思想与实践活动，以及他所总结的“左”倾路线在统战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并根据当时形势变化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4—155页。

二　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

从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抵达陕北后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夕，是由国内战争转向国内和平、由国共两党对抗转向两党合作抗日的逐步过渡时期。在这期间，随着形势的重大变化和在共产国际七大制定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成了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指导思想。

（一）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论述

到1935年华北事变时，国内形势越来越严峻，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正按照其“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预谋的完全灭亡中国的目标，在侵占我国的东北之后，又把侵略魔爪伸向了华北，企图进而占领整个中

国。这年5月，在日本侵略者的武力威胁下，国民党反动政府派亲日分子何应钦为代表，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进行谈判，对日方完全屈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到1935年的下半年，日本又策动了以汉奸、流氓等为基本队伍的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这实际上是企图制造一个包括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热河五省的第二个“满洲国”，以达到鲸吞整个华北的罪恶目的。这样，华北危亡迫在眉睫。正像北平学生在宣言中所指出的：“华北自古是中原之地，现在，眼见华北的主权，也要继东三省热河之后而断送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①] 然而，蒋介石统治集团却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继续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他们一方面疯狂地围追堵截在长征中坚持北上抗日的工农红军，一方面加强对全国人民的法西斯统治，残酷镇压一切抗日民主运动。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全国城乡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

日本帝国主义制定华北事变，加紧了灭亡中国的侵略步伐，它使中日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在这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坚决要求抗日，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乃至中小地主、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等也逐步改变了政治态度。这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又掀起高潮。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如何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斗争，就成了摆在我们党和全国

---

① 《清华救国会一二九告全国民众书》，见《一二九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143页。

人民面前的最紧迫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首先发出了联合起来、抗日救国的伟大号召。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精神，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八一宣言比较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宣言分析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紧迫形势，强调："田中奏折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着着实行，长此下去，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或其他各地，均将逐渐被日寇所吞蚀。我五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与利益的不同，或有任何的敌对行动，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立即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显然，这时党中央的统一战线思想，它所提出的统战口号与主张比过去有很大的不同。该宣言不再局限于过去的工农兵学商的联合，更不是单纯的只要下层统一战线，而是把统一战线扩大为各党各派各行各界各个民族的大联合，它提出了"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的口号，把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中间派别、一切军队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了。并再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宣

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并在国防政府的领导之下，由一切抗日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宣言表示：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者，中国工农红军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①

八一宣言经过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与莫斯科出版的《国际新闻通讯》等报刊，迅速传到国内，并在社会各阶层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1935 年 12 月爆发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就是在其影响下打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帜。这次爱国运动，彻底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吞华北的罪恶阴谋，沉重打击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和发展，由此掀起的全国性的抗日救国的大风暴，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准备了群众条件。这充分显示了党的统战思想的巨大威力。

随着形势的变化，党和毛泽东的统战思想进一步发展。早在 1935 年 1 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就坚决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地位。这次会议为党的统战思想拨正了航向。遵义会议决议，肯定了 1933 年 10 月 26 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与蔡廷锴等人的福建人民政府及第十九路军草签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并批评了博古等人当时既没有帮助十九路军破敌，又使中央红军丧失了粉碎

---

①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2 月版，第 28—33 页。

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宝贵时机。遵义会议的决议中在统一战线政策上虽然还有一些不尽妥当的表述，但它所提出的既要从政治上也要从军事上利用国民党统治营垒内部各派间的矛盾，以利于抗日反蒋的斗争，却是十分必要的。显然，这是以毛泽东为正确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深刻总结的结果。它开始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单纯下层统一战线的教条，把反日反蒋的统一战线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继1935年10月《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11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之后，11月28日又以主席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上述指示信和宣言，是遵义会议统一战线思想的继续。毛泽东与朱德在抗日救国宣言中重申了全国军民总动员，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以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主张。他们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不断的唤醒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曾经派遣了自己的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受尽了艰难困苦，北上抗日。现在形势更加紧迫了，现在正是要求我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大家团结，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对付中国人民公敌的时候。因此我们特向全国人民宣言：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宣言还指出了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的十大纲领，号召全国人民拥护这些主张，并要求一切抗日反蒋者立刻互派代表，协商具

体进行办法。[1]由此可见，党中央和毛泽东这时所颁布的有关抗日统战文件的内容，是遵义会议关于统战思想的进一步发展，都旗帜鲜明地宣告：除了蒋介石等少数顽固派以外，凡是属于愿意抗日的力量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了。

遵义会议虽然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但还没有来得及彻底清算“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之际，除了必须坚决纠正党内的主要的“左”倾错误外，还迫切要求我们党对国内形势作出正确的分析与判断、制定出新形势下的政治路线，以便更好地组织与领导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安定县（即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瓦窑堡会议）。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及其他的中央负责人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刘少奇、邓发、李维汉、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张浩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精神。会上首先讨论军事问题，对此大家意见都比较一致，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同意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猛烈扩大红军，作好对日直接作战的准备，红军的作战方针基本上应是游击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主张红军应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他说：目前形势正处在全国大变动的前夜，有利于革命力量发展、苏区必须向外发展，红军必须迅速得到扩大，并

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33—35页。

详细阐明了东征山西的有利条件及好处。[①]23日，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上述主张，并一致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但是会议在讨论政治问题时却产生了意见分歧，主要是博古仍坚持其“左”倾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坚决反对联合资产阶级，说什么联合资产阶级就是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对“老祖宗不忠”。这种错误观点，与会的多数同志均不赞同。据参加会议的李维汉回忆说：“在会议开始时，博古仍有‘左’倾关门主义的倾向，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和大资产阶级营垒分化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但很快取得了一致。”[②]

与会同志认真讨论了政治问题。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等在讨论中所提出的正确意见，12月25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个决议全面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③]。日本的这种侵略使全中国人民懂得了亡国灭种的大祸临头，掀起了新的民族革命高潮，因而必然变动着国内的阶级关系，一部民族资产阶级、乡村中的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性，它使我国的民族革命战线进一步扩大了。“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

---

①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平装本），第319页。

②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74页。

③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45页。

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① 决议主张以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广泛、最高的组织形式，执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与此同时，要将苏维埃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随之调整了党的各项政策，诸如团结一切小资产阶级，团结与优待一切抗日反蒋的知识分子，优待一切抗日反蒋的白军官兵，联合一切抗日反蒋的个人、团体、政治派别和武装部队等。对富农的财产除了封建剥削部分外，采取保护政策。对民族工商业、民族资产阶级、海外侨胞亦都采取保护的政策，等等。决议还批评了党内长期的在统战工作中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明确指出这是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必须同这种错误作坚决的斗争。同时亦指出要警惕右倾错误的出现。瓦窑堡会议的决议虽然也有不足之处，例如仍把抗日与反蒋并列，从策略上讲应当有所区别，后来毛泽东在 1937 年 1 月 24 日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曾经回顾说：在十二月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时，提出了抗日，就应放弃反蒋。但是这次会议具有重要意义，它为全党正式制定与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使全党的工作及时转向了建立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轨道上来。这个决议，成为全党行动的伟大纲领，它全面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问题。从此以后，建立以

---

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 50—51 页。

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全党的工作中心和奋斗目标。可以说瓦窑堡会议基本上完成或实现了党的策略的转变

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的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根据中央决议在这里充分地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地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时期内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这些是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同时，毛泽东唤起党内注意一九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遵义会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解决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中共中央才获得可能去系统地说明政治策略上的诸问题。“对于这类政治策略上的问题，毛泽东的报告作了最完整的分析”[1]。其主要内容为：

第一，报告首先分析了形势，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毛泽东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中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是坚决要求抗日的。他们是中国革命和抗日救国的基本力量。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他们

---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2—143页。

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这个阶级曾经参加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随后又为这个革命的火焰所吓坏，站到人民的敌人即蒋介石集团那一方面去了。”[1]但是，他们在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下，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因此，在今天的时局下，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即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可能参加抗日斗争，另一部分人可能由动摇而持中立态度。那些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地主买办阶级在民族危亡之秋，其政治态度也可能会发生变化。“那就是：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2]

第二，报告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形势、中国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比，深刻论证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指出，中国的和世界的革命力量现在比过去更加增强了，今后中国革命发展的速度，也一定会比过去快得多。但是“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不是少少一点力量可以成功的，必须聚积雄厚的力量。”“中国革命战争还是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2、149、145、14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8页。

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这就是说，我们党必须联合各种力量，组织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作持久战。因此，“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①

第三，报告深刻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指出它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毛泽东指出，坚持关门主义的策略，就是一种“左”倾幼稚病。因为关门主义的错误是既不承认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又不承认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们从“左”倾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出发，不懂得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侵略行为能够变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阵线，而认为反革命营垒是统一的、固定不变的。因此，他们要打倒“一切”即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豪绅、地主、富农、资本家，甚至黄色工会等，这实际上就孤立了自己而有利于敌人不利于革命。他说：“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咀，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2、153、151页。

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①

第四，报告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阐明了将“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为了更广泛地吸收各阶级、阶层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的人民政权，有必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对于这个重要的改变，毛泽东分析说：“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十大纲领，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② 他又说：“在目前，这个政府的基本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这个政府的成分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③ 由此可见，由“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是一个由广泛人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

第五，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6页。

领导责任。毛泽东指出："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然也会是存在的，发展的。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1] 他提醒全党要牢记1927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导致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说："在今天，这件事起了变化了，坚强的共产党和坚强的红军都已经有了，而且有了红军的根据地。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2] 当然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威迫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是一定要多方使用的，我们是要十分提高警惕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认真地担负起"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3]

党的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上述报告，是继遵义会议纠正"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之后，对"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政治路线的纠正。它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完整理论和政策，武装了全党，给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

1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7页。

3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8页。

（二）毛泽东关于联合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左派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思想

如前所述，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为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的转变准备了条件、提供了保证。遵义会议后，党的策略路线开始转变，即由单纯的下层统一战线向上层统一战线的转变。1935 年 10 月，《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上层统一战线”的策略。该指示信指出，只要愿意抗日反蒋，不管什么阶级、什么党派，“中国共产党都愿意很诚意诚恳的与之统一战线以共同担负起救中国的责任”。[①] 并具体规定了上层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为国民党官员、要人、“高等华人”、名流学者、中上级军官、中央委员、政客、银行家和一部分地主资产阶级，等等。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指出，“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不管他们怎样不同意土地革命与苏维埃制度，在他们对于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采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参加之时，对于反日战线的开展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就离开了总的反革命力量，而扩大了总的革命力量。为达到此目的，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决议强调“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②] 会后，毛泽东在陕北中央党校党的活动分子会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

---

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 23 页。

②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 52、51 页。

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证了实行上层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与可能性。随后，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的统一战线既包括下层又包括上层，它是最广泛的，是全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和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我们这里所讲的地方实力派、国民党左派人士、各阶层爱国民主人士等，都是属于上层统一战线的范围。

在这期间，毛泽东做了许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有力的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1. 为联合抗日救国，积极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

地方实力派实际上是统治阶级当中的一个阶层，它同国民党中央统治集团既有相同的利害关系又有矛盾冲突。它们的情况，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地方实力派近乎中间，或者是中间和顽固之间，在阶级性上是接近反动派的，在反蒋这一点上又起了中间力量的作用”。[①] 毛泽东利用写信、拍电报、发表谈话等方式，向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或派人去做争取他们的工作，积极支持他们的抗日斗争。

第一，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同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后，党和毛泽东积极开展争取张学良、杨虎城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早在 1935 年底，毛泽东就曾给国民党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写信，向他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6 年 1 月，毛泽东等红军将领联名发布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了红军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意愿。他在给东北军爱国将领、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信中说：“日寇侵略益厉，兄我双方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2 月版，第 214 页。

救亡之准备大宜加紧，庶于救亡阵线有最大之裨益。我兄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并重申“蒋氏及国民党果能毅然抛弃过去之政策．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停止进攻红军，开放各派党禁，弟等极愿与之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1]在民族危亡之际，爱国将领张学良愿意联共抗日，同意与中国共产党商谈抗日救国大计。随之，毛泽东、彭德怀于1936年4月6日致电张学良、王以哲，提出了五项双方商谈的问题，即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同年10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又直接给张学良写信，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说：“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并呼吁“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2]

与此同时，党和毛泽东积极开展对杨虎城西北军的争取工作。毛泽东很重视对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多次派人到西北军杨虎城处，建立联络关系。1935年冬，毛泽东派汪锋带着亲笔信去做杨虎城的工作。汪锋临行前，毛泽东对他说，目前政治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杨搞好关系，然后才能有全国的大联合。翌年8月13日，毛泽东在给杨虎城的第十七路

---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49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78—79页。

军总参议杜斌丞的信中说："弟等一再呼吁，要求全国不分党派，一致团结御侮。一年以来成效渐著。虎臣（即杨虎城——引者注）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1] 同日，毛泽东致信杨虎城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感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2] 并派张文彬为红军派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杨虎城对此十分感动，他诚恳地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联合抗日救国的主张，并同红军签订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定。

由于经过党和毛泽东的多方努力，使张学良、杨虎城真正接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他们都逐步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第二，支持粤桂地方实力派发动的"两广事变"。1936 年的上半年，广东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的地方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为名发出通电，组织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并出兵企图争夺南京国民党政权，这就是两广事变。中国共产党对两广事变是支持其抗日要求的。这也就是说，党支持两广地方实力派的北上抗日要求，实际上是通过支持地方实力派逼蒋抗日的行动，以达到联蒋抗日的目的。该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并且发出党内指示，称这一举动是"反动统治

---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36 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38 页。

内一个重要部分转向抗日讨逆的开始”，是“中国人民武装抗日讨逆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开始”。因此，“这一发动带有进步的与革命的性质，可以得到最广大的、最复杂的各种抗日反蒋的力量的拥护，从共产党起一直到帝国主义，可以发展到最广泛的抗日讨逆的统一战线的创立。”同时要求他们以实际行动“使这次发动持久、扩大、充实而转变为全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①]在该事变发展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曾多次派党员到南宁，继续推动桂系与之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并向桂系提出关于和平解决两广事变以利于抗日救国的建议。同年7月陈济棠因部下为蒋介石收买而被迫下台，9月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妥协，至此两广事变遂告平息。但是，两广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而根本解决，他们对蒋仍有戒心。他们指派钱寿康去延安，向中共中央送交一份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方案和李济深写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同年9月22日，毛泽东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写信说：“钱寿康君来，具悉贵方情形及所示协定草案，谋国伟画，无任钦迟。目前，抗日救国大计必须进入具体实际之阶段，敝方八月二十五日致中国国民党书即提出此种实际方案，现托钱君携呈尊览。诸公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他强调“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现贵方与南京之间虽幸免战祸，然西北方面尚未停息。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向南京当局一致呼吁，请其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毛泽东在信中表示“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充分肯定了：“贵我双方之协定”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有“开其端”的重要作

---

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145—146页。

用[1]。同时，他将协定修改后，让钱寿康带回广西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两广地方实力派作统战工作，不仅促进了他们的抗日救国斗争，而且也孤立和打击了蒋介石的内战政策，迫使他改弦更张，不得不在表面上作出“抗日”的姿态。

第三，争取阎锡山、宋哲元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阎锡山是一个长期割据山西的地方实力派。华北事变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咄咄逼人的侵略，使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同时蒋介石亦企图夺取山西这块地盘而与阎的矛盾日趋尖锐。在1936年春，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阻拦。为了照顾大局，保存国防实力，避免内战，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把红军撤回黄河西岸，并于5月5日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又称“五五通电”）。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2]，以实现全国的一致抗日。本来是阎锡山要求蒋介石的军队到山西帮助他阻拦红军东渡黄河的，但蒋介石却为夺取山西地盘，其军队进入山西后不再撤走，这就加剧了蒋阎之间的矛盾冲突。在日军侵略和蒋介石出兵山西的威胁的形势下，阎锡山打出了“守土抗战”的招牌，并有与共产党合作的意向。早在瓦窑堡会议后，为了尽快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就把在山西争取与阎锡山建立联合抗日的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红军的东征，打了许多胜仗，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这对阎锡山震动颇大。我们党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处于困境中的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有可能同我们结成一定的

---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70—71页。

②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141页。

统战关系。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给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阎锡山写信。指出“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又说“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毛泽东在信中还通知阎锡山，红军所俘虏的晋军第六十六师第三九二团郭登瀛团长以下官兵和缴获的武器弹药将全部送回，并表示“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①] 同时还派彭雪枫、周小舟作为党中央代表去山西太原向阎锡山陈述我们党的主张。随后，我们党又向阎锡山提出了合作抗日的条件，即允许我们宣传共产主义，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允许我们在新组织的抗日团体中任用共产党员。阎锡山则提出不能在他的政府和军队中建立与发展共产党员。在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阎锡山为应付时局的危机和维护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愿意实行“抗日”、“联共”的新政策，并同意将中共地下党员发起组织的“抗日救国同盟会”改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牺盟会”实际上是山西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且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华北局对阎锡山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是很成功的。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我们利用阎锡山的在抗日与反共问题上的两面性，既同

---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4—35页。

他合作抗日，又要提高警惕，随时戒备他反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注意发展新派，掌握军政实权，利用牺盟会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领导新派在拥护阎锡山的口号下同旧派作斗争。“我们在帮助阎锡山抗战的过程中，使山西的抗战坚持了，使山西的革命前进了，也使我们前进了。”① 后来，毛泽东不断争取阎锡山，在1936年12月22日，毛泽东再次给阎锡山写信，对他在西安事变中表示反对内战“共维大局”的态度给予赞赏，并希望他能发挥作用尽快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同时希望他把晋军与红军之间的联络关系能尽快建立起来。西安事变后，毛泽东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促使他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哲元是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是驻扎在华北地区平津一带的另一位重要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党纠正了过去的“左”倾错误，积极做宋哲元的统战工作。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给宋哲元写信，向他说明当前形势的严重，希望他及其所部第二十九军和红军建立联合战线，指出“目前日寇图绥甚急，德王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之出现，大抵为时不远，冀政委会汉奸成分之增加，着着向先生进逼。”毛泽东向他申明：“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为了促进二十九军与红军的联合，毛泽东亲自指派张经武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到宋哲元处去做统战与联络工作。毛泽东在信中说：“兹遣张金吾（即张经武）同志前来就教，请予接谈。如荷同意，即以张同志为敝方长驻尊处之联络代表”，并希望宋哲元设法向山东的韩复榘、绥远的傅作义、山西的阎锡

---

① 刘少奇《华北对敌斗争的经验》（1943年3月19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62页。

山说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1] 这对后来宋哲元走上抗日道路起了积极作用。

第四，争取傅作义联共抗日，积极支援其绥远抗战。傅作义时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为了争取他联共抗日，毛泽东先后数次给他写信或派人去同他联络，向他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诚恳表示愿与他联合抗日救国。毛泽东在1936年8月14日致傅作义的信中指出：“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幸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图存，光明渐启。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2] 同年10月25日，毛泽东派彭雪枫带着其亲笔信去见傅作义。傅作义是一位有爱国思想的将军。毛泽东在信中首先称赞他说：“日寇西侵，国难日亟。先生统帅师旅捍卫边疆，今夏小试锋芒，已使敌人退避三舍。观乎报载以死继之之言，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诚属可贺可敬。”接着，毛泽东向他说明：“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今春渡河东进，原以冀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从事各方抗日统一战线之促进。目前情势，日寇侵绥如箭在弦上，华北长江同时告急。但国内统一战线粗有成就，南

---

(1)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41页。
(2)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3页。

京当局亦有转向抗日趋势，红军主力之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如果傅作义及其所部同意红军配合他们的抗战行动，红军“自当以其全力为友军之助，而绝不丝毫妨碍共同抗战之友军及其后方之安全与秩序。”① 傅作义表示接受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所提出的联合抗日主张，并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络关系。在1936年11月初，当日本侵略者与伪军向绥远发动进攻时，傅作义毅然率部抵抗，这就是著名的绥远抗战。12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关于绥远抗战的通电，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立即实行下列五条救国大计，即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准备全国性抗战；停止进攻红军，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立即释放政治犯及上海各爱国领袖；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商讨救国大计。为了实现全国的抗战，通电号召“全中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更亲密的联合起来，督促南京政府实现我们的主张”，并“努力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我们的力量，援助现在绥远坚决斗争着的英勇将士。”通电最后表示，“我们现在向全中国人民宣言，全中国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现已集中完毕，只要给我们以抗日去路，我们准备立刻开赴晋绥前线”，“为保卫晋绥，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血战到底。”② 我们党的号召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有力地支援了傅作义的抗日斗争。

---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2—83页。

②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310—311页。

2. 对国民党左派的统战工作

毛泽东非常重视对国民党左派的争取与团结工作。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肆无忌惮的侵略，国民党的著名的左派领袖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坚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进行了坚决斗争。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特别是自从瓦窑堡会议党正式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后，毛泽东多次分别给国民党左派领袖写信，高度赞扬和评价他们坚持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和坚持联共抗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与对日不抵抗主义的错误政策的斗争精神，并向他们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希望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努力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宋庆龄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在国内外具有很高的威望，是中国当代政坛上的一颗灿烂的明星。她一贯坚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和他的独裁内战政策。早在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宋庆龄立即与国民党的许多左派以及毛泽东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南昌起义时，她与毛泽东等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名义发表宣言，深刻揭露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的罪行。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华北事变后，她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主张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毛泽东1936年9月18日在致宋庆龄的信中，首先对她的“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表示“无限的敬意”。毛泽东说：“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他在信中特别希望宋庆龄能在国难当头、蒋介石当局尚未放弃内战政策的严重时刻发挥更大的作用，说：“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

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并派潘汉年到宋庆龄处“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和“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①。宋庆龄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她在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发表演说，旗帜鲜明地指出：“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些个别人士仍然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她强调：“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② 她还与冯玉祥、何香凝等联名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关于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指出“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并呼吁中国国民党“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③

在这期间，毛泽东还分别致信何香凝、冯玉祥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抗日的主张。何香凝是廖仲恺夫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政治活动家，她早年参加同盟会，随

---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1页。

② 宋庆龄：《实行孙中山的遗嘱》（1937年2月18日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的演说词），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450页。

③ 宋庆龄、冯玉祥等关于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向国民党三中全会的提案，同上书，第451页。

同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她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蒋介石叛变后，她毅然辞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中的一切职务，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何香凝关心着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情况，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她给毛泽东赠送笔、画和《双清词草》（此系1928年上海开明书店影印出版的廖仲恺的诗词集）。毛泽东在写给她的信中，高度赞扬她的革命斗争精神，说："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希望她能为促进国共合作发挥作用，指出现在的时事虽然渐有转机，"但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努力方能达到"①。她同宋庆龄等对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起了重大作用。冯玉祥自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战，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对日本的不抵抗主义。1933年，他与吉鸿昌、方振武等一起，组织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日救国斗争。毛泽东1936年12月5日在给冯玉祥的信中指出："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目前的当务之急莫过于停止内战，"诚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②冯玉祥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赞成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正确主张。随后，他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毛泽东通过上述工作，宣传了党的主张，推动了国共合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3. 积极团结和争取爱国民主人士

党的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分别给蔡元培、许

---

1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06—107页。
2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91页。

德珩、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等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写信，对于他们的爱国行动给予高度评价，并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团结和争取他们，使其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斗争。

蔡元培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救国，并与宋庆龄等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利用其特殊身分，公开打起争取民主，保障民权，营救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革命政治犯的旗帜，同国民党当局进行短兵相接的抗争。毛泽东1936年9月22日给蔡元培写信，希望他以其在全国和学术界的影响，促进抗日救国事业。毛泽东在信中说："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①

许德珩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他同毛泽东有很深的友谊。许德珩于193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与马叙伦、杨秀峰、张申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7页。

府等教授组织“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在1935年年底，他与夫人劳君展得悉毛泽东到达陕北后，便在北平买了30多双布鞋、12块怀表和十几只火腿，委托中共地下党员徐冰、张晓梅设法转送到了陕北。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回想初到陕北时，生活是相当艰苦的。在北平的教授先生知道我们物资缺乏，还给我们送来了火腿、怀表和布鞋，真是令人感动。许德珩对此回忆说，1936年秋末冬初的一天，那时我们都在北平，徐冰、张晓梅夫妇来我家说：现在延安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物资供应困难，日用品和吃的都比较缺乏，尤其没有布鞋穿，大家都穿草鞋，也没有怀表。我和君展听了这些话，当即决定由我们拿钱去买些日用品送给毛泽东。徐冰同志还说：现在正有一辆卡车要去延安，要买东西最好赶快去买。于是君展与张晓梅同志两人就到东安市场买了一些火腿、怀表、布鞋等。东西买好拿走时，晓梅同志问：要不要毛主席的亲笔收条？我们说：这么一点东西还要毛主席亲自开收条？不要，不要！[①] 1936年11月2日，毛泽东接到这些物品后，在给许德珩等人的信中说：“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怀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又说：“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②]

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是当时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

(1) 《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6页。
(2)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4页。

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重要领导人。他们于1936年5月发起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年7月15日，他们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表示同意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提出应当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翌月10日，毛泽东在致章乃器等的一封信中高度评价其抗日救国的思想与活动。他说：“我们最近才从报纸上看到章、陶、邹、沈四位先生，在七月十五日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并且还看到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宣言和纲领。这些文件已经在我们这里引起了极大的同情和兴奋，认为这是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之意见与要求。因此，我特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向你们致送热烈的敬礼！同时并向你们及全国民众申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并愿意在你们这些纲领和要求下面，同你们同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和个人诚意合作与共同奋斗！”他又说：“我们应该这样做，我们现在已经是这样作。我们从来就在行动上忠实于自己所提出的每一个主张。”“目前在各地方的救国运动与救国团体，我们的党员自然是应该参加 的，我们愿意经过这些团体和运动贡献我们所有的力量，并在这些团体中和各党各派及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共同为挽救中华民族的灭亡而奋斗。但我们的党员绝对遵守服从这些团体的章程、纲领和大多数通过的决议。”他在信中最后指出，“我们希望你们及全国一切救国团体派代表来参加苏维埃政府！希望你们介绍与各派进行关于合作的谈判！一切愿意和我们谈判的代表，请直接来苏区，我们保障他们的安全。同时只要有安全保障，我们也愿意派代表到全国各地进

行谈判。”[1] 毛泽东的这封信，在当时的全国救国联合会内油印流传，其影响颇大。在“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之际，毛泽东又给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写信说：“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但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他强调说：“我相信我们最近提出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必为诸位先生所赞同，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民主分子实行真正抗日救国的最好方策。”毛泽东在信中要求他们消除误会与隔阂，为抗日救国做出自己的贡献。他说：“国民党军队继续对于红军的进攻与一切野蛮法令的尚未撤废，到今天仍然把我们与先生们远远地隔离着，彼此不能经常共同讨论与交换抗日救国的具体意见。这也就不得不使诸位先生对于我们今天所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与实际行动，尚有若干的隔阂与误会”[2]。因此，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派潘汉年与他们取得联络，经常交换意见并及时转达我们党对他们的要求与希望。

当时在上海领导抗日爱国运动和全国救国会的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于1936年11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激起了全国各界民众的强烈反对。这就是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此事件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及时领导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并坚决反对南京政府的反动的法西斯高压政策。毛泽东当时即在声明中向蒋介石提出了“释放

---

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195、196、201－202、203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3－64页。

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①]的要求，反对国民党倒行逆施，镇压抗日救国活动的罪恶行径。

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中间势力作为争取的重要政治力量来看待。他曾指出，“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②] 正是由于毛泽东的这种正确认识和所采取的正确政策，通过上层统一战线，使中国共产党非常成功地争取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国民党左派、爱国民主人士等，使他们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方针政策的理解，推动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而斗争。

值得指出的是，要实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和争取抗战胜利的目的，只争取地方实力派还不够，还必须促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转变政策，实现联共抗日。在这期间，特别是华北事变后，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日益严重，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亦出现了某些转变的迹象。为此，中国共产党主张捐弃前嫌，愿同国民党蒋介石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和国民党蒋介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九一八事变到 1935 年底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准备阶段；从 1935 年底到 1936 年底为国共两党通过各种渠道的初步接触阶段；从 1937 年 1 月到同年 9 月为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的直接会谈阶段，先后进行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46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83 页。

了西安、杭州、两次庐山、两次南京的谈判，终于迫使蒋介石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毛泽东对争取蒋介石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极为重视。毛泽东曾经指出，“除了共产党以外，我们当然承认中国其他党派和军队的存在，而其中最强大的是国民党。如果不合作，我们现有的力量要进行抗日战争是不够的。南京必须参加。”[1] 早在1935年底，毛泽东就已经预见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营垒内部有破裂的可能性，后来他又明确指出：“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2]

为了争取蒋介石合作抗日，毛泽东等代表中国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公开发表谈话，指出：“不分党派，不问过去关系，联合全国各方面组织统一战线抗日救亡，这是中国苏维埃政府无时无地不在预备着和一切愿意抗日者进行谈判”，“倘蒋（介石）能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红军与蒋介石间能否成立协定，并不是决定于中国苏维埃政府，而是决定于蒋介石是否决心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在不分党派，不问过去关系，只求一致抗日这一主张上，决不保留任何例外，决不绝

---

[1]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118页。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7页。

人自新之路。但蒋介石依然不肯下抗日决心，则即放出任何空气，中国苏维埃政府亦决不为之眩动”。①

同年3月4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彭德怀致电博古并转曾是中共党员的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当时在中共领导下在上海等地从事秘密工作的董健吾，说：“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且提出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原则：（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和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这些原则和条件，实际上是将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制定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具体化了。毛泽东等在电报中还说“同意我兄（指董健吾）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② 到同年6月，南京政府才以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出面函复共产党，表示赞成“联合抗日”的主张。

同年8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在今天我们应当承认南京是民族运动中一种大的力量。我们的方针过去是愿意同南京谈判，现在仍继续这个方针。他在作会议结论时，同意周恩来所说现在提“抗日必反蒋”不合适的意见。毛泽东指出：我们在苏维埃形式、红军形式、土地政策等方面也应有新的变动③。8月25日，中共中央根据上述会议精神，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对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某些积极的言论表示欢迎，同时

---

① 见1936年1月29日《救国时报》。

② 《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第2页。

③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8月10日。

敦促国民党当局应“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并提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1]。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首次公开阐明关于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主张的正式文件，也是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步骤。在这期间，中共中央研究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以国民党政府为主要对手，提出“请蒋抗日”的方针。“因为南京内部已起变化，民族资产阶级与上层小资产阶级均与以前不同，所以我们重提国共合作，力求停止内战，以便真正抗日，是当前唯一正确方针。”[2] 同年9月1日，中共中央在党内发表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3] 9月8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中说：“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9月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提出了国共两党谈判的八条具体原则和条件[4]。10月15日，毛泽东以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通过苏维埃新闻社发表谈话，指出：“吾人已决定再行恳

---

[1]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235、243页。
[2] 《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第3页。
[3]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251页。
[4]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287—290页。

切申请一切国民革命军部队与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如南京政府诚能顾念国难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苏维埃愿以全力援助，并愿以全国之红军主力为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为了表示停战抗日的诚意，毛泽东在谈话中特提出四项条件，即“第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第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第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听（便）；第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举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援助。”① 同年12月1日，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并率数万红军将士直接给蒋介石写信，要求其“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② 但是，蒋介石无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主张，仍然顽固坚持其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于是便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因此，蒋介石在这个事变中受到历史的惩罚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三）毛泽东与西安事变

党中央和毛泽东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政治影响。在全国范围内，广大军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日益强烈。但蒋介石却继续坚持其“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③ 这时，接受了党的统战思想影响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① 《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第6—7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45页。

在多次进谏蒋介石无效反遭训斥之后，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党中央和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西安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其中，毛泽东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1. 毛泽东对张学良及其率领的东北军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

第一，瓦窑堡会议前后，对张学良及其东北军的团结、争取工作。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经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地到达陕北苏区。当时，蒋介石正调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其他一部分嫡系部队，在西安成立了以张学良为副司令（代总司令职）的“西北剿匪司令部”，对陕甘苏区和红军进行“围剿”。中央红军刚到陕甘苏区就和红十五军团一起参加了反“围剿”战斗。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这次反“围剿”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这次反“围剿”斗争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大力宣传和推动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对敌军的工作中，明显地改变了过去“只要兵不要官”的“左”倾政策，使下层统战与上层统战工作结合起来，并特别注重做敌军军官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时，由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丢掉了自己的家乡。离开东北入关后，先后被蒋介石调到鄂豫皖和陕甘革命根据地“围剿”红军，几年来，他们饱受家破人亡的痛苦，盼望能抗日救国，早日打回老家去。因此，东北军可能比较容易接受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毛泽东针对上述情况，决定当东北军尚不觉悟，进攻红军时，

坚决地予以打击，但打不是目的，而是促使他们觉悟，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1935年11月下旬，毛泽东亲自指挥直罗镇战役，全歼了进攻红军的东北军第一〇九师。当红军继续追击东北军一〇六师时，师长沈克（原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急忙派人来联络谈判。毛泽东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做东北军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11月下旬，他电示罗荣桓等速放俘虏官数名与沈克办交涉，如同意反日反蒋，则允许日后人枪如数退还。翌日又指示，对一〇六师的基本方针是用积极诚恳的态度，争取其反日反蒋。同日，毛泽东给东北军一位军长的信中指出，东北军的真正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蒋介石，东北军以前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退出东北，使东北三千万同胞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俎上肉，已铸成大错。现在又来围攻红军，这是绝对没有出路的，东北军的真正出路，唯有一条就是联合红军，共同反日反蒋。信中与东北军相约：（1）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不打东北军；（2）任何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3）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信中写道：上述各条红军历来均如此宣言如此实行，今再与东北军重言以申明之。深望贵军长顾全民族大义，立即决策。

为了使红军广大指战员都了解党的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明确我们不仅要做下层统战工作，而且也要做上层统战工作，不仅要争取敌军的士兵抗日反蒋，而且也要争取敌军的高级军官抗日反蒋。11月底，毛泽东在干部会上讲到目前形势和任务时，明确指出，要大力开展争取敌军的工作，把争取敌军的工作变为红军和居民的群众运动；要改变对俘虏军官的政策，敌军军官一经缴枪，一概不杀，而且要优待他们，不捆绑（除必要

外），不剥衣、不打骂，经过保卫局和政治部的教育之后放回去，以影响敌军的官长，促使他们与我们联合抗日。至于俘虏的士兵则更要优待，无论战场上打得如何激烈，一经缴枪就要把他们当兄弟对待，严禁报复。稍后，毛泽东再次指示红军将领，对被俘的东北军主力，可以放回去，但在他们回去之前，应该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向他们指出，要抗日就必须与红军合作，而且应该去影响和组织其他的东北军共同抗日。如果不教育就放回去，很可能被他们的上级怀疑，或者重新被驱赶着来攻打红军。

在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下，红军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迅速而有效地开展起来。当时在崂山、榆林桥和直罗镇等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官兵有数千人，经过我们的教育，绝大多数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们有的自愿参加红军；有的愿回东北军做联共抗日政策的义务宣传员。这对东北军走向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积极作用。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积极促进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大力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特别是加强了对张学良及其东北军的高级将领的统一战线工作。

1935 年秋冬，东北军在“围剿”红军时受到重创，实力受到重大损失。这时，蒋介石不但不给张学良以安慰，给东北军以补充，反而削减其经费，取消其被歼灭部队的番号，使张学良受到种种冷遇。恰在这时，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由此掀起了全国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这种形势促使张学良开始认真思考。他感到再继续跟着蒋介石打内战是没有出路的，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东北军的利益是一致的。与共产党有关系的杜重远向他提出了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建议，

这对张学良的思想变化起了积极作用。

1935年1月中旬，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的团长高福元，自愿回东北军说服张学良联共抗日。高福元回到东北军，对王以哲、张学良讲了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张学良表示愿意与中共谈判联合抗日的问题。高福元很快回到陕北苏区，把这次回到东北军面见张学良的经过报告李克农。李克农带他去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毛泽东当即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去与张学良、王以哲会谈。毛泽东对同张学良、王以哲的会谈一事非常重视，并对有关事宜做了多次指示。

毛泽东提出对张学良、王以哲谈判的主要条件是：（一）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二）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三）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征求张、王意见。（四）请张、王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的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均可。在这期间，毛泽东多次致电彭德怀，指示他要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的诚意；向彼方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其前途是很危险的；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帮助其建立稳定局面，等等。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联名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①

毛泽东所做的上述一系列重要工作，为我们党与张学良的会谈奠定了基础。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页。

第二，党中央和毛泽东指派李克农同东北军的王以哲、张学良举行洛川会谈。

这次会谈是1936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举行的。在这期间，李克农作为我方代表同王以哲、张学良先后进行会谈。在此次会谈前的2月19日，毛泽东等致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指出：贵军与敝军之联合抗日号召全国必为蒋介石等所深恨，造谣中伤破坏两方团结，实意中事。希望贵方不为奸人谣言所动，威利所屈，坚持抗日立场，对于蒋之阴谋暗算切实严防。特派李克农赴洛川面谈一切，望接洽。翌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请他通知王以哲，李克农21日启程，25日可到洛川。为了使李克农在谈判时心中更有数，使谈判更加有把握，同日毛泽东等代表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发出了给李克农的训令。训令分析了张学良的思想状况，并指出，我们的策略是：把张学良和蒋介石分开；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同讨卖国贼不可分离；要求停止内战，不阻止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锋队；原则上不让步，交涉不破裂。①

李克农到达洛川后，先见到王以哲及其参谋长赵镇藩。张学良因事要去南京，指示王以哲先与李克农谈些具体事情，重大问题等他回来再谈。王以哲根据张学良的指示，与李克农商谈了关于红军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合作抗日的部分问题。对于谈判的具体问题，李克农致电请示毛泽东。很快，毛泽东等电示李克农，指出谈判的主要内容为：甲、为巩固两军团结一致抗日，确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乙、富甘肤交

---

①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页。

通即可恢复来往，粮服运输及经济通商携带武器与否不必拘束。丙、肤施甘泉两城现驻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维埃区群众凭价购买，为便利肤甘友军起见，请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运送柴粮等物进城，恢复寻常关系。丁、恢复红白区通商关系，红军货物经过富县、洛川等处者，东北军有保护之责，东北军入苏区办货者红军有保护之责。李克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与王以哲等经过几天磋商，达成了五项口头协议，内容与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基本相同。

张学良于3月3日由南京飞回西安，4日又飞抵洛川，与王以哲一起会见李克农。李克农在会谈中及时向张学良、王以哲转达了毛泽东关于合作抗日的意见。张学良对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深表赞成，但对统一战线中不包括蒋介石在内有不同看法，希望中共方面再派出全权代表最好派一负责人如周恩来等再作一次会谈，时间由中共选择。张学良经过这次会谈，在联共抗日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3月5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彭德怀、博古、周恩来致电红一方面军各军、中共陕北、陕甘各省委负责人，说明李克农和王以哲所订立的停战口头协定从3月5日起开始执行，并说明了具体内容，要求通知陕甘两省苏区县委及军区，将本协定各项之意义向延安及富县等靠近六十七军防地附近之县、区党组织、政府、民众团体、红军游击队、赤少队解说明白，并遵照执行。给予六十七军以粮草之便利，对六十七军人员通过马路者表示好意与欢迎，入苏区办货者加以保护。“务使我方军民与六十七军官兵结成亲密之关系，以达到进一步与整个东北军讨论抗日讨卖国贼之目的”。①

---

①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02页。

同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连发三电。一电致王以哲，说关于兄我双方口头协定，敝方已通知红军及地方党政机关以便执行，原文附告，乞兄方亦以相同意义通知延甘富洛等地军政机关，同时实行，并以见告。此次虽系口头协定，但双方均业于抗日救国诚意，弟等相信必比寻常外交上之文字协定更为诚信无欺。另一电致李克农、主要说关于我军与六十七军之口头协定已通知党政军机关，从5日起开始执行。还有一电是致李克农，请他转告王以哲和张学良：我方对南京代表提出五条建议，即：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前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内政与经济实行初步必要之改革。

3月下旬，毛泽东和彭德怀数次致电王以哲、张学良，说明我军为抗日东渡黄河，东北军驻地与陕甘苏区接壤，希望张、王和我们一起保护好抗日后方，倘有捣乱此抗日后方者，愿诸公与敝军联合制止之。

在这种情况下，加强了张学良和王以哲的联共抗日的思想，同时我军与六十七军已经停止战斗，由敌军变成了友军。

第三，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会谈。

延安会谈是3月16日决定的。当时，红军已渡河东征，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央军委负责同志均在山西前线。这一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其他负责同志接见了由洛川赶到石楼来的李克农。李汇报了洛川会谈的情况，说明张学良要求会见党的重要负责人周恩来等的意见。党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张学良有联共抗日的诚意，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肤施（即延安）与张学良会谈。当天，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将这一决定电告王以哲，并说晤面的具体时间

由张学良确定。后来，经往返电商，确定4月间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会谈。

在延安会谈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研究统战工作问题。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在山西隰县大麦郊镇附近的上益千村、石楼县罗村、四江村等地召开会议。会上提出“红军和一切抗日军队集中华北”，以推动全国抗日。会议认为蒋介石有允许与共产党建立联系的可能，没有再提反蒋问题。4月5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开会研究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问题，认为这两支军队都与我们有联系，他们不仅有可能联合反蒋，而且可能联合陕西的其他军队，应该加强对这两支部队的工作，并让他们搞好关系。4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会议肯定了东征以来的胜利，指出根据国民党军队内部已起的变化，我们应提出红军、白军联合共同抗日，联俄联共等口号。会议还因为当时蒋介石已经命令张学良、杨虎城北上进攻红军，会议做了相应的部署。

在周恩来、李克农到延安会谈临行前，毛泽东和彭德怀于4月6日致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通告周、李赴会行期、联络地点和会谈的问题。关于这次会谈问题，该电文说：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1. 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 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3. 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4. 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 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电文还说：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①

参加这次会谈的有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等。周

---

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121页。

恩来和张学良在亲切轻松的气氛中谈得很坦诚、很融洽。此次会谈从4月9日晚至第二天凌晨4时。对谈到的一些基本问题，周恩来在4月10日给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的电报中做了汇报。[1]

毛泽东为了配合这次谈判以及与杨虎城的谈判（与杨接洽的代表于4月7日起程去西安），根据山西前线的实际情况，做了军事部署。在这期间，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说，你们须在一星期内，从永（和）大（宁）吉（县）方面打一缺口，完成与后方交通之任务，这样可予当前外交以实力帮助。

毛泽东收到周恩来会谈结果的电报后，第二天，他就向在前线的林彪和聂荣臻通报了会谈情况。13日，周恩来回到瓦窑堡，刘鼎也随同回来。在瓦窑堡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立即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的报告。会议同意谈判结果，决定派刘鼎回张学良处继续工作。

延安谈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对促使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起了关键作用，而且对我党采取逼蒋抗日政策也有着相当影响。延安会谈以后，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 毛泽东对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毛泽东在大力争取张学良及其东北军的同时，亦积极地争取杨虎城及其第十七路军。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领，担任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主任。他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同中国共产党有过联系，大革命失败后仍与南汉辰等一些共产党员保持着

---

[1] 该电报内容，参见《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09页。

联系。他有一定的进步思想，亦有抗日要求。他所率领的十七路军与通巴的红军也有联络。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认为争取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联共抗日是完全可能的。1935 年正在天津的南汉辰派申伯纯去见杨虎城，告诉他《八一宣言》的内容，建议双方合作。11 月下旬，直罗镇战役刚结束不久，毛泽东就决定派人去西安与杨虎城联络。当时，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曾领导过十七路军中地下党员的工作，对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情况比较了解，毛泽东决定派他代表红军去谈判合作抗日的问题。

11 月底，毛泽东把汪锋调到前线自己的驻地，当面了解情况，分配任务。毛泽东对汪锋讲明全国的政治形势，阐述党的政策，剖析杨虎城及其第十七路军的处境。

毛泽东指出，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敌人阵营也会发生变化甚至分裂。在这种形势下，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我们不能实行那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政策，我们的国内政策要作适当调整。对军阀，我们要向前看，对他们过去反人民的坏事，不要耿耿于怀，更不要看他们生活怎么腐化，只要现在有一点民族气节就好，要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他们。我们要体谅他们的难处，打共产党是蒋介石胁迫让打的，不打，他们就完了。为了争取他们，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暂时让出一些地方。①

关于十七路军的情况，毛泽东说：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第十七路军，都是地方势力，受蒋介石的排斥和打击。蒋介石让他们打红军的目的，是使其两败俱伤。他们与蒋介石的矛盾很深。东北

---

① 吴长翼等编：《丹心素裹》，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版，第 290—291 页。

军有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十七路军要扩大实力，保住地盘。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抗日反蒋的思想。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十七路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目前政治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搞好关系，然后才有全国的大联合。

关于派汪锋去西安同 杨虎城谈判的任务，毛泽东说：“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和。”又说：“对杨虎城部队要有个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①

为了使这次谈判取得成功，毛泽东与彭德怀于12月5日给杨虎城写信。信中指出：杨虎城无论为国家、为民族，还是为保住自己的地盘，都应该反蒋抗日，而不应该攻打红军。当前，“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信的最后说：“如荷同意，即祈派遣代表，前来苏区，商洽一切。”②

为了更好地争取杨虎城，毛泽东还亲自给杜斌丞写信，请他做杨虎城等人的工作。毛泽东在信中说：从汪锋同志处知，先生

---

① 《丹心素裹》，第291—292页。
② 《丹心素裹》，第2页。

不忘情于革命，甚感事也。时至今日，论全国、论西北、论陕西，若舍抗日反蒋则无出路。一切反蒋派别，都应与红军联合起来，共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彻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真实走狗蒋介石。信中指出杨虎城应该与红军联合一致，共同抗日，才有出路。毛泽东在信中还说：我们也愿意联合东北军、邓宝珊部等，闻先生与之有旧，能为先容，曷胜祷企。

这时，我们党还派王世英与杨虎城联系。3 月，汪锋、王世英回到苏区后，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汇报了与杨虎城联系的情况，特别汇报了同杨虎城达成的四项协定。4 月，王世英向杨虎城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联合抗日的意见，杨虎城表示完全同意。从此，杨虎城及其第十七路军逐步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8 月 13 日，毛泽东又亲自给杨虎城写信。他在信中指出："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虚与委蛇的办法，当非先生之本意。"信中说明："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蒋氏向西南求出路，欲保半壁山河，倚靠英国，西北已非注意之重心。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信中强调："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比闻贵部移防肤洛，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线之福。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联

络等事，均嘱张同志趋前商订。”[①] 同日，毛泽东还亲自给杜斌丞写信，让他帮助做杨虎城及西北军各部的统战工作，并派张文彬前去会谈联合抗日事宜。他在信中指出：“值此国难日亟，国贼猖狂，大好河山，危险万状”。“弟等一再呼吁，要求全国不分党派，一致团结御侮。一年以来成效渐著。虎臣（即杨虎城——引者注）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特派张同志（指张文彬——引者注）专谒崇阶，敬祈指示一切。”[②]

由于毛泽东对杨虎城及十七路军做了大量工作，使杨虎城联共抗日的决心越来越坚定，所以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3. 党的逼蒋抗日方针和西北“三位一体”统一战线的形成

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有一个由“反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转变，在1936年2月之前，我们党是提“反日反蒋”口号，从2月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逐步改变了“反蒋”的口号。

4月9日午夜，周恩来和张学良正在延安会谈时，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洛甫（张闻天）说，目前不应发讨蒋令，在此时发布讨蒋令，策略上我们把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我行一致抗日。又说，我们的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这个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

---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8—39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6页。

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我们提议用党与苏维埃政权的名义，立即发出告国人书与通电，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前提下，号召全国人民、蒋家官兵，一致反对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原则，反对拦阻红军抗日与捣乱后方，申明我们愿与一切受蒋氏命令来执行拦阻红军任务之部队订立抗日讨逆协定。此种立场，最能争取蒋介石之政治资本。电文还说，日本正在企图用反共统一战线来击破我们的反日统一战线。此时，我们应紧握反日统一战线去击破反共的统一战线。此电发出后，洛甫立即回电，表示同意。周恩来和张学良会谈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这标志着党的“逼蒋抗日”政策的正式确定。

中国共产党关于逼蒋抗日的政策确定以后，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关系进一步发展，在西北地区形成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特别是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统战局面。毛泽东在许多通信和指示中阐明了西北大联合的思想。

5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刘鼎转张学良，提出再度会谈极为必要，讨论东北军与红军今后行动方针问题，同杨虎城、阎锡山等建立抗日联合战线问题。随后，周恩来即和张学良会商。[①]5月17日，中共中央常委开会研究了中共中央东北军工

---

① 《周恩来年谱》，第308页。

作委员会的工作。5月下旬，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在给朱德等人的电报中说明，党中央已有了一个关于红军与东北军的密切合作，以进到实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同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的计划。并说明，正在为实现这一计划做多方面的工作。6月14日，东北军分三路向瓦窑堡推进，中共中央决定我军撤离瓦窑堡。1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等，说明，中央此次准备迁移与抗战，并不改变加速进行西北大联合的根本大计。中央迁都是为着更易于争取东北军，直接领导和巩固新的更大的西北根据地等。19日电告王以哲，“如果中央军将占领瓦窑堡，我们必先通知你们，由东北军占领。”① 20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原则》强调：“我们的目的是在争取整个东北军，所以我们在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应该是上层的与下层的同时并进。”② 7月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谈到今后的战略任务时说，我们与东北军的关系现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今后，要多做军、师、团三级军官的工作。

张学良因怕联共抗日的事被蒋介石知道，有些事情不便对某些东北军的高级军官说明白，所以遇到若干困难。7月初，他提出要拉一部分部队与红军一起打游击。他请刘鼎向党中央报告。刘鼎当即电告毛泽东、周恩来，说有要事面告党中央。7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安塞接见了刘鼎。刘报告了张学良的要求和东北军的情况。

毛泽东在安塞会上肯定了张学良的进步，说：“张学良竟准备和红军一起干，这是个了不起的转变。”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

---

① 《周恩来年谱》，第313页。

②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174页。

党对东北军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是把它变成红军，是帮助、团结、改造他们，使之变成抗日爱国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因此，我们不赞成张学良拉队伍和红军一起干。而且拉出队伍来，就要散掉一部分，这不是增强而是削弱抗日力量。要对张学良多做解释工作，叫他不要性急，做扎实工作，团结更多的人，把全部东北军都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毛泽东还说：“目前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件，但他决不会坐视东北军打起抗日旗帜的。叫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了，要讲究策略，不要太刺激他，从积蓄全国抗日力量的全局出发，对蒋介石要有更大的耐心，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①

会后，毛泽东还单独找刘鼎谈话，再次强调：“当前，我党对东北军的方针是争取团结，联合抗日，任何不符合这个方针的，都是错误的。”还说：“我们都在做张学良的工作，中央支持你，刘鼎，你这个代表要当好哇！”② 刘鼎回到西安，对张学良谈了安塞会议的情况。传达了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对他的抗日决心和热情的高度评价，说明张当时的任务是团结全体东北军，耐心争取蒋介石和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张学良知道这种情况，受到很大鼓舞，当即表示：“从今以后，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你们党中央既然要我这么办，纵使碰钉子，或者削职为民，乃至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③

随后，张学良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他加强了与红军战略行动的密切配合，加强了与杨虎城及西北军的联系，在东北军内部大力宣传联共抗日，积极争取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

---

① 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版，第 170 页。
② 张魁堂：《张学良传》，第 170--171 页。
③ 张魁堂：《张学良传》，第 171 页。

抗日。但是，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剿共”，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

4. 毛泽东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6 年 10 月，蒋介石刚刚解决了两广事变问题，就不顾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情绪的高涨，决心坚持内战政策，继续进行“剿共”。为了使蒋介石停止内战，10 月 5 日，毛泽东、周恩来致函张学良，说明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建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国民党当局仍游移不决”。当日寇准备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深入陕甘配合东北军等扩大自相残杀的内战。并请张学良转告蒋介石望其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1] 张学良接函后，向蒋介石发电，说他有要事想对蒋面谈。蒋答复说，很快要到陕西来。10 月 22 日，蒋介石飞到西安，亲自布置“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当面劝说蒋介石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蒋的训斥，蒋扬言在“剿灭共匪之前，决不谈抗日”。

这时，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十几个师由南向北大举进攻，由胡宗南率左路军由甘、宁向东，王以哲率东北军为右路军进攻陕北。张学良电令王以哲迟滞行动。但是在蒋的监督下，有许多困难。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领导红军反对国民党的“围剿”时，仍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为了在战斗中不伤害东北军，10 月下旬，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说，王以哲每日都有电来往，张学良与我关系更加密切。东北军对我无恶意，我无论如何困难，不应损伤朋友。又说，惟张学良来电谓其处境困难，王以哲在蒋的飞机监视之下不能久不进，迭电求我让出洪环。现正与张王交涉，

---

[1] 《周恩来年谱》，第 325 页。

我让出洪德城二十里铺之线，彼不占环县曲子之线，如能做到无大不好。

11 月，胡宗南求功心切，孤军深入。11 月 17 日，毛泽东、周恩来电告刘鼎，请他告诉张学良务必命王以哲部在号日（即 20 日）以前，停止于预旺堡附近，否则深为不便。18 日，我军抓住战机，在萌城堡击溃了胡宗南的第一旅。21 日，我军又在山城堡消灭了胡宗南的一旅又两个团，取得了重大胜利，23 日，毛泽东致电刘鼎，让其将这两个战役的胜利向张学良通报。张学良得知后，深受鼓舞。

在反对蒋介石的“围剿”时，我们党仍坚持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11 月 13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对蒋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把握，张学良向蒋说了与红军联合，杨虎城亦讲了，都碰了钉子。然而蒋不一定是始终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化，有可能逼他走到与我们联合。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目标下逼蒋抗日。11 月底，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说，对胡宗南正用一切方法争取之，彼不再进，决不打他。仅在彼向盐池进攻时，准备消灭其一二个师，但打后仍实行统一战线政策。

12 月上旬，蒋介石飞抵西安强令张学良、杨虎城把他们的部队全部的继续开赴陕北“剿共”。就在蒋介石逼迫张、杨“剿共”时，毛泽东继续加强对张、杨的统战工作。12 月 5 日，毛泽东亲自给杨虎城写信，说明数月来双方关系日臻密切，统一战线之基础益固，远大之图基于此也。不久，毛泽东还通过刘鼎向张学良通报了我党与国民党谈判情况，说陈立夫第三次找潘汉年谈，红军留 3 万服从南京，要我让步。我们复称根本不同意。“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这封电文说明了蒋介石坚持内战的顽固态度。

张学良、杨虎城在这种情况下，决心采取“兵谏”的办法逼蒋抗日。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捉了蒋介石，扣留了南京政府在西安的军政要员。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即让刘鼎、应德田给中共中央发电，电文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对西安事变极为重视，为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发出一系列指示，做出重大决策。

当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电复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带仅留少数兵力，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舟各军。拟派周恩来去协商大计。①

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闻樊崧甫部因西安事变以主力急进潼关，请即注意并火速抢占潼关。为了研究西安事变问题，12月13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他的行动，他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是应该拥护的。我们的口号是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②关于对蒋介石的看法，毛泽东在报告中说：“蒋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是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③毛泽东在这里把蒋介石

---

① 《周恩来年谱》，第332—333页。
② 《周恩来传》，第325页。
③ 《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第8页。

放在了中间立场，而没有放在亲日派、降日派中，这包括着有争取的可能性。因为当时是事变刚发生的第二天，各个方面的态度表现得还不很明朗，中共中央对西安及各方面的情况了解得也还不多，所以不可能立即提出一套完全稳妥的解决办法来。会上也有的曾提到过要“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等意见。毛泽东在会上做结论时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途上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他还说：我们应该把抗日援绥（当时傅作义正领导其部队进行绥远抗战）的旗帜举得更明显，在军事上采取防御的方针，不把反蒋与抗日并列。[①] 会议最后决定采取不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中共中央暂时不发表宣言。

同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说“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起义才能确定的发展其胜利。还说：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②] 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事。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并求杨虎城电知延安驻军密为保护。稍后，张学良复电，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恩来兄到后详谈。

为了使张、杨及时了解形势，采取相应的措施，12 月 14 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将领联名致张学良、杨虎城，电文说：（一）全体红军和全苏区人民坚决支持张、杨二将军的革命事业。（二）南京一部分亲日分子接受日本的指示，准备大举进攻西北。（三）我们的行动方针应是：第一，立即组织西北抗日援绥联

---

① 《周恩来传》，第 326 页。

② 《周恩来传》第 333 页。

军，设立西北援绥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主席。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各编为第一、二、三集团军。第二，抗日援绥联军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的地区，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只要打得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局面。第三，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①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还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根据西安事变的形势进行军事布置。中央书记处也给刘少奇发电。电文内容是说明西安事变后各方的反映，我们的对策等，其中讲到："在运动中，我们还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仍应采取督促与推动他们中的抗日派及中间派走向抗日的方针。"②

连日来，张学良和杨虎城加强了对蒋介石的安全保卫工作，13日晚决定把蒋介石安排到更安全的地方——高桂滋公馆。蒋不去，到14日在端纳的劝说下才搬去。张派了他认为最可靠的二营去警卫。为了防备蒋介石收买警卫人员，张又加派了他的亲信副官去照料蒋介石的生活。张杨还采取其他若干措施，如撤销"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杨任正副司令，等。

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强调要停止内战，团结合作，一致抗日，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5位红军将领联名致电国民党国民政府。电文指出西安事变是"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对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鹬蚌相持而渔人伺于其侧，渔人今已高举其网矣。

---

1) 《周恩来年谱》，第334页。

2)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317页。

彼日本者，自闻南京决定讨伐张、杨，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电文呼吁在当前形势下，应该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南京政府诸公“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①

同日，周恩来偕同罗瑞卿、杜理卿、张子华、吴德峰等18人启程赴西安。

这一天，毛泽东致张学良电数封，有的通报胡宗南等军的情况；有的告知华北对西安事变的反映；还有的是向张建议：经过端氏（即端纳）停止南京正在发动之内战。同时，毛泽东还和彭德怀、任弼时等电商了红军的军事行动等问题。

12月16日，南京政府明令讨伐张、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下设东、西两集团军。中央军已因第十七路军冯钦哉部投向南京方面而于13日占领潼关。本日，何应钦下令派飞机轰炸了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在16日这一天，根据军事情况的变化，与彭德怀、任弼时联系布置必要的军事行动。同时他还致电张学良通报国内外对西安事变的反映，提醒其应注意的问题，坚定张的胜利信心。他说：西安事变震动了全世界，除日意指为赤化外，法国、英国取调和态度。国内纷扰已极，江浙金融界出现恐慌现象。望兄坚持底集结部队，提高士气发动民众防止反侧，胜利前途是伟大的。毛泽东对发动民众特别注意，所以他再次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说，为了胜利，一定要注意发动民众，拥护抗日联军，拥护西安起义，反对中央军进攻。另外，毛泽东还加强了对阎锡

---

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319—320页。

山的统战工作。本日，他给阎锡山发了电报，请阎出来阻止南京对西安的进攻。该电报主要说了三件事，即：1. 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自速覆亡。请阎周旋宁陕之间，先停军事行动，再议时局善后。2. 当前急务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于援绥，谓宜举宁方西进之军改道北进。希望在绥察之间共组抗日联军。3. 立即建立无线电联系。这里应特别注意的是，自西安事变后，明确地提出要“和平解决”是第一次。

12 月 17 日，毛泽东为了使周恩来顺利到达西安，再次致电刘鼎并转张学良。同日，毛泽东还就关于集中力量抗战问题给张学良复电。电文说：集中抗战甚妥。并就张学良一直关心的苏联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态度问题说，我们对远方已作几个报告，尚无回报。

本日下午，周恩来到达西安，晚上与张学良一直谈到深夜。当谈到对蒋介石处置问题时，双方商定“保证蒋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保障。”[1] 当晚，周恩来向毛泽东、中共中央电告了他到西安后了解的情况，以及他和张学良商定的对蒋介石处置的办法。这个处置办法，当即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认可。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当时形势，主张在五项条件下，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电文指出：“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故本党认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贵党必须毅然决然立刻实行下列处置：(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

---

[1] 《周恩来年谱》，第 335 页。

(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电文还说：“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①

12月19日，西安事变已经发生六天，国内外各种势力对事变的态度已渐明朗，周恩来到西安后与各方人士接触会谈，对国内外各方面的情况了解得广泛而深入。他及时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更进一步地看清了当时的形势。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做报告和结论。报告着重分析形势发展有两个方面，即当前的严重内战危机的黑暗方面和走向抗日的前途的光明方面。他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他指出：“现在是黑暗与光明的两方面都在发展的，不过光明的被黑暗的所掩盖着。”“西安事变后，对于内战的发生与延长是不利的，我们主要是要消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西安事变的前途，有胜利的前途，有失败的前途。如果在这次战争中，抗日军方面打几个胜仗，将使光明势力更要起来”。② 报告中针对苏联《真理报》对西安事变颠倒是非的评论进行了批评。《真理报》曾说：“毫无疑问，张学良部

---

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321—322页。

② 《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第6页。

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陕西省发生的张学良部兵变紧密相连，这也绝非偶然。”毛泽东在报告中说：“英美的舆论，虽然对捉蒋表示不赞助，然而也不主张讨伐张、杨。苏联《真理报》两次的评论，对西安事变认为等（同）两广事变一样。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变的实质，都有抹杀。”(1)

毛泽东在会上做了结论。他指出：“内战的前途一定要结束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有六种力量：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内部，六是国际。……我们应把六种力量团结，使内战结束。”他还明确指出：“在抗日派和亲日派之间，我们应争取中间的一派。”争取“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2)

这次会议产生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这是给党内的；另一个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这是公开发表的。《指示》讲了西安事变发生前的形势、西安事变的意义、西安事变发展的两个前途及其拥护者；实现第二个前途（结束“剿共”的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早日实现）的基本方针等。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示》明确地说：“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3)《通电》指出：“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本党

(1) 《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第6页。
(2) 《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第10页。
(3)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326—327页。

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会议地址暂定南京。”① 毛泽东说：“现在发表的通电与前次的电是有区别的，更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说公道话。”② 因当时尚未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会上有人主张等共产国际来了指示以后再发表这个通电。结果此通电还是在19日发表了。这说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制定的。

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通报了政治局会议的基本精神。他说：（一）时局正在发展，一方面（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南京右派），极力制造内战局面；另一方面（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中国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国际和平国家），正在结合反对内战，拥护抗日。（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19日主张召集和平会议之通电，乃为团结一切国内、国际左翼及中间势力，为反对内战拥护抗日而斗争。（三）西安抗日军亦应本此共同之总方针而前进。（四）坚决消灭进攻之敌，为执行此总方针之重要手段。（五）红军决向西安集中，配合张杨首先消灭东来之敌。

毛泽东还在当天电示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

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328—329页。

② 《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第10页。

12 月 20 日，在接到共产国际的来电后，毛泽东于当晚 8 点致电周恩来，说明“国际来电如下：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①]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这一电报后，很快将共产国际的意见告诉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共产国际的意见和我党的意见是一致的，与张学良发动“兵谏”的初衷也是吻合的。这封电报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积极作用。

12 月 21 日，毛泽东为了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电示潘汉年向陈立夫提出五项合作抗日要求：（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为了动员各方力量尽快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毛泽东加强了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12 月 22 日，毛泽东致阎锡山信中指出：“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调停手段。至于红军，只要南京停止‘剿共’政策，赞同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并

---

① 《周恩来年谱》，第 337 页。

划定适宜之防地，决不向南京管辖境内进攻。”信中还说：“惟现宁陕相持甚急，如宁方坚持进攻而无丝毫转圜之余地，则红军势难坐视。战争范围扩大，所需于我们协助之处甚多。如何使晋绥陕甘四省亲密团结，联成一气，俾对国事发言更为有力之处，敬祈锡示南针。”[1] 另外，信中还提出应加强双方通讯及交通问题。同日，毛泽东又决定派璩象咸回山西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并给璩写了介绍信。

12 月 22 日，毛泽东致电正在西安参加谈判的周恩来说：时间正在变化中，张杨不会久处孤立地位，但应告张杨及其干部把工作放在困难点上。即使困难奋斗到底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如无此种决心则遇有挫折将不能支持，凡事向好坏两面着想，力争好的前途，同时也准备对付坏的局面。同日，张、杨、周恩来与前来西安的宋子文举行会谈。12 月 24 日，张、杨、周恩来继续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当日晚，周恩来在宋子文、宋美龄陪同下见到蒋介石。在谈判中蒋基本上答应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周恩来都及时将会谈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蒋介石答应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后，就面临着什么时候放他回南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的意见是：在五个条件下，恢复蒋的自由。

12 月 25 日，宋子文坚决请求西安方面信任他，他表示愿负全责去进行谈判中提出的各项事情，要蒋介石、宋美龄当天就离开西安。张学良同意并愿亲自送蒋走。周恩来、杨虎城对谈判的条件同意，但是认为蒋介石走之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明他的态度，并不同意蒋介石 25 日走，也不同意张学良去送。可是，张学良在

---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95—96 页。

25日下午3点多钟，没有告诉任何人，连周恩来也没告知，就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夫妇及宋子文乘车直奔机场。等周恩来得到消息，乘车赶往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

至此，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但是，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就背信弃义，他立即下令将张学良扣押起来，致使这位爱国将领蒙受了千古奇冤。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完全体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同时，这一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毛泽东提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任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的大趋势虽然已定，但要真正达到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目的，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还必须做许多艰苦细致的统战工作。这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动员全党和全国广大民众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抗战而斗争。为此，在全国范围内必须立即停止一切内战，迅速建立起以国共两党 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必须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西安事变中他所答应的诺言与条件。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从多方面推动着国共合作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进程。

第一，西安事变后，毛泽东重申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抗战的基本政治主张。

针对蒋介石1936年12月26日在洛阳发表的歪曲西安事变真相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毛泽东于12月28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指出："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这对于指挥内战、制造分裂、并欲在这次事变中置蒋氏于死地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阴谋，给了一个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失望，已显而易见。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十年错误政策的一种表示。"同时，毛泽东在声明中严厉地批评蒋介石歪曲事实真相，要求蒋介石"不打折扣"地履行自己在西安事变中允诺的条件。这些条件是：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等。毛泽东在声明中严正指出："蒋氏倘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线，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①

尽管蒋介石毫无信义将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扣留，但西安事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46—247页。

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毛泽东说：西安事变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的一个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快慢，决定于各种力量斗争的结果，中间可能发生各种曲折与变化，但总的方向是不会变化的。他强调指出，今天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以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与抗战的开始。党的中心任务是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成为这一运动中心领导的力量。一切工作均应转变，以适应这一总任务。①

为了讨论在新形势下的国共关系和对日关系问题，国民党于1937年2月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为促进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这五项要求是：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如果国民党能够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本着团结御侮的诚意作出下列四项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②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积极响应中共

---

① 张闻天、毛泽东致任弼时电：《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红军的任务》（1937年3月6日）。

②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385—386页。

中央的倡议，为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这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案虽然没有制定出明确的抗日方针，也没有检讨国民党过去政策上的错误，但它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项原则；虽然继续坚持其反共立场，但它所提出的谈判条件与共产党所提出的条件在原则上是接近的。这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由于其内部有亲日派的存在，没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没有具体地解决问题。然而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 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初步转变，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是表现出来了。”①

随后，毛泽东先后发表谈话，强调中国共产党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和准备抗战的主张。他在 1937 年 3 月初与美国进步作家、新闻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反复强调为了实现国共团结、抗日救国，必须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他说：我们老早就是不仅信仰共产主义，而且同时也信仰过三民主义的。不然，我们为什么在 1926 至 1927 年能够加入国民党呢？我们党中央曾经有若干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谢觉哉、董惟健诸位都是。又有许多人曾经是国民革命军的领导干部，我们的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贺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55 页。

龙、林彪、叶剑英、徐向前诸位都是。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对外抗战求得中国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与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现时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毛泽东说，去年8月致国民党书中，已要求他们恢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是最坚决最忠诚地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的。就以我们过去实行土地革命政策而论，亦与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相符合。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并且国民党员中有许多是信仰资本主义的，有许多还信仰无政府主义，有些人则信仰孔子主义、佛教主义、基督主义，无所不有，也无所不包。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中华民国光明灿烂的前途，实基于此。[①] 毛泽东1937年3月10日在致美国著名作家、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信中说："我同史沫得列（即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引者注）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并将此谈话寄给埃德加·斯诺，请他把这个谈话的内容广为"宣播"。[②]

同年5月，毛泽东在同北方青年的谈话中又进一步阐明了以下有关的统战思想：第一，西安事变后内战的局面虽然基本结束，国内和平亦初步实现，但是内战并没有完全停止，全国规模的停止内战还没有完全做到。共产党方面已经指令分散在全国各地的

---

①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毛泽东与史沫特莱谈话》（1937年3月1日），载《救国时报》第150期。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00页。

红军部队停止战争，但国民党军队仍在进剿，如在闽浙赣边区、鄂豫皖边区、湘赣边区、湘鄂赣边区等处的战争仍在继续着。我们正向国民党要求停止对这些地方的进攻。第二，我们愿意和一切同情民族民主革命的国民党分子联合，对于那些不同情的，要做解释工作，使他们明了，使其不妨碍民族民主革命。国民党左派赞成和平，民主抗战的运动，正在发展，他们愿意全国团结、恢复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改造国民党，恢复其革命精神。第三，西安事变后统战工作有了发展，最主要的是国共两党的接近。但是文化界、学生界、舆论界对国民党政府的不信任却依然存在。因为南京政府迄今为止尚未表示其彻底的坚决的转变，许多错误政策仍然保留着，以致引起全国人民的不信任。南京之彻底转变有待于全国人民之继续工作，不要等着他自动转变。统一战线的前途是有希望的，国内必须团结才能达到抗日的目的。第四，现在全国抗日战争虽然还未爆发，但我们要准备抗战。毛泽东强调，不管日本帝国主义哪一天向我们进攻，我们都要即时予以抵抗，我们时刻准备着应付事变，不论战争爆发在何时与何地。但是假如日本暂时不发动对中国大规模的武力进攻，在准备侵略期间，采取较缓和的政策，我们就应利用此机会积极准备抗战的工作。我们提出“准备”，与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具有不同的内容，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先安内后攘外，是无止境的内战，是消耗抗日力量；而我们今天所作的准备是停止内战，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开放人民救国的一切自由，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同时加速完成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抗敌准备工作。中国的抗战是要求得到最后胜利，这个胜利的范围，不限于山海关、不限于东北，还要包括朝鲜、台湾的解放，甚至日本国内人民解放革命的成功。这是我们对准备

抗战的意见。[1]

第二，为了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积极促进国共两党高级领导人的谈判。

为了尽快停止内战，实现国共合作抗日，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国共两党高级领导人先后在南京、西安、杭州、庐山等地举行了多次正式谈判。这些谈判，每次都有着重解决的问题。1937年1月初至2月，中共中央派全权代表潘汉年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宋子文、张冲等在南京就国内和平问题进行谈判，其中心议题是蒋介石在离开西安时口头所答应的"六项协议"，具体谈判内容有：要求南京当局从西安附近撤军、释放张学良将军问题以及红军驻地、红军给养、西路军问题。2月中旬至3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在西安就国共合作问题进行谈判，主要是商议中共地位、红军改编、苏区改制以及西路军问题。由于国共合作问题需要同蒋介石直接谈判才能解决，所以从3月中旬至3月底，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进行谈判。在这次杭州谈判中，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提交了十一条书面意见与六条口头意见。该书面意见中有六条是中国共产党所承认的保证意见，另外五条是向国民党提出的要求。这六条保证意见是：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现红军驻地改为陕甘宁边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取消红军名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委及蒋介石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军饷等统照国军同等待遇；红军中之最精壮者编为三个国防师，计六旅十二团；原

---

[1] 民族解放社刊印：《毛泽东抗战言论全集》。

苏区地方部队改名为地方民团及行政区的保安队等。五条要求是：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剿共”；实现民权，立即释放政治犯，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公开；修改国民大会的组织法与选举法，使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均能选派代表参加，并制定民主宪法；修改国防会议条例，使国防会议成为准备与指导抗战的权力机关，并且共产党亦能参加；制定与实施准备抗战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方案。六点口头声明是：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到4万余人；三个师以上必须设立总部；国民党不能向改编后的红军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红军学校必须办完；红军防地须增加。同年6月上中旬，周恩来与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张冲等在庐山进行多次谈判，其主要内容是：关于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红军改编、边区政府改制、释放政治犯、召开国民大会等诸多问题。

上述谈判，对有些问题有进展，但许多问题尚未解决，随后又继续会谈。在这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参加谈判的中共代表都有重要指示。

蒋介石被释放返回南京后，毛泽东与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于1937年1月5日电告在南京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潘汉年，指示潘与国民党代表宋子文接洽，督促蒋介石、宋子文实践他们在西安答应的六项条件。这六项条件是：“（一）停战撤兵。（二）初步改组南京政府，三个月复彻底改组。（三）释放政治犯，保证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划定防地，供给军费，苏区照旧，共党公开。（五）联俄并与英美合作。（六）西北交张学良

处理。”[1] 同年1月21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又致电潘汉年，指示他在与国民党谈判中要求蒋介石具体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该电报指出：“我们自始即主张和平，决不愿意战争。”“我们可保证，一方面红军只要有适当驻地与相当给养，不但不向白区作任何攻击行为，而且停止打土豪，目前红军已实行此两点；另方面可向西安当局进言，服从蒋先生及南京。杨、于、孙已通电就职并取消临时组织，剩下仅一适当分配防区与张汉卿回陕问题，此须蒋先生从大处着眼，采取适当办法以安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心。蒋能如此，我们当尽一切可能之努力，不但在西北而且在全国范围内赞助蒋先生，团结各方一致对外，但蒋先生须给我们以具体的保证。”“我们要求蒋先生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望与蒋先生商量这种保证问题。”[2] 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同蒋介石、宋子文、张冲等进行会谈。

在这期间，关于与国民党代表张冲谈判的原则问题，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指出：第一，蒋、宋责备我们宣布西安协定无信义，我们回答：南京在蒋回后重新宣布剿共方针，重新向西北进兵，并扣留张学良，破坏协定与破坏信义。第二，同意南京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善后问题，但须在下列条件之下：（一）立即撤兵；（二）立即释放张学良回陕；（三）保证西北协定之实行。第三，两党关系三大纲领已与蒋、宋磋商，并已明白为蒋、宋所承认，细目委潘汉年全权接洽，恩来无去南京之必要，但在撤兵释张改组政府实行后，即证明南京尚愿顾全信义时，可去南京一行。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3] 接着，针对日

---

① 《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第12页。

② 《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第12—13页。

③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358—359页。

本侵略者与亲日派挑拔内战的阴谋，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发表通电，指出："日寇与亲日派之阴谋毒计，凡属国人，已洞若观火。当此危急关头，本党、本政府站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立场，坚决的要求南京当局立刻下令停止军事行动，肃清亲日派，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使国内和平立即实现。""全国人民团体与舆论机关，各武装部队，尤其是蒋先生及当权之国民党诸公与其大多数党员，亟宜一本救国志诚，起而裁制亲日分子，化内战为抗战，此其时矣。"①

同年2月9、10、12日，毛泽东与张闻天三次致电在西安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三次电报指示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关于坚持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的政治立场。电报指出：致三中全会电中所述要求他们实行五条，则我们实行四条，谈判时应同时指出，否则对方将迫我方再让步，实际在我方者是最低条件，勿要再让。且实行尚需时间（说服干部与民众大不易），只有要求对方实行五条，方能避免迫我再让与立即实行。第二，关于军事问题。同意提出红军改编为十二个师、四个军，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饷款如对方允即改号，即照中央军待遇领受，如对方仍欲缓改，则每月接济至少80至100万；如有国防委员会之组织，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如暂时无此种组织，红军亦需要驻京代表参与国防准备；南方各省游击队可改为民团，但绝不宜调至陕北；要扩大和划定我军防地；拒绝政训员、联络员的设置。第三，关于党的问题和政治问题。我们提出党的问题求得不逮捕、不破坏组织即可，红军中组织领导不变；我们党要

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363—364页。

参加各党各派之代表会议和国民大会。

同年3月5日，毛泽东与张闻天代表党中央就谈判中的军事、党与边区问题致电周恩来。该电报具体内容为：总部直属队即以前后方两特务团组成，人数约1500，旅长人选等征求彭德怀、任弼时意见后再复；与我们发表宣言同时，要求国民党亦发表宣言形式之公开文件，承认我们党之合法地位；行政区设主席与委员制为宜，经费每个月30万；周恩来、叶剑英两人参加国防会议，毛泽东不参加，林伯渠为特区主席，也参加经委。[①]同月10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次会谈的情况后，党中央指示其向国民党方面申明：国民党所提出的条件“完全不能承认”，要求同蒋介石直接面谈。

同年5月24日，毛泽东等致电周恩来，指示周恩来在会见蒋介石时须谈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关于纲领及苏区、红军、共犯、党报、经费、防地等问题；第二方面，关于对日、对英、对苏外交、国防军事、国防经济及国民大会、人民自由、政治犯等问题。并要求周恩来根据中央上述指示拟定出具体意见电告中央。5月25日，毛泽东等在接到周恩来的意见后，立即复电，除了同意周恩来来电内容以外，特提出如下与国民党谈判的要点：

“（甲）向蒋提出并询问蒋之方针者：

（一）保卫绥远、青岛，收复冀东、察北，反对走私、反对经济提携，英日伦敦谈判等对日问题；

（二）联俄问题；

（三）太平洋集体安全问题；

（四）国防军事财政之准备；

---

① 《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第15—16页。

（五）汉奸亲日派退出政府问题。

（乙）须力争办到者：

（一）特区政府委员九人名单为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

（二）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但准备让步设总指挥部），至少四个师，一师长林彪，二师长贺龙，三师长徐向前，四师长刘伯承，先发表上述六人，余俟后呈请委任。为加强抗日政治教育，政治部制度照旧（但准备让步设政训处）。

（三）取缔北平陶希圣、杨立奎等凶殴学生，西安扣留解放报及书籍，上海逮捕共党，文化建设杂志，破坏两党合作等行为。

（四）取缔利用土匪、流氓、会党破坏红军、苏区之行为。

（五）增加红军防地。”①

在这期间，国民党派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简称“中央考察团”）到延安和红军驻地考察，了解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各方面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态度与要求等。该考察团共21人，在涂思宗、萧致平率领下于1937年5月29日下午5时抵达延安。中国共产党为他们举行了欢迎晚会。晚会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毛泽东致欢迎词，阐述国共合作的重大意义，并表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诚意。毛泽东说：今天这个欢迎会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为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是由国共两党干起的，现在比那个时候更不同了，民族比那时更危险。两党一致团结，在今天比以前合作的意义与作用是更增加了。过去十年两党没有团结，现

① 《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第17页。

在情形变了，如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中央考察团此来，使两党团结进入新的阶段，其意义是很重大的。毛泽东在致词中批评了两种错误观点，即一种是有人怀疑两党合作是否有诚意，对双方都怀疑。他说，今天的事实，考察团之此来，就说明了这一点：共产党方面在两年来政治上的表示，如文件、宣言、谈判等，都是为着两党团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表示两方面的和平政策，不怕敌人挑拔，始终没有动摇。过去已证明了这一点，以后如何呢？要看以后工作来证明。在以后，应巩固两党的团结，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若干必须解决的矛盾（不利于团结的矛盾），结成坚固团体去对付我们的敌人，以求得民族独立、民主权利、民生幸福的实现。另一种是有人怀疑两党合作双方都有阴谋诡计，都是临时的策略。毛泽东说，这也要看过去我们的工作到底是破坏还是团结。我想在西安事变以后，事实更加告诉了大家，是向着团结方面发展的。这主要的要看以后，同时，有人怀疑两党没有长期合作的诚意，我想这都是一种猜想，我们是希望两党长期地合作下去，并且努力向着这个目标干。他强调说，共产党方面诚意地欢迎中央考察团，丝毫没有假意。今天这个欢迎会，就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充分表现。毛泽东还就共产党过去执行革命三民主义的情况，以及共产主义作了详尽的说明。毛泽东说：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所写的文章，是为着民族解放，是为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今后要写的文章，一个人是写不成的。写民族独立固然是一篇大文章，写由封建专制转入民权自由更是一篇长文章，民生幸福的一篇自然是更大更长的文章。我们希望的是使两党合作达到新的阶段，这不是短期的合作，是长期的问题，这篇文章怎样写，共产党的笔已经在手里了。5 月 30 日，毛泽东在欢迎中央考察团的群众大会上作报告，提出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现

在中国最中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打日本救中国。他还就某些人怀疑国共两党是否诚意合作等问题，作了详细解释。显然，中央考察团到延安考察，表明国共合作的形势已经越来越明朗化了。

第三，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在国内和平基本实现的新形势下，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为了及时地规定新阶段的任务和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以实现全国人民迫切要求的对日抗战，1937 年四五月间党在延安先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

4 月初，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国共合作及党的政策的转变问题。会议指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国民党基本国策转变的开始，从此内战已经结束，党为争取和平的任务已经实现，革命进入新的阶段。这时，党的中心任务已由争取和平转变为争取民主。会议强调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以后，我们党必须坚持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同时应将过去武装斗争的两个政权对立的斗争方式转变为和平民主斗争的方式。这次会议为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做了准备。

5 月 2 日至 14 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苏区、白区和红军中党的正式代表 218 人，列席者 64 人。这是一次出席人数众多，代表范围广泛、意义重大的会议。毛泽东分别于 5 月 3 日和 7 日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总结。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和总结，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自 1935 年 12 月瓦窑堡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取得的伟大

成就，深刻分析了由过去国共两党对立到走向合作的新形势．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新任务，以及实现新任务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号召全党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在报告和结论中提出、论述的重要问题主要是：

首先，毛泽东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并指出其特点。他说："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① 自从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使"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因此，便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而在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扩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这就是说，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它改变了国内的阶级关系。"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这个任务不但必须完成，而且是可能完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2页。

成的。”[1] 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实践的新时期，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他认为第一阶段是从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到1937年2月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这一阶段的革命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在这个阶段内，中共中央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主要任务是实现国内和平。国内和平的基本实现除了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外，也是因为国民党的政策有了初步转变，以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赞许中国和平统一的结果，这就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组成上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毛泽东认为“目前的阶段，是新时期的第二个阶段”。他说：“前一阶段和这一阶段都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如果前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和平，则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民主。必须知道，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不行，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2]

其二，毛泽东阐明了在目前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是三位一体的任务。他指出，我们说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它是不巩固的。和平实现与和平巩固是两件事。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国内和平而斗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国民党三中全会后，

---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2—253页。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

我们说和平已经取得，“争取和平”的阶段已经过去，新的任务是“巩固和平”，并指出这是同“争取民主”相关联的——用争取民主去巩固和平。毛泽东说：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是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因为“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没有巩固的和平与团结，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阿比西尼亚主要地是因为封建制度的统治，不能巩固内部的团结，不能发动人民的积极性，所以失败了。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毛泽东提出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个方面的民主改革，即：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各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方面，是实行人民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毛泽东所提出的上述实现民主的途径和措施，即实行“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上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1]

其三，深刻总结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阐明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担负起政治领导责任。毛泽东着重阐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尖锐地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毛泽东历史地考察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分析

---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6－257页。

了其软弱性在一定条件中就动摇变节的客观规律，从而明确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如果"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1] 他提醒全党，必须牢记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沉痛历史教训，指出："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2]

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其政党——共产党来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当时国民党是一个执政的拥有几百万军队的大党，而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同时又是暂时力量相对弱小的党。它要在统一战线中实现对全国政权与军队的领导责任是不现实的。但中国共产党必须争取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权。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争取政治领导的四个条件：1. 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2. 按照这些政治目标行动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要成为实现其目标的模范。3. 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4. 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这些条件是保证自己的政治领导的基础，也就是使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动摇性所破坏的基础。"[3]

---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262页。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4页。
3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3页。

为了加强我们党的政治领导，毛泽东提出了国共合作后，共产党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工作方式都要有所转变，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共产党人要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他说我们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与国民党一大通过的三民主义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在党内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的错误倾向。毛泽东特别指出，尾巴主义，即右倾投降主义，它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它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为了克服党内的错误倾向，实现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必须加强对干部的培养，努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他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他们必须"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①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从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政治战线。这次会议与党中央紧接着召开的白区代表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

三、抗日战争防御阶段，毛泽东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一）抗日战争的爆发，毛泽东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及其特点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8月13日又进攻上海，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全面爆发。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向全国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7月8日，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指出："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并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

保土卫国之目的”[1]。同日，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诸先生的电报中说：“日寇进攻，全国震愤，卢沟桥之役，二十九军英勇抵抗，全国闻风，愿为后盾。敢乞策励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不让日寇侵占祖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红军将士，义愤填胸，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2] 翌日，红军发表通电，要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再次表示红军正枕戈待旦，请缨杀敌。7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共产党员和革命机关工作人员的紧急会议上，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与此同时，红军也立即集中，准备奔赴民族战争疆场。

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共中央公布的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并约定由国民党通讯社发表。这个宣言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项基本主张，同时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为实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四项保证。该宣言指出，现在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本党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7月17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派周恩来等为代表到庐山，同蒋介石等国民党代表就国共合作问题进行会谈。中共代表提议以上述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但蒋介石这时还没有完全放弃和平幻想，企图通过外交途径求得和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78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9页。

平解决，便把中共的提议搁置起来了。直到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才被迫于8月14日发表“自卫”声明。随后，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压力下，经中共中央和来自各方面的批评、督促与推动，国民党当局才于9月22日，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早就交给它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上述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正如毛泽东当时所指出的：“还在七月十五日就已交付了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宣布两党合作成立的宣言，以及当时约定随之发表的蒋介石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的谈话，虽延搁太久，未免可惜，也于九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正当前线紧张之际，经过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先后发表了。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氏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共产党的宣言，不但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而且将成为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蒋氏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很好的；但是还没有抛弃国民党的自大精神，还没有必要的自我批评，这是我们所不能满意的。但是不论如何，两党的统一战线是宣告成立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①

9月25日，张闻天和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林伯渠等，指示他们在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成后要根据下列精神进行宣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3—364页。

传：（1）我们的宣言及蒋氏谈话宣布了统一战争（线）的成功。建立了两党团结救国的必要基础。（2）这个宣言不但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而且将成为全国国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3）蒋谈话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确定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发出了“与全国国民彻底更始”的诺言。今后问题是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及与三民主义相符合的中共提出的十大纲领①。

为了及时地向全国人民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毛泽东早在7月23日就写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在此文中，他论述了在抗日战争开始后将存在两种方针和两套办法，因此也就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共产党所主张的坚决抗战的方针，实行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的办法，它的前途就一定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国获得自由解放；另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它的办法是不仅不发动人民群众抗战，不给人民以自由，不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且继续压迫人民，其结果就只能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使中国人民做牛马当奴隶的前途。毛泽东在这里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并指出了它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他强调说：“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执行抗战的方针和上述各项政策（指本文所列八大纲领——引者注），依靠这个联合阵线。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政府、军队、全国各党派、全国人民，在这个两党合作的基础之上团结起来。‘精诚团结，共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48—349页。

赴国难’这个口号，不应该只是讲得好听，还应该做得好看。”① “共产党人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同时坚决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② 毛泽东号召：“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坚决地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③

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进一步强调单靠政府和军队的抗战还不行，必须“唤起民众”共同抗战。他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只限于国共两个党呢？不是的，它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两个党仅是这个统一战线中的一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现在的统一战线事实上还停止在两个党的范围之内，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还没有被发动，还没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这是目前的最严重的情形。它的严重性，就是影响到前线不能打胜仗。”“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是决然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我们还在今年五月间，就对这个问题大声疾呼地警告过当权的国民党，指出了没有民众起来抗战，就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不但中国共产党人，各地的许多先进同胞以及国民党的许多贤明的党员，都曾指出了这一点。”④ 但是，国民党当局虽然宣布抗战了，却仍坚持过去那种“统制政策”，其结果是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4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4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5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5—366页。

使政府与人民隔离，军队和人民隔离，军队中指挥员和战斗员隔离。这是很不利于团结抗战的。因为“广大的群众并没有发动到抗战中来，只是军队和政府来干而已，所以我们遭受了许多失败。”①

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不是一个很坚固的统一战线。为了巩固和发展国共两党、两军的的团结合作，为了坚持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反复强调对友党、友军要坚决执行统战方针。1937年12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指出：“我们无论在友军区域及敌人后方均应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为基本方针”，“对于假借名义及其他一切离开统一战线原则，应即具体取缔。”要在我军“加紧内部的统战教育”②。12月24日，毛泽东等又致电边区各军政首长，作了关于红军在友军区域内坚持统一战线原则的指示，指出：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始终是我们的中心与方针。为了达到扩大统一战线的目的，与各统一战线的地方工作当局协商，群众工作的进行，必须注意尽量取得他们的同意与合作。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磨擦，为减少可能发生的磨擦，我们对于友党友军及地方当局某些弱点，应采取善意的批评与建议，但要避免讥笑与讽刺。除了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和八路军胜利之外，对于政府抗战的决心及其他好的设施与表现，友军抗战英勇与牺牲的精神，应加以表扬与赞勉③。随后，又指出要争取改造友军，特别是准备永久留华北打游击的友军，使之成为坚强进步的抗日军。同时要逐步改造政权机关，使之成为广泛人民阶层的抗日民主政权，但同时是国民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824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00—401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08—409页。

党政权，各级动员委（员）会吸收真正人民团体武装部队代表参加，使之成为实际的各级政府委员会，逐渐洗刷机关中的腐败分子，尤其是汉奸动摇分子①。

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为两党所共同承认和正式公布的政治纲领。实际上包括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合作在政治上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在军事上是遇事协商。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抗战需要有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应当有一个共同纲领。因为“共同纲领是这个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同时也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一种约束，它像一条绳索，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一切加入统一战线的团体和个人都紧紧地约束起来。这才能说得上坚固的团结。我们反对旧的那一套约束，因为它不适应于民族革命战争。我们欢迎建立一套新的约束代替旧的，这就是颁布共同纲领，建立革命秩序。必须这样，才能适应抗日战争。”②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了与国民党协商制定抗日的共同纲领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1937 年 12 月，中共中央曾向国民党建议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在 1938 年三四月间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时，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两党协商共同纲领，建立各党派参加的“民族解放同盟”的建议，但都被蒋介石拒绝。国民党蒋介石的目的是通过实行“溶共”政策，企图把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吸收到国民党内，把其溶化掉。在 1938 年 10 月，毛泽东提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以下三种组织形式：一是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存其独立性，但与第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第 479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67 页。

一次国共合作不同；二是各党共同组织民族联盟，拥戴蒋介石先生作为这个联盟的最高领袖，各党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组织中央以至地方的各级共同委员会；三是没有成文，不要固定，遇事协商，解决两党有关之问题。[①] 毛泽东认为国共两党在长期战争中的长期合作，组织形式问题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极力赞成有一种统一的形式，使之有利于长期的合作。周恩来曾携带毛泽东的亲笔信去会见蒋介石，同他商谈关于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及其共同纲领问题。但是，蒋介石却顽固地坚持“将共产党合并到国民党成一个组织”的方针，无理要求共产党取消其名义，整个加入到国民党中去，结果使商谈没有什么进展。翌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就国共关系问题致电蒋介石，严肃指出：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为现代中国之必然，所谓“两党合并”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并坚定地表示，共产党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②] 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在政策上没有全部和彻底的转变，仍对共产党采取限制、削弱和“溶化”的政策，致使国共合作从一开始就没有在共同纲领和统一的组织形式上达成协议。实际上只是毛泽东所谈的第三种形式即“没有成文，不要固定，遇事协商”。因此，国共合作又是不很稳定、不很巩固的。针对上述情况，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抗战爆发后，就及时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这个十大纲领，符合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这是现阶段中国革命即抗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29—630页。

② 《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1010—1011页。

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初步的纲领，只有实行了它，才能挽救中国。”①

然而，国民党却在1938年春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企图以此来代替需由各党派协商制定的共同政治纲领。国民党提出的这个纲领，在坚持抗战和开放民主方面虽然接受了中共和广大民众的某些合理要求，但却没有包括中共及其他各民主党派所提出的诸如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等许多重要主张，而且有许多内容只是说着好听并不打算实行的，甚至是背道而行的。在此纲领中所规定设立的国民参政会，虽然有各党派的成员参加，但它既不是统战的组织形式，也不是真正的民意机关，实际上是一个建议、咨询性质的机构。当时我们党表示赞同《抗战建国纲领》，是因它有些条文表示要实行抗战和进行民主改革。当时我们党派代表参加国民参政会是因它多少还是一个各党派可以讲话和宣传政见的讲台。国民党政府公布的200名国民参政员名单，其中包括以所谓“文化团体代表”名义参加的七名共产党参政员。毛泽东是其中的一名。当时他致电国民参政会，提出三条意见：“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②。

这次国共合作虽然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并没有制定共同纲领，但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范围却是非常广泛的。毛泽东认为，这次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同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相比较，同欧洲各国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相比较，都有许多不同的特点。毛泽东全面地总结和阐明了第二次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9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27页。

共合作的下列主要特点：

1. 它具有最广泛的民族性。这一点规定了我们统一战线的根本性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组成，是包括全民族所有不同党派、不同阶级、不同国内民族的最广大的联盟。由于是反对异族侵略的，所以组织成分能够如此之广泛。也就是说，由于日本侵略者是极残酷野蛮的企图灭亡中华民族，因此除了极少数的汉奸卖国贼以外，从农民到地主阶级，从工人阶级到亲英美派的买办资产阶级，从共产党到各民主党派、到国民党，直到复兴社、哥老会、青红帮，无不包括在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中。正是由于组织成分异常广泛，所以这个统一战线具有伟大的力量。只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就能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2. 具有长期性和不平衡性。这个特点是从第一个特点产生的。由于这个统一战线是用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而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从而也就决定了统一战线的长期性。这一点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这一点同过去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亦是不相同的。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了各党派各阶层政治力量的不平衡，同时在区域分布上也表现了这种不平衡性。国民党是第一个具有实力的大党，共产党是第二大党，其他又在其次。这种不平衡决定了统一战线内部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复杂性。我们党根据在抗日时期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致性的原则，正确处理了这个问题。

3. 有政权有军队的合作。国共两党都是有政权有军队的，这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造成的结果，不是缺点而是优点。由于两党都有政权和军队，二者联合起来不仅壮大了力量，而且使抗日战

争中两党克尽分工合作，互相观摩激励。这一点和西班牙有某些相似，但和法国不同，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也不同，这也是使得两党能够长期合作的因素之一。同时，另一方面，在政权与军队问题上也产生了复杂的矛盾斗争。在西安事变前后的国共两党谈判中，国民党之所以千方百计要削弱甚至企图取消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政权和所领导的军队，自抗战以来，国民党之所以处心积虑限制我们敌后根据地政权和人民军队的发展，都说明了有革命政权和人民军队的重要意义。

4. 具有过去两党合作的经验。1924 至 1927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四年，1927 至 1936 年国共分裂的九年，现在国共重新合作又有了两年，这个 15 年中合作——分裂——又合作的经验，深刻地教育了国共两党、其他党派与全国人民，结论是：应合作，不应分裂。这也是长期合作的基础之一。这种宝贵经验，世界各国都没有，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也是没有的。

5. 实行革命三民主义的合作。这次国共合作，是既无固定的组织形式，又无协商一致的共同纲领。两党协商问题是靠公文来往，遇事协商谈判，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来要求对方，而国民党则根据其《抗战建国纲领》来限制共产党。实际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新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争取全民族解放，其民权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彻底的建立民主国家，其民生主义则更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长的时期，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与政治思想保证着统一战线的长期性。

6. 具有有利的新的国际环境。当时的世界政治经济条件，比之第一次合作与两党内战时期都不同。今天只有一部分帝国主义

国家如日德意等反对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由于他们与日本的矛盾，现时也并不反对我们的统一战线，反而采取赞许的立场。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是赞助我们的，苏联更是诚挚的赞助。这种新的国际环境，对于我们的长期合作有重大影响。

深刻地研究和认识这些特点，正确地把握住这些特点，对于巩固和发展第二次国共合作，更好地坚持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都是非常重要的。

（二）党的洛川会议的召开，毛泽东阐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

为了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制定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行动方针和具体政策，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当时红军指挥部所在地的陕北洛川县冯家村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洛川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有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凯丰、张国焘；还有各方面的负责人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钟等共22人。会上首先由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接着讨论发言，然后毛泽东作会议总结。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毛泽东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

关于军事问题

为使两个战场（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与八路军的敌后战场）相配合，团结御侮，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所作的军事问题的报告中，分析了当时中日战争的形势和力量的对比，提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并阐明了红军的基本任务和作战方针。

毛泽东指出，红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已经发展为能够进行运动战的正规军，在当前形势下，在兵力使用和作战原则方面都必须有所改变。按照敌情状况，日本侵略军的主攻方向是华北，上海是日军进攻的辅助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我军的主要作战地区是在晋察冀三省交界处。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箝制和伺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这种“配合”主要是执行战略支援任务，而不是战役战斗的配合；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毛泽东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开展游击战争，当然独立自主是相对的，是在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略目标下的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是，游与击相结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创造根据地，要着重于山地，以便建立起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

毛泽东不仅在洛川会议上阐明了上述问题，而且在会后反复强调我军对友军的配合和坚持独立自主的开展游击战争。早在洛川会议前的 8 月初，毛泽东与张闻天就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指出“关于红军作战，依当前敌我情况，我们认为须坚持下列两原则：（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

（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以上原则，请与各同志商定并准备携告国民党。”[1]

9月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示其向国民党解释“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问题。电报中说：“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取得他们的彻底了解与同意。”这一基本原则包含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府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2]。16日，毛泽东就我军应坚持以游击战争配合作战方针问题致电林彪等，说明这是我军既定方针，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3]。

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剧，在这种拿手剧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能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4] 25日，毛泽东

---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99页。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36—337页。
(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38页。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39—340页。

指示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应负严重的责任。”①

关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

在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所作的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与此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亦就是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在统一战线中，既要对国民党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性，又要牢记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红军的行动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决定，不能听蒋介石的。关于出兵问题，要坚持我们的独立性。由于我们与国民党谈判关于总指挥部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因此不宜早出兵。既是出兵也不能一下子全部出动，而要保留一部分兵力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

与会同志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认真而热烈的讨论。会上着重讨论的具体问题是：出兵的时间问题；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数量问题；出兵后的作战形式问题；对国民党抗战态度的估计问题等。在基本原则一致的大前提下，在讨论中亦出现了一些分歧意见。有些同志认为在当前战局严重情况下，以早出兵为好，但却忽视了蒋介石要我军出兵的用心。他的目的是保存国民党自己的实力，把红军推到前线，借日本侵略者之手来消灭红军。会上多数同志不同意少数同志提出的把我们的兵力全部拉出去的主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53页。

张，因为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陈兵十几个师，对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我们只能暂时出兵三分之二，然后根据情况再作决定。鉴于华北形势危急，这时，国民党虽然尚未正式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但洛川会议仍从大局考虑决定立即出动红军主力到山西前线。有的同志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认识不足，对其缺乏必要的警惕性。另外，在游击战同运动战的主次关系上也有些不同认识，但在会上未充分交换意见。毛泽东在会上作总结报告时，对讨论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作了回答和说明，并且指出，只有实行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才能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

洛川会议根据毛泽东报告的精神和与会同志讨论的意见，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正确地分析了自抗战全面爆发以来的政治形势，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阶段的中心任务，指出七七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内，我们同国民党及其他抗日派别的区别与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会议的决定分析了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实质与危害，预见了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的危险倾向，明确指出，今天所发动的抗战，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这主要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他们企图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与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与民众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府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上述的严重弱

点，所以今后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与局部的妥协等不利情况。因此，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赢得最后胜利。

会议的决定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和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决定指出，我们应当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与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的前进与发展。我们应该克服一切困难，为实现本党所提出的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而坚决奋斗。决定最后号召，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①。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要点是：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 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 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 改革政治机构；5. 抗日的外交政策；6. 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 改良人民生活；8. 抗日的教育政策；9. 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 抗日的民族团结。

会议还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毛泽东在该提纲中说："中国共产党以满腔的热忱向中国国民党、全国人民、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提出彻底战胜日寇的十大救国纲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24—326页。

领。中国共产党坚决相信，只有完全地、诚意地和坚决地执行这个纲领，才能达到保卫祖国战胜日寇之目的。否则，因循坐误，责有攸归：全国丧亡，嗟悔无及。”他呼吁国民党“必须抛弃单纯政府抗战的方针，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的方针。政府必须和人民团结起来，恢复孙中山先生的全部革命精神，实行上述的十大纲领，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他重申：“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决本上述纲领，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中国共产党在自己一贯的方针下愿意和中国国民党及全国其他党派，站在一条战线上，手携手地团结起来，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战胜万恶的日寇，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坚决反对那种投降妥协的汉奸理论，同时也应该坚决反对那种以为无法战胜日寇的民族失败主义。中国共产党坚决相信，在实现上述十大纲领的条件下，战胜日寇的目的是一定能达到的。”①

毛泽东起草的、为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全面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提出和指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具体政策和具体道路。这是同国民党领导集团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所不同的正确的全面抗战路线。

洛川会议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红军积极贯彻会议的精神，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党在国统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与此同时，毛泽东始终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54—357页。

一战线政策，在各方面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

第一，为了坚持实行国共合作，发布了红军改编命令，但在红军改编中不容许国民党派人插入。1937年8月25日，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周恩来副主席名义发布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中指出，南京已经开始对日抗战，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为着实现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府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但是，在两党两军的合作中必须保持我军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例如在9月1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致西安前总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9月10日毛泽东致林伯渠、董必武电；9月14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致博古、叶剑英、周恩来电；9月30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致博古、叶剑英电等一系列电报中，都反复强调：在红军改编中，“拒绝（国民党）行营派人”、“国民党不得插进一个人来”、“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特别是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等派来破坏红军的国民党高级参谋，“不许踏进营门一步”。其理由是南京应该信任红军，不应该破坏红军。如果改为联络参谋并改派红军同意之人选，则不拒绝。

第二，将苏维埃政府改名为边区政府，但反对反共右派到边区任职。早在1937年2月10日，中共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后，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在两党代表正式谈判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也开始了着手准备“更名”、“改制”工作。同年3月陕甘宁苏区改为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必须是完整的、统一的，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持才迫使国民党予以承认。但是蒋介石集团总想干涉边区事务

或企图吞并边区政府。他们提出要派国民党人到边区任职。毛泽东等在许多电报中，诸如1937年8月30日毛泽东致西安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8月30日，毛泽东致南京叶剑英电；9月22日，毛泽东致西安林伯渠电；9月25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等，都反对国民党指派丁惟汾到苏区任职，因为他是过去反共的首领，苏区民众决不承认他为长官，提出必须以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国民党不得干涉边区事务。1938年5月15日，毛泽东还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起草布告，揭露和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破坏陕甘宁边区的阴谋活动。他在布告中昭示国人："我陕甘宁边区军民，服从政府领导，努力救亡事业。凡所实施，光明正大。艰苦奋斗，不敢告劳。全国人民，交口称誉。本府本处，亦惟有激励全区民众，继续努力，以求贯彻。不许一人不尽其职，一事不利救亡。"但"近查边区境内，竟有不顾大局之徒，利用各种方式，或强迫农民交还已经分得的土地房屋，或强迫欠户交还已经废除的债务，或强迫人民改变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或破坏已经建立的军事、经济、文化和民众团体的组织。甚至充当暗探，联络土匪，煽动部队哗变，实行测绘地图，秘密调查情况，公开进行反对边区政府的宣传。上述种种行为，显系违反团结抗日的基本原则，违反边区人民的公意，企图制造内部纠纷，破坏统一战线，破坏人民利益，破坏边区政府的威信，增加抗日动员的困难。"因此，"本府本处，为增强抗日力量、巩固抗日后方、保护人民利益起见，对于上述行为，不得不实行取缔。"①

第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十分重视民族统战工作。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就提出，蒙汉联合抗日是目前绥蒙工作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1—402页。

的最高原则。在此原则下，领导蒙古工作的地方党组织、蒙古工作委员会及蒙古工作负责人都应当相机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我们应当号召蒙人拥护绥远政府抗日，给以各种援助，“蒙汉联合”、“援绥抗日”是我们动员的口号。我们在蒙人中，应当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形式去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①] 毛泽东在其起草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指出，“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②]。1937 年 11 月 16 日，毛泽东、张闻天、萧劲光致电高岗，说：目前形势仍需我们有一支兵北出蒙古，以便镇定人心，联络各旗，开展游击战争，保卫三边。指示其任务是：（甲）以“蒙汉两民族团结一致抗日”，“保卫绥远”的口号去发起与奔走各旗王的联席会议，做到伊克昭盟各旗上层的抗日统一战线，团结抗日。对德王沙王采取批评态度，同时做好广大蒙汉民工作，组织与武装之，建立新的抗日游击队与扩大自己。（乙）与马占山何柱国等及当地国民党人取得联络，传达我们抗日主张及八路军在晋情况，督促他们改善民族政策，去团结全绥抗日组织与武装当地人民，坚决向汉奸作斗争，发展独立自主的群众游击战争来打击日寇进攻[③]。

第四，关于争取托陈派分子联合抗日问题。1937 年 9 月 10 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林伯渠：“请转告罗汉我们对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甲）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第 284－28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55 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第 396－397 页。

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行考虑。”[1]但由于陈独秀拒绝所提条件等原因，上述要求未能实现。

第五，关于对汉奸的没收政策。汉奸是外引敌人，内施破坏的民族败类。毛泽东把“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作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的一项。毛泽东强调对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必须严厉镇压。因为“这个问题现在已到了极严重的程度。汉奸们横行无忌：在战区则援助敌人，在后方则肆行捣乱，并有装出抗日面貌反称爱国人民为汉奸而加以逮捕者。但是要真正镇压汉奸，只有人民起来和政府合作，才有可能。”[2] 1937 年 10 月 15 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说明了对汉奸的没收政策，即没收汉奸政策的主要阶级内容是大地主，而未为汉奸者，当然不在没收之列。在一切汉奸分子之中，首先应坚决没收大地主，而对中层分子之为汉奸者，在未得民众同意以前，不应给予没收。工农中有被迫为汉奸者，应采取宽大政策，以说服教育为主。这是统一战线中的阶级路线，有向全党明确说明的必要[3]。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第 33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76 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第 367 页。

（三）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反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思想特别是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倾向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成为主要的危险倾向。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民党坚持实行不发动民众参加的单纯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国共两党的这种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斗争，严重地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内部，即党内有些同志由于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本质认识不清，便产生了右的倾向。历史的经验表明，就一般规律来说，在我们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而在我们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

随着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全面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抗战一爆发就非常清醒地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如前所述，在党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性，一时一刻也不要忘记蒋介石企图通过抗日战争来削弱或消灭我党我军的阴谋，必须保证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在洛川会议结束后不久的 8 月 27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在统一战线中，有一个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的问题，也就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

的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片面抗战？9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作关于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时指出，抗日战争中的左派、中派、右派阶级关系在重新变化。全民抗战还没有到来，但非此不能战胜日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在全国开始组织成功，但还是不充实，不巩固。他再次强调在统一战线中，是资产阶级追随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追随资产阶级（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问题。他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即将成为全党的主要危险（混淆不同的阶级、党与政策）。

9月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示他偕周恩来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阐明我们在军事上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说：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取得他们的彻底了解与同意。此原则中包含：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现在蒋鼎文还在说刘师应速上前线，彼等用意或者不明白使用大兵团于一个狭小地域实不便于进行游击战争，如果是这样可见我们对此原则并未向他们彻底坚持的有过说明，或者他们含有恶意即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府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如不弄清这一点必将发生无穷纠葛，而红军之伟大作用决不能发挥；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在目前情况下，我军坚持依傍山地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和不打硬仗的原则。9月14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博古、叶剑英、周恩来并转林伯渠、董必武、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指示其在各边区统一战线中应防止右倾机会主义危险。该电报强调，我军驻地要依靠有险可守之山地，严防国民党顽固派的暗袭和破坏，不要求驻大地方。在同国民党谈判时，严戒重蹈湘鄂赣、闽粤边（指何鸣事件）之覆辙。

并且明确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随后，毛泽东在许多电报中，诸如9月22日，毛泽东致西安林伯渠电、9月30日张闻天和毛泽东致博古和叶剑英电、同月毛泽东致林伯渠电等，都要求我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不要把我军同国民党军和民团混淆起来，要提高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反共阴谋的警惕性。

为了批评、纠正当时开始出现的右的倾向，毛泽东于1937年11月12日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完整而系统地提出和论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都不能脱离或动摇这一原则。所谓“独立自主”，就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实行自己的路线和政策，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个领导权即谁领导谁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在报告中尖锐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①

为什么要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呢？毛泽东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即第一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的改变（由原来的军事“剿共”转到政治上“溶共”、限共、反共），国民党实力上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1页。

优势以及国民党关于“共产党投降”和“停止阶级斗争”的宣传，在中国共产党内外都产生了影响；第二是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水平不平衡，许多党员缺乏北伐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少数党员贪图享乐，不愿继续过艰苦生活的情绪的滋长，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的发生，抗日民主根据地中迁就倾向的发生，八路军中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等等。上述存在的问题中，新军阀主义倾向尤为突出。毛泽东指出：“这种倾向，表现在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以做官为荣耀）等现象上面。这个新军阀主义倾向虽然和表现在打人、骂人、破坏纪律等等现象上面的老的军阀主义倾向同其根源（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同其结果（脱离群众）；然而它是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时期发生的，它带着特别大的危险性，所以特别值得注意，需要坚决地加以反对。”① 鉴于上述两个方面的严重情况，毛泽东指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右倾投降主义。

毛泽东在报告中深刻阐明了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性。他说：为了变国民党的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为了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要不断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要防止“左”倾关门主义倾向；但与此同时，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原则。“我们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这个基础上面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2—393页。

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因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① 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在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这是我们的战略出发地，丧失了这个阵地就一切无从说起了；而另一方面，也就是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发展阵地，为了实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积极的目的。

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建立在对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和对于阶级关系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毛泽东在报告中一方面告诫全党要记取 1927 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导致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不要再重蹈覆辙。毛泽东还进一步分析指出，随着蒋介石国民党对抗战态度的变化，我们党内值得注意的倾向也发生了变化。他说：“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② 另一方面，报告又深刻分析了中国的阶级关系，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左、中、右三种不同的集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左翼集团，是抗战的基本和依靠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是中间集团，是争取的力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右翼集团，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94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91 页。

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①

中国共产党要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既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又要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因为“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为了争取中华民族和劳动群众的解放，为了使反对民族主义的斗争坚决有力，必须反对共产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的投降倾向，要使这一斗争开展于各方面的工作中。”②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对独立自主原则和“谁领导谁”的问题作了重要论述，标志着国共合作后党的独立自主原则的基本形成。

正当全党在实际工作中开始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所提出的独立自主原则的时候，却受到了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者的反对。1937年11月29日，王明（在苏联时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之一，并任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候补书记）从苏联回到延安。当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应竭力促成在国民党政府基础上的全国的团结统一，因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而应当运用法国共产党关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王明这次被派回国，就是为了在中共中央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上述“新政策”的。所以，王明一回来就对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和《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反对投降主义和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不满意，批评洛川会议及毛泽东过分强调了“谁领导谁”和独

---

①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6页。

立自主原则。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一方面讲了要坚持抗战，要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正确意见，另一方面即重点是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的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并提出了一系列右倾投降主义的观点。毛泽东在12月11日的会议上则不同意王明的批评，他在讲话中对独立自主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国民党营垒左、中、右的不同倾向，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群众救亡运动中的迁就主义，统一战线中“和与争”的对立统一，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必要性等许多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辩白与解释。12月27日，王明写了《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载《群众》周刊第4期，1938年1月1日出版），1938年1月，他又在武汉大学发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演讲。他在上述文章与演讲中散布了许多对国民党无原则迁就退让的右倾观点。1938年2月27日至3月初，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他在向国民党妥协退让方面走得越来越远了。这次会议结束后，王明回到武汉于3月11日以个人名义写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的长篇文章，在4月23日出版的《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他根本不考虑政治局会议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所提出的正确意见，而坚持把工作重点放在大城市和同国民党的谈判方面。由于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给党在长江流域的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

抗战初期王明所犯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概括起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王明首先否定在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不同党派和政治集团的阶级差别，反对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左、中、右三种不同集团的正确论断。他抹杀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看不到国民党集团腐朽反动的阶级本质。他说国共两党都是“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国民党政府是“领导抗战的中枢”。王明认为，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作用和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军的作用估计不够。毛泽东早在1937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座谈会上就明确指出，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南京国民党营垒内有左、中、右三派。毛泽东还指出，现在资产阶级特别表现其被动性，比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不同，那时以孙中山、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要勇敢些，力量要好些；现在更胆小、更小气些，非逼迫着不想分出其已得的宝座。西安事变后，更自觉地来限制我们。但是，王明从右倾观点出发，否定毛泽东的上述看法。他认为，应有统一的群众组织与统一领导的群众运动，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的限制，同时他不同意公开批评国民党所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更不赞成关于国民党内有左、中、右三种不同势力的观点，主张只能以抗日或亲日为标准，而看不到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既有抗日又有动摇、既有联共又有反共的两面性的本质。

在统一战线中，王明反对独立自主原则，自动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他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认为过去我们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和“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原则，没有采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他极力反对关于国共两党谁吸引谁和谁领导谁的提法，而主张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这实际上就是只讲联合不讲

斗争，自愿放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立场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把领导权拱手送给蒋介石，违背人民的根本利益，葬送革命事业。

在依靠什么力量进行抗战的问题上，王明不相信人民武装，轻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军队，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正规军身上。他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在统一的抗日任务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而提出了所谓“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方针。王明为了适应蒋介石“军令统一”的要求，指出所谓“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的七个“统一”。这实际上是把人民军队都“统一”到国民党军队那里去。特别是其中的“统一指挥”、“统一作战计划”等是很不利于分散的、广大的人民游击战争的迅速发展，是束缚自己的手脚的。与此同时，王明热衷于在大城市里搞“上层统战”、搞“合法”运动，反对把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不愿意派人深入农村放手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艰苦工作。王明还站在右倾投降主义立场上，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只能是国民党的胜利，而不是人民的胜利。

在组织纪律上，王明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拒不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指示。他在武汉负责中共长江局的工作期间，擅自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决议和违背中央方针政策的演说和文章，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纪律，造成了恶劣影响。

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概括起来说就是：“对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人民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

的军队，将抗日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1] 其错误的实质就是放弃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反对依靠人民战争去夺取人民抗战的胜利。王明的上述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虽然当时没有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但却使我们党在长江流域地区的工作受到了很大损失。

中共中央为了全面系统地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纠正党内的错误倾向，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博古、周恩来、朱德、项英、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关向应、张浩、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等17人，还有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30余人。这是自党的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会议对毛泽东的报告，特别是就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问题，进行了认真而热烈的讨论，最后，毛泽东作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结论，着重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基本主张与基本政策，批判了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1. 关于必须坚持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问题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全党必须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争取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是我们党的历史责任。我们党只有自觉地“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

[1] 《王明年谱》第4卷，第120—120[illegible]页

能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1]。他不仅提出了必须坚持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问题，而且阐明了如何保证实现党的领导作用的问题。

为了实现党的领导，必须发挥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先锋和模范作用。毛泽东指出：“在这里，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在长期战争和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协同友党友军和人民大众中的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2]

为了实现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特别是坚决反对破坏党的组织纪律的错误倾向。为此，毛泽东重申党的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与此同时，在党内要实事求是的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今后的抗日形势中，从政治上反对右的悲观主义，将是头等重要的；但是在同时，反对‘左’的急性病，也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523页。

仍然要注意。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在党的组织问题上和民众的组织问题上，则须继续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以便实现和各抗日党派的合作，发展共产党和发展民众运动；但是在同时，无条件的合作，无条件的发展，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也要注意反对，否则也就会妨碍合作，妨碍发展，而变为投降主义的合作和无原则的发展了。”[①] 他并且强调指出，在反倾向斗争中，必须提高干部和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警惕性，才能巩固党的纪律，才能更好地维护与加强党的团结与统一。

为了实现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提高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②] 我们党的马列主义的修养，现在已经比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从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他针对党内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号召全党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普遍而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③]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2. 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与上述第一个问题有直接关系，因为它本质上就是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这是当时毛泽东同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意见分歧的突出问题之一。毛泽东针对在统一战线中存在的迁就主义、不敢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抹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右倾错误，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正确处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是一致的，不应当把它们二者对立起来。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战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战的利益，这是确定的原则。但是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企图否定其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这也就是说，为了团结抗日，我们要采取一种调节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政策，要使劳苦大众和富有者都得到利益，这样去适合团结对敌的要求。毛泽东针对存在的错误，指出："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定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1]这是因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毛泽东强调：第一，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第二，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以不破裂合作为

[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8—539页。

条件。这表现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

毛泽东在报告中论证了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与独立性的关系，他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1] 具体说来就是，在坚持统一战线的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如果只谈统一性，否认独立性，就是背弃了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这是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任何党派都不能同意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但是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在思想上也好，在政治上也好，在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是说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自由权，那就也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同时也是每个友党党员，应该明白的。”[2]

为了坚持和实现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在结论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他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但是“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3] 在不破裂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我们可以采取灵活的策略去发展革命势力。我们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既要统一又要独立。关于这个问题，可以根据不同的

---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0页。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1—525页。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0页。

情况采取以下几种具体做法：1.“先奏后斩”，即有些事估计国民党能同意，就先取得他的同意后再去做；2.“先斩后奏”，即有些事不管国民党同意不同意，先办了造成事实后再告诉他；3.“斩而不奏”，即有些事估计国民党一时不会同意，向他说了没有什么好处，就暂时只做不说；4.“不斩不奏”，即有些事是妨碍团结抗战大局的，就暂时不去做。总之，既不要破裂统一战线，又决不可束缚自己的手脚。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策略思想。

毛泽东在结论报告中还分析了在统战中各党派之间的互助互让问题。他指出，为了长期合作抗日，在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之间有必要实行互助互让的原则与方针，但应当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合作双方彼此间不挖墙脚，不在对方党政军内组织秘密支部。我们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内组织秘密支部，使国民党安心，利于抗日。他说：“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纯消极的让步是有过的，那就是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1] 这就是说，让步要达到积极的目的，纯消极的让步是右倾投降主义。纯消极的让步是不可取的，是必须防止和反对的。

3. 关于战争和战略问题

毛泽东针对王明重视国民党统治区的合法运动，而轻视中国

---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7—538页。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错误，指出了党领导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确定了党的主要工作是在战区和敌后。说明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因此对于党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的方针，也采取了怀疑和反对的态度。为着克服党内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而使全党更明确地了解战争和战略问题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首要地位，并动员全党认真地从事这项工作，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又从中国政治斗争的历史方面着重地说明这个问题，同时说明我们的军事工作的发展和战略方针的具体变化的过程，从而取得了全党在领导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一致。

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结论报告中，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因此，"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共产党员应该成为民族解放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毛泽东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时期，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那种热衷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搞合作运动和把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批评了轻视敌后游击战争的观点。他指出，游击战争的广大性与长期性，是半殖民地中国抗日民族战争的重要特点之一。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日而忽视游击战争，无疑是非常错误的。如果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争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只有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坚持游击战争，才能发挥其战略作用。毛泽东列举了抗日游击队的18条优点，提出在一切敌人后方地带，必须广泛地建立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决定我们党在敌后的战略部署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这就是说，要把我们的工作重点放在敌后和战区，并以游击战争作为当时抗日战争的主要形式，正如毛泽东早就说过的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毛泽东在结论报告中号召："每个党员都要时刻准备武装上前线。""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1]

通过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为全面正确积极地贯彻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坚持党的领导权，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它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逐步认识到，毛泽东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过去一些曾经上当受骗跟着王明一起怀疑或反对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同志，也逐步觉悟过来，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支持毛泽东，批判王明的错误。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偏重扶持信任王明，转变为偏重于支持毛泽东。早在1938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季米特洛夫接见中共代表团的王稼祥时，要他回国后"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了。"同年9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中指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人的这种转变，对中国共产党纠正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5页。

这次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案》，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确定了党在抗日战争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它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在全党确立起来了。

四、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全面展开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坚决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不但在政治上挽救了岌岌可危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和坚持了全国的抗战大业，而且他深刻地总结了经验，在理论上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他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系统总结和多方面的展开而达到成熟。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特别是从1939年到1941年期间，这是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获得巨大发展的特殊岁月。

（一）为坚持、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重大发展

1.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坚持抗战、团结与进步的方针，孤立打击国民党顽固派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我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日寇对国民党的诱降，英美对国民党的劝降，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对日本侵略者的妥协动摇。这些重大变化，严重地影响

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

这时，日本侵略者企图灭亡我国的根本方针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其政策重点改变了。在抗战初期，日本侵略者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用其主力向国民党战场进攻，即对国民党采取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但自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广州、武汉后，它改变了政策，即实行了对国民党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并逐步转移其主力用以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策。日本外相宣布放弃过去不以国民党为谈判对手的政策。

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集团为了给妥协投降作准备而加紧进行反共活动，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实早在台儿庄大捷后，国民党就开始实行“局部的、地方的防共政策”①。他们为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继续其压制群众的抗日斗争，在国共两党之间制造磨擦。特别是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确定其政策的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进一步确立了“溶共”、“限共”乃至“反共”的方针，及一整套具体的政策和办法。该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反动文件。这时“国民党的当局及后方军政机关，均重在如何对内，如何限制共党，防备共党，乃至反对共党，如何消灭同情共党的影响及其分子，如何消灭国共以外的中间分子，以冀造成国民党独霸的局面”，“于是思想复古，磨擦丛生，一切抗战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之自由，极受限制。对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对八路军、新四军，乃发生许多苛刻之

---

① 博古：《南方党的工作报告》（1939年9月18日）。

要求，无理之限制，不平之待遇，以至杀人捕人武装冲突。”[1]

针对国民党的对日投降和反共逆流，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于1939年1月下旬致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和蒋介石，强调指出面对日本侵略者企图分化中国内部的阴谋，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年6月7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反投降的报告和结论。毛泽东指出，国民党对日投降是当前最大危险。他对国民党的投降作了全面的分析与估计，指出一种可能是它大部分抗战，小部分投降；另一种可能是它大部分投降，小部分抗战。我们希望好的前途，但也要准备出现坏的前途。为此，全党当前的任务是：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群众，准备舆论，随时可以应付事变；努力团结一切爱国进步分子，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上层的、中层的和下层的），并和他们一道去动员群众，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共的实质是准备投降，以孤立投降和反共分子，继续坚持抗日；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这是党的基本任务，对此不能有任何动摇。6月30日，毛泽东为纪念抗战两周年撰写了《反对投降活动》的文章。他针对业已存在的主和派即投降派的阴谋活动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公开宣称：我们是始终站在主战派方面的，我们坚决地反对那些主和派。我们仅仅愿意和全国一切爱国党派、爱国同胞一道，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实行三民主义，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而不知其他。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公

---

① 周恩来：《关于目前危机的报告记录》，1939年2月10日，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436页。

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辈制造反共空气、挑拨国共磨擦、甚至企图再来挑动一次国共内战的阴谋。”他提醒说：“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主要的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① 中共中央在纪念抗日战争两周年之际发表对时局宣言，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呼吁全国同胞、抗战将领和一切爱国进步人士，必须一致努力坚决反对投降活动，要坚持国共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同年9月1日，毛泽东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前途，这就是复兴的前途。一个是实行妥协、实行分裂、实行倒退的前途，这就是亡国的前途。”他进一步阐明了我们党所提出的三大政治口号，这就是：“第一，坚持抗战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妥协运动。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不论是日本的引诱和英国的引诱，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拒绝，中国决不能参加东方慕尼黑。第二，坚持团结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分裂运动。也不论是从日本帝国主义方面来的，从其他外国方面来的，从国内投降派方面来的，都应当充分警戒。任何不利于抗战的内部磨擦，都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加以制止。第三，坚持进步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倒退运动。不论是军事方面的、政治方面的、财政经济方面的、党务方面的、文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1—573页。

化教育方面的和民众运动方面的，一切不利于抗战的思想、制度和办法，都要来一个重新考虑和切实改进，以利抗战。”① 9月16日，他在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的谈话中再次重申：“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党在今年的《七七宣言》里提出来的三大政治口号。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避免亡国，并把敌人打出去，除此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毛泽东针对国民党中央相继秘密颁布的《限止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文件，一针见血地揭露说：“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我们延安的人民表示坚决的反对，坚决的抗议。”② 国民党顽固派搞什么“限制”和“处理”都是错误的，是没有前途的，是自寻死路。我们希望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坚持下去，并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才是上策，否则一概是下策。他强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愿意同一切革命的人们包括“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坚持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但人家要排斥共产党，那是不行的；人家要分裂统一战线，那是不行的。中国必须抗战下去，团结下去，进步下去；谁要投降，要分裂，要倒退，我们是不能容忍的。”③

在国民党蒋介石的“限共”方针指导下，国民党顽固派于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掀起了自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这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4—58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7—57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3页。

次反共高潮虽然是局部内战，但危害很大。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等著作，深刻揭露和批驳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活动与一系列反共谬论。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目前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现象是非常严重的，“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末，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① 必须认清目前国内国际都存在着许多有利于我们争取继续抗战、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的客观条件，这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重要条件。为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一方面必须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给予坚决的打击；另一方面必须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才能克服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危险，争取时局的好转。为了粉碎顽固派在政治思想上向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的反共顽固派，如果他们不进步，就必将被人民所推翻。“他们想借统一的美名，取消进步的陕甘宁边区，取消进步的八路军新四军，取消进步的共产党，取消进步的人民团体”。“但是我看将来的结果，决不是顽固派取消进步，倒是进步要取消顽固，顽固分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12页。

子要不被取消，除非他们自己进步才行。”[1] 他批驳顽固派说，“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要求“收起”的不应该是共产主义，因为“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应当“收起”的倒是那些“一个主义”的狂妄叫嚣[2]。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搞反共磨擦，毛泽东代表我们党坚决予以揭露和反击，并提出了自卫的原则。他说，我们坚决要求取消那个秘密流行成为各地磨擦根源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现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问题。”“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3]

为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活动，坚持自卫原则，坚持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做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例如，1940年3月20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等作了关于晋冀两省磨擦终止后团结友军推动时局好转的指示，指出对于国民党军队要进行有系统的团结，联络争取说服工作，表示我们愿意与他们团结抗战到底。此次对朱怀冰、石友三还击完全是迫不得已。对于山西、河北两省反磨擦行动全部告一段落，在此期间内偃旗息鼓一枪不打，向一切国民党军队表示友谊，求得恢复感情，推动时局好转。10月12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3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9—590页。

等，指示其不再提反韩（德勤）口号，始终表示愿意团结抗战，停止磨擦。11 月 4 日，毛泽东等致电叶挺、项英等，要他们根据华北、陕甘宁边区和苏北黄桥等反磨擦战斗的经验，在反磨擦的武装斗争中，加紧争取友军对我同情或严守中立的工作。指出根据各方面经验，提出抗战到底，团结到底，大敌当前，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军队不打中国军队，一切中国同胞中国友军联合起来抗日救国，反对内战，反对中国人自相残杀等口号，这是思想上瓦解反共军队和争取友军的有力武器。11 月 6 日，毛泽东致电李克农、项英、董必武并转周恩来，提出我们要向国民党人员及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说明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日寇必使蒋崩溃，有百害无一利。要动员党内外一切力量制止剿共降日的活动。11 月 16 日，毛泽东等又根据在反磨擦斗争中有许多黄埔系军人未参加反共战争的情况，在一份材料上的批语中指出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极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采取中立或消极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解放区军民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坚持了国共合作，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 毛泽东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自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因而发生了一种“左”的偏向。这种过左的倾向曾一度成为主要的错误倾向。他们缺乏全面分析的观点，没有看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退让仍

然是当时的主要危险。他们只看到国民党蒋介石搞反共磨擦的一面，而忽视了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的一面。因此，有“左”倾情绪的同志，把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看作是“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的重演，认为国共两党的合作已经破裂或即将破裂，主张整个的反对国民党。从这种错误估计出发，他们认为现在党的政策已经不应当是抗战初期的民族统一战线，而应重新采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那种政策。他们忽视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等中间势力，主张实行工农民主专政，并对顽固派要进行无限制的斗争。这实际上是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生了动摇。当时存在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特别是“左”的倾向，如不及时加以纠正，必将妨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必将影响抗日战争的坚持和夺取最后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地分析当时的形势，正确地制定党的策略方针，对于坚持国共合作，对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都具有决定的意义。为此，毛泽东于1940年3月11日及时地全面地总结了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策略的经验，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同年12月25日，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在这两个重要文件中，毛泽东对当时的基本形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作了科学的、系统的和深刻的阐述。

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这是毛泽东在领导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贯坚持的思想。毛泽东在发表上述两篇文章之前，他对统一战线的思想和策略方针已经提出了如下一些基本观点，即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农民是最可靠的同盟

者；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统一战线的基本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应当同它建立统一战线，但要提防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同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在统一战线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要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自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来，特别是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和《论政策》两篇文章，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上述统一战线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点。

毛泽东在分析当时形势时指出，目前时局的特点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方向和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中等资产阶级的抗战方向同时并存。一方面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危险更严重了，另一方面是克服投降危险的客观条件仍然存在，亦即仍未丧失克服投降危险的可能性。具体地来说，迫使国民党顽固派不能轻易对日妥协投降，不能轻易发动全国性反共内战的国际条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虽然受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严重打击，已经无力再作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因而使敌我形势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仍然坚持其灭亡中国的基本政策；英、美、法三国与日本之间都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同时欧战亦削弱了英、法两国在东方的地位，美国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政策，致使东方“慕尼黑会议”没有召集的可能；苏联的对外政策取得了新的胜利，对中国的抗战依然采取积极援助的政策。与此同时，迫使国民党顽固派不能轻易投降妥协和不能轻易发动全国性反共内战的国内条件是：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及党所领导的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坚决反对对日妥协投降，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中间势力，国民党中的大多数人也是反对投降的，在国民党内搞投降活动的人虽然握有实权，但并不占

多数。这表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内战仅是局部性的，还不是全国范围的内战。因此，争取他们继续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是可能的，我们的统一战线政策是绝对不会动摇或改变的。面对当时的时局形势，我们的正确对策是：坚决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要始终坚持全国的党、政、军、民、学等各方面的统一战线，争取中间势力，壮大人民力量，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

毛泽东在这两篇重要著作中，根据“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总的策略思想，制定了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特别是着重阐明了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强调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①。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毛泽东早于1937年11月12日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就已经提出来了。他在该报告中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有左、中、右三个集团即三种势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左翼集团是共产党率领的群众，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间集团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指右翼集团——引者注），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5页。

变。”[1]随着国共合作抗战的发展，毛泽东不断总结斗争的经验，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更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了。

毛泽东对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都作了具体分析。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取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他们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进步派。发展进步势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三个环节中的最基本环节。只有不断发展和壮大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但是发展进步势力，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不但要同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作斗争，还要同顽固派作斗争。因为对于发展进步势力，顽固派是反对的，中间派是怀疑的。如果不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收到确实的成效，就不能抵抗顽固派的压迫，也不能消除中间派的怀疑，进步势力也就无从发展。

争取中间势力，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和地方实力派。毛泽东指出，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所谓中间势力，实际上是指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所持的中间政治立场而言。在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它所包括的对象亦是不完全相同的。例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它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及其代表人物。到抗日战争时期它所包括的范围就比第二次国内革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5—396页。

命战争时期宽泛得多了，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又比此前扩大得更多。在抗战初期的中间势力，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又增加了“地方实力派”。毛泽东在1940年4月提出，不要把整个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党员、团员都看做是一样的，实际上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是可以争取的中间分子。同年5月，毛泽东在给中共东南局的指示中，进一步把争取中间势力明确为：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等。毛泽东始终反对对中间势力采取过左的政策，而坚持实行争取中间势力的正确政策。在一般情况下，中间势力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但当革命处于低潮时，一部分中间派可能由动摇而脱离革命队伍，甚至变节，但就整个中间势力来说，它不是革命的对象。因此，我们的基本政策是争取中间势力。

中等资产阶级是中间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指出，中等资产阶级就是除了买办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和工人阶级有矛盾，不赞成工人阶级的独立性；但是他们在沦陷区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国统区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限制，因此他们还要抗日，要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力。他们赞成团结抗日，赞成民主宪政运动，并企图利用进步势力同顽固派的矛盾和斗争，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把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真正区别开来。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即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早在党的四大上虽然已开始看到有“大商买办阶级”与“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分，但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成为独立的阶级。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虽然区

分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不同，但其认识尚属初步，而真正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在抗战中期即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形成的。

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过去我党没有把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区别开来，直到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时，才正确的认识清楚。他在给当时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萧向荣的信中说："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去年（指1939——引者注）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 因此，在《共产党人》杂志1940年第4、5期上发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初稿时，虽然将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加以区别，但却将大资产阶级纳入了民族资产阶级范畴之内，这实际上就改变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原来的看法，没有把大资产阶级列入买办阶级，而是将它当作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了。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毛泽东的认识才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以后，他从内容的分析与提法上才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彻底区分开来。这个重要变化首先集中的反映在毛泽东于1940年3月11日所作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提纲之中。

同年9月6日，毛泽东还向在国统区工作的中共南方局、东

---

(1)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1—162页。

南局发出指示，要求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还包括将大地主与开明士绅）加以区别的问题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毛泽东指出，大资产阶级是带买办性的，它与外国资本有联系，是现时的主要当权者；而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受大资产阶级统制，与外国资本联系少，现时还基本上没有政权，主张团结抗战的。9 月 23 日，毛泽东在延安的杨家岭作报告，对中国的资产阶级作了进一步分析。他指出，以前我们没有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即中等资产阶级是可变派，是较好的同盟者。现在他们的代表人物在军界、政界是张学良、杨虎城、于右任、冯玉祥、卫立煌等，在经济界是陈嘉庚等。对于他们，我们要认真研究。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分为左中右三派，而以两面派为多，希望祖国复兴者为多，极少数是亲日派，另外的少数很左。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争取与团结，当然对于其中的右派亦要进行必要的批评甚至斗争。毛泽东十分重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于 10 月 14 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强调指出：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如果我们能以正确政策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民主方面与我们合作，在国共斗争方面保持中立，则不仅对孤立大资产阶级有极大帮助，且使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得以开始在全国注目之地区具体实现，对于目前阶段整个革命进程是有帮助的。因此，请你们除对生活教育社人员加以联络，鼓励他们去苏北外（这是主要方面），同时亦对黄炎培、江问渔、张一麟、褚辅成等江浙民族资产阶级之代表加以联络争取工作，向他们说明苏北事变真相，说明我们在苏北的各种政策，征求他们对苏北问题的意见，约请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到苏北去办教育文化事业，去投资兴办实业，并说明我们欢迎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参加苏北的政

权工作和民意机关工作，以便经过他们，扩大我们争取江浙民族资本家的范围，并帮助我们巩固苏北根据地。①

毛泽东所说的中间势力，除了上述的中等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以外，另外的两部分即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开明绅士是地主阶级的左翼，即一部分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地主，他们的政治态度同中等资产阶级大略相同。他们虽然同农民有阶级矛盾，但他们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亦有矛盾。他们不赞成顽固派，并想利用进步势力同顽固派的矛盾与斗争以便达到其政治上的目的。地方实力派，色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在内，其领导成分多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此在抗战中有时表现进步，但不久又反动起来。他们虽然同进步势力有矛盾，但又同国民党中央政府有矛盾，他们企图利用进步势力与顽固派之间的矛盾，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所以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是可能在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的。毛泽东强调说，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和社会影响，他们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的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我们对他们必须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为了争取中间势力，我们既要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和适当的批评，又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他指出，这些必要的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如果"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或竟变为顽固派向我们进攻的同盟军；因为顽固派也正在极力争取中间派，以便使我们陷于孤立。"②

---

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475—47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7—748页。

孤立顽固势力，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他们分为降日派与抗日派，二者是有区别的。他们采取反革命的两面政策，即一方面主张抗日，一方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反动政策，作为他们对日投降的准备步骤。在抗日问题上，一方面尚在抗日，一方面又准备投降；在反共问题上，一方面反共，一方面又不敢完全分裂。对于他们的这种反革命两面政策，我们必须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对他们抗日和不敢完全分裂的一面，采取联合的政策，争取他们能够较久地留在抗日阵营内；对于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一面，采取坚决斗争的政策，也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毛泽东强调指出，如果我们能够在思想上提出正确的革命理论，对于他们的反革命理论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在政治上采取适合时宜的策略步骤，对于他们的反共反进步政策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军事步骤，对于他们的军事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那末，就有可能限制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就有可能逼迫他们承认进步势力的地位，就有可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而使他们陷于孤立。这也就能争取他们留在统一战线内，避免大规模内战的发生。

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毛泽东始终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这就是说，既不是绝对的联合，也不是绝对的斗争，而是综合联合与斗争两个方面的正确政策。毛泽东总结了我们党多年来同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与教训，特别是自抗战以来在制止国民党制造的反共磨擦事件与打退其发动的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全面深刻地阐明了对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原则。1939年2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发表讲演指出，统一里有斗争，天下万物皆然。同志们如果能找得到只讲团结没有斗争，那我就不姓毛。如果有人认为只有团结，没有斗争的，那他还没有学通马克思主义。联合

与斗争是统一战线的原则问题，但两者既不是半斤与八两，也不是斗争更重于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基本原则便是联合、统一、团结，但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斗争。这是不可缺少的，是谁都不能也不应忘记的。如果人家拿了机关枪对准着我们，拿了刀架在我们脖子上，我们就只有拿机关枪、刀子去斗争，在那时就是斗争第一了。斗争不是仅有一种形式，而是多种多样的。

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对付顽固派两面政策的革命的两面政策”[1]，而且进一步阐明了又团结又斗争的辩证关系。他明确指出：“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2]。1940年7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说：（1）我们历来是强调团结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抗战派；（2）我们历来是强调斗争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投降派；(3)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4）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抗日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5）斗争是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6）不论那一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那一方面都同时斗争，因为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7）即在目前时期，某些地方，反磨擦斗争还可表现为地方高涨，例如苏北（指韩德勤向苏北根据地的进攻）。同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对又联合又斗争的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指出：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党又拥护又斗争。在反共问题上，既有

---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8页。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5页。

现在与将来之分，也有反共的高潮与低潮之分，还有对某一个具体的顽固派如阎锡山的反共高潮与低潮之分。要根据不同情况来处理关系。总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

毛泽东提出了在同顽固派进行斗争时，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一原则是在顽固派制定磨擦事件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1939年5月5日，毛泽东在延安后方留守兵团的军事会议上说：巩固边区有一个方针和两个原则。一个方针，就是“一步不让”，对于顽固派的捣乱给以无情的打击，对他们绝不让步。两条原则的第一条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同他讲亲爱、讲团结；要是他对我们不客气，我们就来第二条，就是“人要犯我，我必犯人”。这叫磨擦，人家磨擦来，我们磨擦去，也就是孔夫子所谓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否则不叫“礼尚往来”。这是圣人之言，天经地义，我们一定要磨擦去。同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自卫防御的“磨而不裂”的“有节”思想。他说，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活动必须给以坚决的抵抗，但是要严格坚持自卫的立场，绝不超过这个限度，要磨而不裂，其目的在于巩固国共合作。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1] 到1940年3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提纲中又对这一原则作了深刻的全面的阐述。他说，在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理”即自卫的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斗争的防御性。“有利”即胜利的原则，

---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6页。

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进行无计划无准备和无把握的斗争，这是斗争的局部性。“有节”即休战的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后，在其没有举行新的进攻前，应适可而止．使斗争告一段落，实行休战，这是斗争的暂时性。只有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才能更好地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规模的反共内战。这样，才有可能争取时局的好转。

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是毛泽东为党制定的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的具体运用。毛泽东还阐明了对又团结又斗争在其他各项统一战线工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具体原则与具体政策，诸如关于政权、劳动、土地、税收、锄奸、人民权利、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等政策。

到1940年12月底，毛泽东对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策略作了全面系统的概括。他指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具体地说，就是：（1）一切抗日的人民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3）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4）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5）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6）对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

立反共顽固势力。（7）对于反共顽固派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8）对于亲日派中间的两面分子亦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9）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亲日派与亲英美派要加以区别，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10）对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中国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在对外关系上，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立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①]。这标志着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已经形成了具有丰富内容的科学体系。毛泽东为党制定的上述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是对马列主义策略原则和斗争艺术的独创性的运用和发展。它有力地纠正了党内的“左”右倾错误，使我们党能够正确地开展对顽固派的斗争，同时也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共高潮，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策略基础。

3. 毛泽东对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国际法西斯侵略势力极为猖獗。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迅速壮大，国民党顽固派亦加紧了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国民党反动派早就预谋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10月19日，蒋介石指示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等发出皓电，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诬蔑，并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阴谋借机削弱或消灭坚持抗日的人民军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此早有察觉。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3—765页。

共中央曾于1939年7月7日的宣言中指出：投降是时局最大的危险，反共是投降的准备阶段。1940年7月7日的宣言中又说："空前的投降危险和空前的抗战困难，已经到来了。"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在同年11月19日的佳电中更具体地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① 佳电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但中国共产党为了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亦作了一些让步，同意将皖南部队全部撤往长江以北。

1941年1月4日，我新四军9000余人按照商定路线，由驻地泾县云岭出发开始北移。但当部队于9日到达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在叶挺指挥下，浴血战斗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和被俘。叶挺在与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项英亦被叛徒杀害。1月17日，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其番号，并称要将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一事变的发生，使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这次反共高潮进行了严正而坚决的斗争。

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向全党说明了这次事变发生的真相和为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我们在宣传上、政治上、军事上所采取的方针。1月20日，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命令，指出：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73页。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此次奉令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迭据该军第一支队长陈毅、参谋长张云逸等电陈皖南事变经过，愤慨之余，殊深轸念。除对亲日派破坏抗日、袭击人民军队、发动内战之滔天罪行，另有处置外，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①

1月20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向全国人民彻底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寇和汉奸，实行联合“剿共”的整个阴谋计划。他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中国亲日派首要分子，早已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之中，为数颇多，日夕煽诱。至去年年底，其全部计划乃准备完成。这次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是他们反动计划的表面化。他强调说：“日寇和亲日派的计划即使实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时局不论如何黑暗，不论将来尚须经历何种艰难道路和在此道路上须付何等代价（皖南新四军部队就是代价的一部分），日寇和亲日派总是要失败的。”② 同时，毛泽东在谈话中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7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74页。

悬崖勒马，停止挑衅；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平毁西北的封锁线；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等十二条解决办法。毛泽东最后郑重申明：“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①

在皖南事变期间及其事变后，中共中央对反共顽固派坚决贯彻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对此作了深刻总结。3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的党内指示，指出我党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去年11月9日的电报），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两个十二条，拒绝出席参政会和全国的抗议运动），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我们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75—776页。

要的，且已收得成效。

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毛泽东坚持以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反对反革命的两面政策，并把这一政策运用得非常好。在何应钦、白崇禧于1940年10月19日发出“皓电”后，毛泽东确定了政治进攻和军事防御的战略方针，即实行针锋相对的革命的两面政策。毛泽东在1940年11月21日与30日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指出，蒋介石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以攻势之手段达到防御之目的，其本质依然是两面政策。我对一切吓我之人亦应以政治攻势对待之，采取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的方针。我们除表示皖南一点小小的让步外，其他是寸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我们和缓可以争取群众，抵抗可以保卫自己，软可以给他们面子，硬可以给他以恐怖。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势力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在蒋介石于12月8日发出“齐电”（限期让新四军北移的最后通牒）后，以及蒋介石于1940年1月17日发表反动命令后，毛泽东为打退国民党的政治攻势，进一步阐明了革命的两面政策思想。5月8日，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对我们党的革命的两面政策作了非常深刻、全面的概括，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日和反共方面，始终存在着两面性。他们“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然还在抗日，其对我党既然还在一打一拉，则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

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① 6 月 28 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进一步阐述了上述思想，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不但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在抗日一点上确是如此，在民主一点上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坚决的反对力量，但在我根据地内则大地主大资本家，为保存其经济利益，为向我作合法斗争，亦可赞成我之民主政权，故在抗日过程中不论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本家是一拉一打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之手段。在中国孤立大资本（产）阶级与俄国孤立资产阶级不同，在中国只孤立其反共方面，在俄国则是绝对孤立政策②。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由于我们党对中间势力积极开展争取工作，使许多地方实力派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指出：上次反共高潮中反共最力的阎锡山，这一次就站在中间立场；而上次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其他各地方实力派更不待论。他强调说：“我们同志中却有许多人至今还把各派地主阶级各派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似乎在皖南事变之后整个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叛变了，这是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看法，将一切地主资产阶级都看成和国民党顽固派一样，其结果将使我们自陷于孤立。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③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82 页。
②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 579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83 页。

显然，这不但是对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经验的总结，而且亦是对整个中国革命 经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总结。

在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毛泽东始终强调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上，以便争取时局的好转和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早在 1939 年 6 月 10 日，毛泽东在反投降的报告中就曾指出，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同年 10 月 10 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指出，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到意外的损失。1940 年 1 月 28 日，毛泽东在党内指示中又指出，要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同年 5 月 4 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东南局和项英，要他们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 1927 年的错误。同年 11 月 3 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又强调指出，我们要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我们在皖南事变遭到失败后，毛泽东针对项英的错误总结经验指出，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作战，要准备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残

忍，不但为过去十年的反共战争所证明，更由抗日战争中的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所完全地证明了。他还指出："有些同志，当着我党中央令其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的破裂，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就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他们不了解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①

在粉碎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于1943年由于我们党在政治上的揭露和军事上的充分准备，以及全国人民的反对与国际舆论的谴责，蒋介石被迫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第三次反共高潮遂被制止了。

在这期间，由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连续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坚持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个斗争中，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主根据地三三制政权的思想和减租减息政策的制定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在敌后根据地要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创造性地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贯彻到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中。由于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4页。

建立“三三制”政权和实行“双减”土地政策，因而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根据地政治经济的发展，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1. 关于抗日民主根据地三三制政权的思想

第一，毛泽东提出并阐明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指明三三制政权是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

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政权，毛泽东早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就提出来了。当时他说：“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①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共中央为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于1936年9月17日作出《关于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毛泽东指出：“民主共和国”这个口号政治上组织上的含义包括如下三点：（一）不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汉奸卖国贼在外的一切抗日阶级互相联盟的国家和政府，其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内。（二）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三）政府给予人民以全部必需的政治自由，特别是组织、训练和武装自卫的自由。从这三方面看来，……这正是一个有利于抗日战争的国家制度和政府制度。②

为了实现“苏维埃共和国”向“民主共和国”的转变，1937年2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名为陕甘宁特区。4月，西北办事处决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2—383页。

定：将苏维埃政策及其工作方式、方法，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的方式、方法。9月20日，陕甘宁边区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的政权不断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政权模式逐步向三三制政权的形式转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倒退势力与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抗日进步势力形成了严重斗争局面。这种斗争表现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40年2月1日做出了《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为了“强固抗日进步势力，抵抗投降倒退势力，力争时局好转”，“要猛力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要巩固与扩大各个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上建设完全民选的没有任何投降反共分子参加的抗日民主政权。这种政权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而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①] 同日，中央书记处给北方局并转各分局、各师、区委发出《关于抗日民主政权的阶级实质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领导的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民主的人们的革命的专政，对于反抗日反民主的反动分子、反共分子、投降分子，当然是除外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其阶级成分上，工农小资产阶级是主要的，然而应当吸收进步的中产阶级分子及进步士绅加入，拒绝他们参（加）政权，对我们对抗日都是不利的。”“因此抗日民主政权应当在政策上和阶级实质上都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②]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262—263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268页。

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全面地论述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示说明当时我们与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权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斗争及这一斗争的重要意义；指出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人员分配原则、应注意的问题、政权产生的办法、施政方针、组织形式等等问题。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三三制政权的概念，以及如何组成三三制政权的重大原则问题。

关于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斗争问题，毛泽东指出："目前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这种政权，并已经可能在各主要的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又说："我们和反共顽固派为政权问题在华北、华中和西北的斗争，带着推动全国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为全国观感之所系。"所以，他要求人们"必须谨慎地处理这一问题。"①

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的人员分配，毛泽东明确提出三三制政权的概念。他说："应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② 这就是著名的三三制政权。

关于三三制政权的性质，毛泽东作了明确阐述。他说："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2页。

别。”[1] 毛泽东在论述为什么要规定三三制原则时说：“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这样做，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又说：“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步骤。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为了保证无产阶级在三三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强调指出：“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2]

毛泽东对于三三制政权的施政方针和组织形式作了明确规定。他指出：“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3] 政权的组织形式，“应是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还明确地指出三三制政权的产生办法及相关的选举政策。他说：“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4]

毛泽东还对建立三三制政权应注意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三三制政权“人员的分配是党的真实政策，不能敷衍塞责。”又说：“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3页。

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毛泽东还强调：“对参加我们政权的党外人士的生活习惯和言论行动，不能要求他们和共产党员一样，否则将使他们感到不满和不安。”①

随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执行三三制政权的政策。1940年3月11日，他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又说：“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必须确定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这种政权，即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即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相区别的，也和严格的工农民主专政有一些区别。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应该是：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只有汉奸和反共分子才没有资格参加这种政权。这种人数大体的规定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② 6月11日，毛泽东电示王震：绥清安吴等县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四县县政府及专员公署人员分配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开明绅士及商人的占三分之一，除顽固派坚决拒绝外，各阶层的代表应大体上照上述方针分配人员。7月5日，毛泽东在延安《新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2—74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50—751页。

中华报》写的纪念抗日战争三周年的文章中，再次申明："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① 12 月 25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党内指示《论政策》时，又一次强调："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关于政权组织。必须坚决地执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只占三分之一，吸收广大的非党人员参加政权。""切忌我党包办一切。我们只破坏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② 毛泽东以上论述，给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第二，各抗日根据地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三三制政权原则，使其政权不断巩固与发展。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出现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抗日民主政权。这些政权对团结各阶层人士，动员和组织全体人民进行抗战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初期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还不很健全。毛泽东提出三三制政权原则以后，各抗日根据地积极贯彻执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在其政权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60—76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66 页。

建设中得到充分地体现，更好地推动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政府是最早建立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早在1937年12月陕甘宁边区就选举出了边区议会的议员。1938年11月25日，陕甘宁边区议会改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届参议会是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在延安召开的。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开幕式，并作了讲演。会议听取并通过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政府工作报告，讨论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及其他单项法规条例，民主选举了边区参议会正副议长、边区政府主席和边区政府委员会。边区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确定了政府委员分工，正式宣告边区民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第一个参议会，它依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原则，成功地制定了许多具体政策，为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树立了榜样。但是，在政府工作人员的安排上，几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缺乏广泛的代表性，不利于团结边区的各个阶级和阶层，这是一个严重的弱点。这个弱点在毛泽东提出三三制政权原则之后，逐步得到克服。

1940年3月，毛泽东撰写的党内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发表之后，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地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或者改选各级政权机构。同年6月15日，晋察冀边区政府发出《为胜利地完成各级选举而斗争》的指示信，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县、区、村暂行组织条例》、《晋察冀边区参议会组织条例》和《晋察冀边区暂行选举法》。这些条例规定，晋察冀边区政权的民主大选举时，不分阶级、党派、民族、信仰、男女、文化程度、居住年限，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同年10月，晋察冀边区民主大选举运动胜

利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参加区选选民达 79. 45%，参加县选的选民为 78. 8%。选举中普遍执行了三三制政策，大批受群众拥护的共产党员、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一部分开明绅士被选进了政权机关和民意机关。

陕甘宁三三制边区政府是在 1941 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给予了重要指导。

1941 年 1 月 30 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出《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在当年进行的边区的选举中自乡村起就要彻底实行“三三制”；“三三制”政策，不仅要实行于议会，还要实行于政府机关中；“三三制”政权必须有合乎“三三制”的各种社会政策与立法；要检查过去选举运动的经验与创造适合“三三制”选举运动的新方式；要充分进行党内外选举运动的宣传教育；在“三三制”选举运动中要加强党的领导，也要克服不敢放手做的倾向，等等。同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指示》，指出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由边区中央局提出，经中央政治局批准，乘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之际发布，共 21 条。“此纲领之发布，适当国内外形势发生激烈变化，国民党施行黑暗统治，全国人民彷徨无主之际，实具有严重政治意义。”指示特别强调：“关于三三制的实施，尤须利用此纲领上之条文，对党内进行深刻的教育，因为党员不善于与党外人士合作，为现时我党最严重问题，不解决此问题，我党是无法领导全国胜利的。”①

同年 4 月 28 日，毛泽东关于公布与发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

---

①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3 页。

领》问题给任弼时并边区中央局写信，强调要广泛宣传。信中说："施政纲领的最后修正稿，付上二份，请在边区刊物上发表，并印多张广为散布于边区境内及境外。支部书记以上，班长以上，乡主席以上之干部，须使之人手一张，识字少者当作识字课本读。并张贴于通衢。《群众报》上，须为文逐条加以通俗解释。""与此纲领发布同时，须由边局发一通知，亦同样在报上发表，在通衢张贴，并使干部人手一张。""送《今日新闻》、《新中华报》发表及发广播"。4月30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发布新的施政纲领的决定》。《决定》指出："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向边区人民提出的本党在边区的施政纲领，业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兹决定于五一劳动节发布。此纲领之发布，具有严重之政治意义。各级党组织收到后，须立刻加以讨论。为本党同志所领导之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学校，均须讨论此纲领，或用为教材，加以熟读。对边区党外人士，应征求其意见，欢迎自由批评，对边区境外之友党友军及广大人民，须同样征求其意见，并欢迎批评。无论在选举前或选举后一切为本党同志所领导之机关、部队、团体、学校，均须照此纲领坚决实施之。"(1)

1941年5月1日，《新中华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施政纲领》要求边区各阶级各党派团结起来，共同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团结全国人民和友党友军，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施政纲领》规定按照三三制原则组织边区的抗日政府。它申明："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

(1)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第75页。

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①]《施政纲领》对边区的政治、经济、外交等诸方面的政策都作了规定。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全体大会是1941年11月6日至21日在延安举行的。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晋察冀、晋冀豫、胶东、鲁西、华中、苏北等各抗日根据地的代表出席了开幕式。11月21日，毛泽东发表了重要演说。他强调：“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共同奋斗。”又说：“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力。”“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②] 毛泽东号召共产党的参议员，要克服自己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同时，他也号召党外人士了解党的主张，帮助我们把毛病治好，共同把事情真正办好起来。

这次大会讨论通过了《施政纲领决议》。决议指出：“该纲领不但适合于边区的需要，而且完全符合于中国的国情，是唯一正确的边区施政方针，也是团结抗战以救中国的良策。因此，本会全部接受，作为今后施政纲领，并责成政府监督指导全区人民切

---

①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第7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7—810页。

实执行之。”[1] 大会严格按照三三制选举出边区政府委员，当选出的18名政府委员中有共产党员7名时，徐特立立刻声明退出，经大会同意，由党外人士白焕文递补。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建立之后，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参议会也相继建立起来。如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成立；1942年10月24日，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召开了第一届临时参议会；1943年1月15日，晋察冀边区首届参议会成立。在这些参议会及政府机关中，都很好地贯彻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三三制”原则。例如，1942年11月2日，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开幕时，宣布全体参议员共145名，其中共产党员49人，略微超过三分之一。这时，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林枫代表分局讲话，指定参议员中的2名共产党员退出参议会。

由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认真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三三制”原则，从而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大家群策群力，共渡难关，争取胜利。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举行时，边区副主席、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了“精兵简政”议案。毛泽东对这一议案很赞同。他用红笔把这一提案中的重要段落圈起来，又把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旁边还加上了一段按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精兵简政”这一提案很快在参议会上通过，随后在陕甘宁边区贯彻执行。1942年9月7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论述了实行“精兵简政”对克服物质困难的重要性，要求各抗日根据地要认真理解“精兵简政”同当时的形势与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在毛泽

---

①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第272页。

东和中共中央的积极倡导下，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都贯彻执行了这一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关于减租减息政策的问题**

第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战争时期社会主要矛盾、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正确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

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提出了“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土地主张，但没有能够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了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打倒地主阶级，铲除封建势力，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逐渐降到了次要地位。在外敌入侵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调整了各项政策，对于土地政策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毛泽东早在 1937 年 5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指出：为了组成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的联盟，“为了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共产党愿意停止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准备“用立法和别的适当方法去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土地属于日本人，还是属于中国人，这是首先待解决的问题。既是在保卫中国的大前提之下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那末，由暴

力没收方法转变到新的适当方法，就是完全必要的。”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毛泽东在这一提纲中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确定减租减息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基本土地政策。减租减息这一土地政策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是不同的，它是根据抗日战争的实际需要而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土地政策。毛泽东多次向人们指出这一问题。

1938年11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结论时，指出：“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各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要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地主应该减租减息，同时农民应该交租交息，团结对外。”② 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指示中，强调：“关于土地政策。必须向党员和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时期，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一套办法不能适用于现在。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③ 1942年1月28日，由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更明确地指出：“抗战以来，我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6—767页。

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①]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再次说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办法，实现了孙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抗日期间，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②]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制定和执行的“减租减息”政策，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但仍在政治上动摇了封建统治，特别是在经济上削弱了封建剥削。显然，减租减息政策是在民族战争条件之下兼顾农民和地主两方面利益，把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问题恰当地结合起来的正确政策。

第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减租减息政策，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受到热烈拥护，并深入贯彻执行，取得了很大成绩。

减租减息政策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实施有一个发展过程。它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大体上经过了宣传发动和初步实施、形成高潮和深入查减几个阶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各个阶段都做了明确指示，给予了有力地推动。其大体情况如下：

（一）第一阶段。从洛川会议后到1941年年底。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确定减租减息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土地政策之后，指示各地要认真宣传与贯彻。要求“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必须实行激进的有利于广大抗日民众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在经济改革方面，必须实行减租减息、废止苛捐杂税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8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5—1076页。

与改良工人生活。凡已经实行的，必须检查实行程度。凡尚未实行的，必须毫不犹豫地立即实行。”① 1940 年 2 月 1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再次指出：“要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减税与改良工人生活，给民众以经济上的援助，才能发动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否则是不可能的。”② 1940 年 3 月 11 日，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实行民生主义，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发展农工商业，改良人民生活”，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斗争中应当把握的五条纲领之一。他要求人们“应该随时把握这五条纲领，用布告、宣言、传单、论文、演说、谈话等等形式发布之。”他说：“这在国民党区域还是宣传纲领，但在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地则是行动的纲领。”③ 1940 年 12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论政策》中，指出：“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④ 在执行政策时，既要反对右倾错误，也要反对“左”倾错误。同时，对若干具体政策，作了明确指示。其中对减租减息政策，做了量的规定，指出减租减息不能减得太多。“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提高时，可以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老帐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⑤

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上述一系列重要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第 208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第 278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52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62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67 页。

指示，积极宣传并着手执行减租减息政策，有些地区先后颁布了若干减租减息的具体条例和法规。例如，1938年2月9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公布了《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还发出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1938年指示信第一号《减租减息单行条例的执行问题》。1940年2月1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又公布了《修正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并发表1940年指示信第31号《论减租减息的意义与执行问题》。再如，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颁布的施政纲领中也明文规定要减租减息。同年11月，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总的来看，这一阶段减租减息政策在各根据地执行的情况不同，有的地方比较普遍比较认真比较彻底地实行了减租减息，有的地方还只把减租减息当作一种宣传口号并没着手执行，还有的地方发生了明减暗不减的现象，也有的地方犯了“左”的错误。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更加艰苦的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求各根据地更加深入地发动广大群众的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更加团结一切抗日阶层来坚持敌后的长期斗争。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总结了前几年各地减租减息的情况，对进一步贯彻执行减租减息政策作出重要指示，促使各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逐步形成高潮。

第二阶段，从1942年1月到1943年10月。

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关于地租及佃权问题》、《关于债务问题》、《关于特殊土地的处理问题》等三个附件。2月4日，中共中央下发了专门对党内的《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决定》明确规定了减租减息的三条基本原则：“(一)承认农民(雇农包括在内)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故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

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的与生产的积极性。（二）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并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党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削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绅士。故于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交租交息，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三）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故党的政策，……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在对富农减租减息后，同时须交租交息，并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①《决定》还规定：在农村统一战线中，地主和农民间的矛盾，必须按上述原则作适当处理，双方都应服从于整个民族抗战的利益。“政府法令应有两方面的规定，不应畸轻畸重。一方面，要规定地主应该普遍的减租减息，不得抗不实行。另一方面，又要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的义务，不得抗不缴纳。”② 要防止“左”右倾错误的发生。《决定》的有关附件中对减租减息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明文规定。关于减租额，规定：“一切尚未实行减租的地区，其租额以减（租）低原租额百分之二十五（二五减租）为原则”。“在游击区及敌占点线附近，可比二五减租还少一点，只减二成、一成五或一成，以能相当发动农民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81—282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83页。

抗日的积极性及团结各阶层抗战为目标。”关于计息标准，规定为“应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如付息超过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超过原本二倍者，本利停付。”①

根据毛泽东审定的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各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制定和修改了有关土地政策的法令和条例，从而掀起了减租减息运动的高潮。1942年3月20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公布了第二次修正的《修正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和《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施行细则》。同年10月10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发表《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12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保障佃权是贯彻减租交租的关键》。同时，各抗日根据地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到1943年，各战略区的中心区域减租农户达85%，边缘地区和游击地区减租农户达40—50%。

第三阶段，从1943年10月到抗日战争胜利。

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减租减息运动的情况，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这一指示说明：“现在根据地已经缩小，我党在根据地内细心地认真地彻底地争取群众、和群众同生死共存亡的任务，较之过去六年有更加迫切的意义。”为此，在秋收已到时，“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指示还说明：“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86页。

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① 在毛泽东写的这个指示指导下，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了查减运动，并结合开展了除奸、反霸、反对地主把持政权和清查地主隐瞒土地等斗争。1944 年 2 月 8 日，中共中央为了进一步推动查减工作，转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西北局减租的指示的通知》。这一指示要求各地党委注意以下事项：“（一）应抓紧已彻底进行减租地区的典型例子，向所有应当实行减租而未贯彻的地区的农民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并于春耕前，一律普遍彻底减租。（二）凡已发动群众起来彻底减租的地区，应即注意对地主的团结。”“（三）在减租斗争中，应防止对地主采取过左的政策”。“（四）各地目前应即全面的检查一次减租进行情形，并具体定出春耕前贯彻减租的计划”。② 这样，查减运动就更加广泛而深入的发展起来了。到 1945 年上半年，各根据地实行查减的村庄，约占 50—80%，有的地区高达 90%。在查检运动的同时，又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总之，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减租减息运动不断深入地贯彻执行，促使各抗日根据地在经济、政治、军事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绩。它引起了农村土地关系和阶级结构的很大变化，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有力地支援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三）毛泽东论抗日战争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一贯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在整个抗日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10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第 173—174 页。

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战略决策和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由于各抗日根据地正确地贯彻执行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了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致使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我们党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最好的时期之一。

第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就非常重视知识分子问题，指出知识分子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依靠力量，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者，应该保护革命的知识分子。

1935 年 11 月 28 日，毛泽东和朱德签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还明确指出，应该“救济失学学生”，“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① 12 月 6 日，党中央在《关于改变富农策略的决定》中指出：现在在民族革命战争紧迫时期，“广大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群众也卷入了革命的潮流”，“对于那些积极参加苏维埃革命的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我们是欢迎的。”② 12 月 23 日，毛泽东在瓦窑堡政治局会议讨论军事问题时，更进一步提出，要大量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到游击战争去。12 月 25 日，瓦窑堡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对知识分子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指出：“新的反日的民族革命高涨，不但推醒了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中更落后的阶层，使他们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而且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知识分子，现在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第 581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第 587 页。

又转入了革命。”“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可靠的同盟者。”《决议》不仅重申应该“救济失学学生”、“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而且阐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政策：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不问他们过去是否是国民党员，或在国民党政府中工作，都能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待，苏维埃给予他们以工作、救济他们失业，给予他们以发展文化、教育、艺术、科学及技术天才的机会。一切受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国民党政府所驱逐、轻视与虐待的知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与新闻记者，苏维埃给予托庇的权利（一切这些人都可到苏区来）。“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与新闻记者（不问他们的出身是地主、富农或资本家），苏维埃都给予选举权与被选举权。”① 1936 年 3 月 1 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签发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布告》明确宣告：“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②。

由此可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时，就十分注意争取知识分子，注意解决知识分子问题。

第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深入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威望和影响的不断提高和扩大，大批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看到中华民族解放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掌握抗日救国本领，报效祖国的地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期，第 610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第 9 页。

方是抗日根据地，于是他们冲破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这既说明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又说明我党我军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绩。广大知识青年积极参加革命和我们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所取得的成绩，显然都是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非常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分不开的。

毛泽东先后发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工人〉发刊词》等重要著作，在论述整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基本问题时，亦阐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是一个阶级。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生活条件、政治立场等方面来看，他们中的大多数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中，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者。”因为他们或多或少的有科学文化知识，富有政治敏感性，所以，“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① 毛泽东认为，辛亥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毛泽东进一步指出：“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1页。

的。”[①] 他还强调，“工人阶级应欢迎革命知识分子帮助自己，决不可拒绝他们的帮助。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就不能进步，革命也不能成功。”[②]

毛泽东在高度评价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时，也指出知识分子本身也存在着缺点，即“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尽管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但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③]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分析，是符合我国知识分子实际情况的，是非常科学的，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第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及时纠正“左”倾错误，并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战略决策。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都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参加工作，而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势力却极力和我们争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这时，由于许多干部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开展游击战争、进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而对吸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方面的工作重视不够。有一些同志没有认识到知识分子对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也有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2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1—642页。

一些同志仍存在着恐惧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多次指示党政军各部门，都要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克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革命工作。

1939年6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结论时指出：当前，“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我们应记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犯过的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的经验教训，“不蹈过去的覆辙。”我们的“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引革命知识分子。”要说服工农干部，不要怕知识分子。“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工农没有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①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全面地论述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重要意义。他说：“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② 因此，“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政策，今后决不应重复”。③ 毛泽东在肯定抗战三年以来，我党我军在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工作和民众运动，发展了统一战线的成绩的同时，指出仍存在着不足之处，即：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12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0页。

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他认为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拚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尤其不懂得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毛泽东要求全党，今后应该注意："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①。1940年1月2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的党内指示中，再次强调，要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知识分子"②。

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论政策》，又一次强调："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而且"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③

与此同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也多次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1939年12月6日，军委根据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的12月1日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要求各部队及各政治机关"彻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1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8页。

底纠正一切排斥与拒绝知识分子参加我们军队的倾向。”“就地尽一切努力吸收知识分子及半知识分子参加我们的军队。”[①] “1940年2月10日，中央及军委发出的《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要求“收集大量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信任他们，坚决打破排斥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②] 翌日，中央及军委又发出《中央、军委关于我军的战略任务的指示》，要求萧克等同志要“注意扩大随营学校（或办抗大分校）”，“大量的放手的从平津冀东各地招收革命知识分子或半知识分子。”同年10月12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陈毅等，指示其要“大批收容知识分子，只须稍有革命积极性者，不问其社会出身如何，来者不拒，一概收留。开办大规模抗大分校，如有学生可收容四五千人，并从上海招收学生开办财政经济人员训练班，行政人员训练班，开办普通中学及师范学校（收容积极性不足而愿作教育工作之青年），开办党的训练班，为建设广大根据地之用。”[③] 同年12月13日，中央书记处又发出《中央关于开办学校大量招收青年职工和知识分子给中原局的指示》，指出：“开办大规模学校是你们开展工作的中心一环。”“你们的学校应尽量招收上海及苏北的广大青年职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及半知识分子，准备办两万人的大学校，不分男女、信仰、党派、阶级，只要稍微有点抗日积极性的，一概招收，来者不拒”[④]。此外，中央书记处在给华中、琼崖等地的指示中，也都提出吸收知识分子的问题。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后，八路军、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213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286页。
③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474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77页。

新四军及各抗日根据地都积极贯彻执行，大批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冲破重重困难来到各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底到1942年底，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就有10万人之多。从抗大第三期学员统计中看，他们来自除西藏、青海之外的全国各省市。还有许多是来自越南、泰国、缅甸、印尼、马来亚、加拿大、巴拿马的爱国华侨。这些来自各地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四，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十分重视教育，注重举办各类学校，成立各种学术团体，开展学术交流，积极培养知识分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就了大批人才。

只有重视文化教育事业，才能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就明确指出发展教育是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任务之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压迫之下，文化教育事业极端落后。陕甘宁边区刚成立时，“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少。”①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和边区建设的需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大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积极培养教育知识分子。为此，在边区举办各级各类学校，提倡干部在职学习，成立学术团体，开展学术研究，开展文化活动等等。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培养教育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提高工农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积极举办各类学校。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使大量初到根据地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尽快适应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一般是先安排他们

---

①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第37页。

到学校去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训练，再分配工作。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根据地的原有干部，也需要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因此，党中央先后在陕甘宁边区创建了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军政研究院、军事学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校、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延安大学、行政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中国医科大学、西北工学、部队艺术学校、八路军抗日军人家属学校、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新文字学校、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鲁迅师范学校、边区职业学校、纺织学校、边区医药学校等等学校。其他解放区也都先后建立了各级各类学校。

这些学校的学员一部分是原红军干部，但大部分是各地来解放区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例如抗大 1938 年 4 月第四期开学时，共有学员 5562 人，其中知识分子就有 4655 人，占学员总数的 80%。

毛泽东对这些学校非常关心，从学校的教学方针、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到学校领导、教员的工作安排，学员的招收、教育训练、毕业分配等等问题，都进行不断的指导。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各学校去讲政治理论课、作形势任务报告，出席开学、毕业典礼，参加重要活动，等等。

1937 年 10 月 23 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成立和开学题词，表达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殷切期望。题词写道："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

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解决。”

1938年，毛泽东出席了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典礼、抗大四期三大队开学典礼，并在这些会上作了演讲。他参加了陕北公学第一期第六、七、八、九、十大队毕业典礼，抗大三期二大队、三大队和抗大第四期毕业典礼，在这些会上，也都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到艺术学院去讲了怎样做艺术家，到陕北公学讲了关于张国焘叛党以及被开除党籍的问题和时事问题等，到抗大讲了我们对三民主义的态度、两党合作的问题、政治上的持久战等，到中央党校讲了要先做学生、后做先生，做战争领导者的问题，等等。毛泽东的这些讲话，使广大学生受到极大鼓舞和深刻教育。他在抗大的讲话中提出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成为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自我修养的行动准则，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奋斗目标。

在这一年，毛泽东还为学生的来源、毕业分配和使用作了多次指示。例如，关于抗大第五期招生问题，毛泽东曾致电朱德、彭德怀等说，抗大五期需招大批学生，凡热心自愿来此就学者之青年学生及工农分子，年龄、性别、信仰、学历等不加限制，一律欢迎。随到随收来者不拒，不须考试，保证入学。关于抗大学生的使用问题曾指出：我们的意见主要是用于发展我们自己领导的游击战争。

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这些学校的关心支持，这些学校越办越好，为革命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例如：抗大除总校外，还在各根据地办起了12个分校，总校和分校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共办了8期，培养了十几万军政干部；鲁迅艺术学校共办了5期，其中文系、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毕业的学员近700人；中国医

科大学共招收了14期军医班学员，培养出近万名医务工作者。这些人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的锻练，走上了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的道路，成为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培养革命的知识分子，使工农干部知识化，除举办各类学校外，还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教育形式，开展在职干部学习运动是重要途径之一。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培养造就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大力提倡工农干部知识化，除强调应使他们进学校学习外还特别强调开展在职干部的学习运动。通过学习运动，使理论文化水平不同的新老干部都得到提高，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全党干部理论文化水平的提高。1939年6月，他在为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所写的提纲中，肯定六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发起的全党干部学习运动，对于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除了讲述学校在培养干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取得很大成绩外，还指出开展在职干部学习运动的问题。他强调“党政军民学各种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学习时，应按其程度，“文化与理论或并重或偏重。”在职学习，“是一种长期大学校。”学习的安排是“一面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要建立“每日二小时学习制。”为了推动在职干部学习运动的开展，他要求“自动与强制并重”，学习理论与学习文化一致。“勤学者奖，怠惰者罚。”他还指出“各级机关学校部队均设干部教育领导机关人员。”[1] 同年12月1日，毛泽东在要求全党全军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工作

---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117—118页。

的同时，又强调要“切实地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①] 同年12月6日，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吸收知识分子及教育工农干部的指示》，指出要“就地尽一切努力吸收知识分子及半知识分子参加我们的军队。”同时指出“老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很少。”“对工农干部，尤其是农民干部，应该号召他们好好学习文化与政治。”《指示》强调指出：“不识字和无知识绝不是共产党员和八路军的光荣，而且不识字和无知识便不能成为很好的共产党员和八路军的好的干部。工农干部应该知识分子化，工农干部无论其革命历史怎样久，若不求上进不学习，便无发展前途，便会落伍和堕落。”为此《指示》要求应该尽力抽调一些老工农干部（尤其是中上级的工农干部）到学校中去学习，同时要求政治机关“应该有长期计划来教育这些干部。”[②] 随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出一系列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1940年1月3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凡不识字的或文化水平过低的干部必须以学习文化课消灭文盲为主。”[③] 这一指示还具体规定了各种课程的内容。3月20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对1月3日的指示中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问题，作了补充规定。这一指示根据不同情况对在职干部分四类进行不同要求，指出当前在职干部大致分为：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老干部；文化理论水准都较低的老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620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213—214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227—228页。

干部；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新干部；工农出身的新干部等四类。对于文化理论水准较低的新、老干部，提出文化课与理论课同时并进的学习原则。10月20日，中央宣传部发出提高延安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在肯定在职干部教育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同时，要求加倍提高学习的质量。10月26日，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对教学计划、教材内容、教学方法等做了具体规定。

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亲自出席在延安举行的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并作了重要讲演，他阐明了在职干部学习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学习运动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他说：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就必须要学习，无论党政军机关和学校的干部，“都要增加知识”，只有加强学习，“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他指出在职干部应该长期坚持学习，应该“学到底。”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支持下，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广泛深入地发展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一些学术团体，开展了学术研究活动。

(3)毛泽东积极支持学术团体的建立和学术研究活动的开展，使知识分子得到进一步培养和提高。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要求一切有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我们中国的历史，研究当前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时，毛泽东首先组织了一个学习哲学的小组。在毛泽东的这个小组带领下，1939年冬，延安成立了新哲学会，这是边区的第一个学术团体，会长是艾思奇，会员有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人。1940年6月，新哲学会召开第一届年会，进行了哲学学术报告和学术讨论，毛泽东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随后，在延安还成立

了文学研究会、新文字研究会、音乐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戏剧家协会、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延安分会等文学艺术团体。

1940年2月5日，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毛泽东亲自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意义，阐明“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要求人们掌握更多的自然科学知识，更好地做好革命工作。在研究会的领导下，成立了机电、化学地矿、炼铁、农学、气象、数理、生物、医药、航空、土木工程等十几个学会。1941年8月，自然科学研究会举行了第一届年会，交流了学术研究成果。

第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当时情况，制定了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胆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

毛泽东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极为重视，他深刻地指出：“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待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1]他要求全党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其主要内容大体上是：

（1）在政治上尊重和信任知识分子，把他们看作是人民革命事业的可贵资本，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积极培养教育，对符合入党条件的要积极吸收他们入党。

抗日战争初期在根据地内，有的地方对知识分子不够信任，甚至以防止奸细混入革命队伍为理由，对知识分子采取怀疑和防范的态度。党中央和毛泽东多次提出要纠正这种错误观念。要把知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0页。

识分子看成是自己人，是人民事业可靠的资本，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应该充分信任。要“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①] 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第一次科技人员文艺晚会上进行讲演时指出：要反对轻视科学技术工作和技术人员的观点，要明确没有技术的政治是空的，一切技术人员都应有他的政治地位，毛泽东明确指出，不能轻易地怀疑知识分子。他说：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政策之下，“毫无疑义应该充分注意拒绝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党派遣进来的分子，拒绝不忠实的分子。对于这类分子的拒绝，应取严肃的态度。这类分子已经混进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政府者，则应依靠真凭实据，坚决地有分别地洗刷出去。但不要因此而怀疑那些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要严防反革命分子陷害好人。”[②] 中央军委也指出，对于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等专门家“应有充分的信任。一般的说，专门家愈有学识和能力，则其为国民党特务利用的可能性愈小。随便怀疑这些专门家是错误的。”[③] 毛泽东多次指示，对知识分子应该帮助教育，应该使他们明白：“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④] 又说，让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磨炼，“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⑤]1938年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9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8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9－560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页。

也提出了“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军官开门”，[①] 中央军委于1941年4月23日又明确指出：“非党员的专门人才要求入党时，我们应乐于吸收他们入党，对他们作苛刻的限制是不适宜的。”[②]

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多次指示，各地党政军部门都注意了对知识分子的培养教育和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问题。大批知识分子按照毛泽东的教导，走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经受了实践的锻炼，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37年抗战开始到1940年党员人数由4万人增加到80万，其中知识分子有相当的数量。据陕北公学的老同志回忆，当年在总校学习的青年知识分子共3000多人，其中有1500余人在校期间入了党。抗大第四期开学时，知识分子学员中仅有530名党员，到毕业时，党员人数增加到3304人，占知识分子总数的70%。

（2）在工作上，对知识分子大胆使用，合理地安排，不硬性干涉，使知识分子充分发挥才能。

党中央和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大胆使用知识分子，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的关系，带领他们一道工作。毛泽东指出：“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分配适当的工作”，[③] 让他们在长期的革命工作的实践中锻炼成长。中央认为不仅要使知识分子做一般的工作，而且可以让他们做负责任的领导工作。中央军委指出：对于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等专门家，要“一律以他们的专门学识为标准，给以充分的负责工作，如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等”。为了保证专家们能顺利放手大胆地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67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8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页。

工作，军委还针对当时情况，作了明文规定，指出：因为现在我们许多政治委员不懂技术，往往自作聪明，结果是妨害专门家的工作，造成他们的不安，甚至随意诬告他们，限制他们。因此，“如果管理该专门家工作部门的政治委员，是不懂技术或其技术学识较低的话，则应规定该政治委员无权干涉该专门家的专门工作，亦不对上级负保证该专门家专门工作之责任，而由当地最高首长或其他高级首长直接负责任。”①

对于哲学家、小说家、戏剧家、音乐家等从事社会科学的专家，党中央宣传部规定“党的领导机关，除一般的给予他们写作上的任务与方向外，力求避免对于他们写作上人工的限制与干涉，我们应该在实际上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② 党中央为了使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得到合理的工作安排，1940 年 3 月和 1944 年 5 月，曾先后两次对陕甘宁边区具有一定科学技术的人进行调查、登记，发起专门人才和技术人员的归队运动。党中央为了使一些非党的高级知识分子即一些专家能专心工作，决定给他们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例如，军委规定：“对非党的专门人才，只要求他们服从我军纪律与各种规章条例，不强迫他们政治学习、过政治生活、参加政治集会及测验、上政治课等等。”“对于政治学习和政治生活，他们可以自由参加或不参加。履历表只填他们的学历及工作历史，不填政治历史（包括社会出身经济地位等），对于他们一些生活习惯不应干涉。”③ 再如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规定，“对于文化人的作品，应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宽大的立场，力戒以政治口号与偏狭的公式去非难作者”。又说：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3 册，第 84—85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2 册，第 496—497 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3 册，第 85 页。

"共产党人应有足够的气量使自己能够同具有不完全同我们一样生活习惯的文化人，共同生活、共同工作。"①

(3) 在生活上，要关心照顾，给以物质优待，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在当时残酷的战争年代，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条件虽然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是决定要尽可能地关心照顾好知识分子。在生活待遇方面制定了一些具体的条例、规定。从而使他们解除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专心努力工作。

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广大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都找到了用武之地，充分施展了自己为人民服务的专门才能。在生活上，他们及其家属都受了关怀和照顾。广大革命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了革命积极性，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战争的胜利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 毛泽东关于民族、宗教、华侨等方面的统战思想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还非常重视民族、宗教、华侨等方面的统战工作。他提出和阐明了党在这些方面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充分调动各少数民族、宗教人士、爱国华侨的抗日救国的积极性，使他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作用、贡献力量。

1. 关于民族政策

毛泽东强调，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97页。

的国家。各个民族的人民都反对国内的阶级压迫和来自国外的民族压迫。他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统一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1]

毛泽东认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也是国内各个民族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和分裂我国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罪恶阴谋以及国民党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进一步提出和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这就是：（1）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之间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的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2）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个部厅，管理和他们有关的事务，调节各民族间的关系，在省、县政府委员中应有他们的位置；（3）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当赞助他们发展用各个民族自己的言语文字的文化教育；（4）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民族接触，使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2]

毛泽东在许多著作中反复强调上述民族政策。他在《论联合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9页。

② 《毛泽东论统一战线》，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296—297页。

政府》的报告中指出，“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上述孙先生的民族政策。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①

这就是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要坚持民族平等，巩固民族团结；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反对民族分裂主义；要逐步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保障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的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的影响和推动下，我国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团结一致，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2. 关于宗教政策

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坚决贯彻执行正确的宗教政策，使之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党对宗教的政策，总的说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从我们党成立起就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并贯穿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之中。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

---

① 《毛泽东论统一战线》，第291—292页。

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①

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党是无神论者，我们决不赞成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但是我们的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正是从这样的指导思想出发，我们一贯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因此，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明确提出："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②。

3. 关于华侨政策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非常关心广大的海外侨胞，积极争取海外华侨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励他们为祖国抗战多做贡献。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保护一切同情国家在中国的侨民及和平通商传教等事业。……保护华侨利益，并经过华侨的努力推进各国反日援华运动"。③ 同年，毛泽东在为马来亚华侨抗敌后援会代表团的题词中，希望"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并强调"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

---

① 《毛泽东论统一战线》，第300页。
② 《毛泽东论统一战线》，第301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74页。

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①] 在抗日战争时期，学习、工作和战斗在各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的归侨青年共约有 2000 人。他们在各方面表现很好。正如毛泽东在五四运动 20 周年纪念大会上所指出的，“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到延安求学”，他们“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②]。1940 年五六月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广大军民在延安热情欢迎陈嘉庚率领南洋侨胞回国慰问团的到来。毛泽东高度评价陈嘉庚和广大华侨为祖国的抗战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并称陈嘉庚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941 年 3 月 14 日，毛泽东致电司徒美堂等先生，指出奉读电函，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无已。“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迄未稍变，惟对于亲日派及反共派危害抗战之滔天罪行，不得不谋所以制裁之道”。“尚祈公等一致主张，予以赞助，以期迅速见之实行”[③]。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博得了广大爱国华侨的热情拥护，对争取和团结华侨援助祖国的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

① 蔡仁龙、郭梁主编：《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1987 年，第 49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68 页。
③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 555 页。

五　抗日战争反攻阶段，毛泽东关于以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为目标的统一战线思想

从1944年开始，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反攻阶段的到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从相持阶段进入到反攻阶段。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对日本侵略者的局部反攻。在进入反攻阶段后，毛泽东提出了改组国民党政府、建立由各党派代表组成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思想。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思想，是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延安时期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这一思想达到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毛泽东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

1. 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背景

1944年8月中旬，毛泽东开始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把握当时国际国内局势、正确提出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不断推动抗日民主运动发展的结果。

毛泽东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是在以下历史背景下提出的。

首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反攻阶段。1943年2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联红军取得了歼灭德国精锐师团33万多人的伟大胜利。这次战役，成为苏德战争的转折点。随后，苏军持续不断地发起反攻，收复了大片国土。1944年，苏军对德军进行了连续10次歼灭性的打击，歼俘德军士兵约200万人，至此全部收复国土，把战争推进到德国及其占领区内。与此同时，英、美联军也开展了对德意日法西斯的反攻作战。1943年7月，盟军占领意大利南部。9月，意大利政府向英美投降，至此德、意、日法西斯联盟土崩瓦解。从1943年8月开始，美军在太平洋上也转入了战略反攻。9月，中、美、英在缅甸也开始转入反攻，日军在战略上开始失去主动地位。11月下旬，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举行开罗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问题和日本战败后的处理问题，发表了《开罗宣言》。11月28日至12月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举行了会议，讨论对德作战行动的计划问题和战后和平问题。会议决定，英美两国于1944年5月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1944年6月6日，英、美联军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6月15日，又在法国南部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苏联军队的胜利和英美联军第二战场的开辟，标志着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决战阶段。这也极大地鼓舞了东方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和士气。

其次，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始摆脱相持阶段所遇到的严重困难，力量得到恢复和发展，转入了局部反攻。在晋察冀根据地，1944年军民共作战4400多次，毙伤日、伪军以及伪军投诚、反正的共达2.2万多人，拔除敌据点、碉堡1600多个，解放人口758万，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扩大。在晋冀鲁豫根据地，1944年军民共毙伤日、伪军3.8万

余人，俘日、伪军3.49万人，解放人口500多万，收复国土6万余平方公里，改变了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晋绥抗日根据地军民积极发起攻势，这一年解放村庄3000多个，解放人口40余万。在山东抗日根据地，这年山东军民歼日、伪军近6万，解放人口930余万，形成了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五个巩固的根据地。在华中抗日根据地，这一年新四军歼日、伪军5万余人，解放国土7400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60余万。在华南抗日根据地，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主动出击，给敌人以很大打击。此外，在1944年，八路军还派出部队开辟了拥有20个县300万人口的河南新解放区。至1945年春，全国已有19个解放区，总面积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余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民兵220万。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不但在战略上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和英美盟军的对日作战起着重大的配合作用，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推动抗日民主运动发展、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

再次，国统区民主运动得到发展。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实行独裁专制的法西斯统治，人民的言论、出版、通讯、集会、结社、罢工等民主和自由的权利遭到野蛮的剥夺。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各阶层人民要求民主的呼声日趋强烈。除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民主运动外，一些民主人士也积极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统治。在国民党内不仅宋庆龄、何香凝、李济深、冯玉祥、陈铭枢等民主派强烈要求改变现状，而且连孙科、邵力子、张治中以至王世杰、张群等人也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都表示不满。在国际上，同盟国诸国的舆论也希望国民党消除政治腐败，推行民主，积极抗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蒋介石尽早实施宪政，解决党派纠纷。在这种形势下，

国民党于1943年9月6日至13日在重庆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被迫通过《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之决议案》，决定“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之”。[①]9月18日，召开了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蒋介石在会上表示：“我们抗战胜利之日，即是开始宪政之时。”[②]10月2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设置宪政实施协进会。尽管国民党实施“宪政”只不过是缓和国内各党派的不满情绪和蒙蔽国际视听的假把戏，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力量却对此予以认真对待。中国共产党表示，愿意同蒋介石国民党“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③]并派林伯渠作为代表去重庆同国民党代表谈判。民主党派方面，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向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提出了《加强实行民主以求全国团结而济时艰案》，批评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要求实现民主宪政，建立真正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家。1943年9月18日，张澜所著的《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书出版发行。该书对民主政治作了系统阐述，指出国民党只有彻底废除一党专政，才表示“确有诚意”准备实施宪政。该书是民主同盟在国统区开展民主宪政运动的纲领性意见，但遭到国民党的查禁。1944年春，民主政团同盟和各界民主人士，在中共的组织和推动之下，先后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等地利用报刊和集会的形式讨论实施宪政的问题，抨击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统治，要求民主自由，主张开放政权，得到了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和广泛支持。1944年5月，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表示“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十足地道的民主国家”。从1944年开始，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进入了一个

①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844页。
② 《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第1210—1211页。
③ 《解放日报》，1943年10月5日。

新的发展阶段。

第四，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导致了豫湘桂战役大溃败，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从1943年开始，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为了挽救失败的危局，他们便集中兵力打通大陆交通线。1944年4月18日起，日军从河南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国民党军队不积极抵御，甚至不战而逃，致使日军长驱直入。四五月间，日军先后攻夺了郑州、许昌，打通了平汉铁路。6月至8月，日军在向湖南进攻时，先后攻占长沙、衡阳，并向广西进攻。在很短的时间里，大片国土沦丧于日军之手，数千万同胞流离失所或陷入敌人的铁蹄之下。全国各阶层人民对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如此腐败无能造成大溃败表示出强烈的愤怒。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实行独裁专制的统治，特务横行，毫无民主可言。在经济上四大家族巧取豪夺，横征暴敛，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更使人民感到忍无可忍。与国统区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显示出团结、民主的生机勃勃的景象，并在抗日中做出有目共睹的成绩。在这种情况下，改组国民政府，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成为国内各阶层人民越来越强烈的要求。

2. 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

毛泽东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经历了一个过程。在1944年8月提出这一设想和计划之前，国共双方从1943年底开始进行了几个月的接触和谈判。

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和蒋介石表示要在抗战结束一年后实行“宪政”的情况下，毛泽东于1943年10月5日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表示：“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

判。”

10 月 5 日，毛泽东又致电留在重庆的董必武，指示对国民党采取缓和态度。根据这一指示，董必武于 10 月 15 日出席了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1943 年底的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的时期，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在这种国际形势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派何应钦、白崇禧向中共代表董必武表示：欢迎延安方面派人来重庆谈判；同时又令国民党驻在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向毛泽东表示：要求林伯渠、朱德和周恩来前往重庆，并谈到何、白皓电和西北军事问题。对此，毛泽东于 1944 年 1 月 16 日在答复郭仲容时指出：谈判可以何、白皓电为基础，反攻时胡宗南部与边区部队可按比例开往前方；中共拥蒋抗战和拥蒋建国两项方针不变。2 月 2 日，国民党复电延安，表示欢迎周恩来、林伯渠、朱德三人去重庆。为了试探国民党对和谈的诚意，毛泽东于 2 月 17 日又告知郭仲容，我党决定先派林伯渠去重庆谈判。从此之后，国共双方都转入进行谈判的准备工作。4 月 29 日，中共代表林伯渠、王若飞、伍云甫等人离开延安，在 5 月先在西安后到重庆与国民党代表开始谈判。

在恢复与国民党谈判的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决定推动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自国民党宣称要在抗战胜利一年后实行宪政，国统区各种民主力量从 1944 年初开始开展了一个“宪政”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44 年 3 月 1 日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这个文件指出：国民党在国际、国内形势逼迫及舆论要求下，不得不允许于抗战结束一年后实行宪政，并允许各地在其种种限制下讨论宪政问题；虽其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借以拖延时日，巩固国民党的统治，但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就有

可能逐渐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中央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文件规定，除我党代表已参加重庆方面国民党召集的宪政协进会议外，延安亦举行宪政座谈会；各根据地亦可于适当时机举行有多数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借以团结这些党外人士于真正民主主义的目标之下，并向党内干部说明党对宪政运动的政策，防止过左、过右的偏向，检查三三制执行情形，力求巩固与非党人士的民主合作。同年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讨论宪政问题。会议认为，要坚持新民主主义原则，参加宪政运动，表明我党愿从政治上解决。3月12日，周恩来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决定，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作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讲，向边区各界人士宣传了党关于宪政问题的态度。3月21日，中央宣传部在《关于目前国内问题宣传政策的通知》中指出：在国共关系已趋于缓和的情况下，我们为了继续团结国民党，准备对日反攻计，应该争取时局的进步，应改变过去对国民党公开正面猛烈抨击的态度；在现在时期，“宣传上采取和缓态度亦是正确的，必要的”。事实证明，这种宣传上的和缓态度是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灵活巧妙运用，对于配合国共谈判和争取民主人士是有利的。

由于国民党并不想放弃一党专政，对谈判缺乏诚意，因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谈判和争取民主的斗争是十分艰难的。1944年5月15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指出：“为克服目前困难局面，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中共方面认为唯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 急切的问题。”电文中共提出了要求实行民主与自由、开放党禁和承认各爱

国党派的合法地位、实行人民地方自治等涉及全国政治和国共两党悬案的内容二十条，指示林伯渠以此为基础与国民党代表谈判。5月22日，林伯渠将毛泽东在电文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要求二十条交给了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双方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争辩，最后国民党拒绝中国共产党方面提出的要求。5月23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致电中央，报告了谈判的情况，估计了谈判的形势，并提出了随着情况的变化而改变原来一些打算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及时改变策略，将原来的二十条谈判内容改为十二条和口头要求八条，[①] 以利于谈判的进行。由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缺乏谈判诚意，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态度，谈判未能取得进展。

到了1944年8月间，国民党战场的大溃败局面日益显露，英、美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的批评态度越来越明显，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绩却表示赞赏，美军观察组还赴延安进行考察。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抓住时机，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8月17日，当董必武致电周恩来请示对国民党和张（澜）、左（舜生）等商议加补参政员名额我党应取如何态度时，毛泽东批示说，应与张、左商量各党派联合政府问题。8月18日，毛泽东又提出，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才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

9月4日，中共中央就改组国民党政府、成立联合政府问题给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发出指示，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

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02—704页。

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指示还说：“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指示还要林伯渠等人起草回答张治中、王世杰等人的信中加上改组政府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以说明这是我们对于实施民主政治的具体步骤和主张；同时要求在这次参政会中，如取得小党派及进步人士同意，可将该项主张作为提案，即使不得通过或改变性质地通过，我们仍可向国内外宣传。① 9月7日，中共中央又向正在出席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的林伯渠等人发出指示，说：“同意你们用我党中央名义致函参政会，并利用林在参政会报告机会，提出我党改组政府之主张和步骤的办法，并联系说明这是原来提案中三条政治主张的具体解决方案。”②

9月15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作关于国共谈判情况的报告时，正式提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和要求。他在报告中郑重声明说：“我坦白的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材，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③ 10月10日，周恩

---

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38—739页。
②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40页。
③ 《林伯渠在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1944年9月15日）。

来在延安各界庆祝双十节集会上发表讲演时，又阐明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召开国是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措施和步骤，即：第一，各方代表应由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自己推选，人数应按各方面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比例规定；第二，国民政府应于最近期间召开国是会议，以免延误事机，陷大后方于不可收拾的地步；第三，国是会议应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必须通过切合时要、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以彻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错误政策；第四，在众所公认的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之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以代替目前的一党专政的政府，吸收全国坚持抗战、民主、团结的各方领导人物，罢免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分子，以保证真正民主政治的实现；第五，联合政府必须有权改组统帅部，容纳各主要军队代表加入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以保证抗战的胜利，第六，联合政府成立后，应即重新着手筹备真正的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准备于最短期间召开，以保证宪政的实施。周恩来还强调：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是挽救目前危机切合时要的唯一正确的方案”，只有这样的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才是全国民主的真正起点”。①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召开国是会议、改组一党专政的政府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和要求公布于众后，立即在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把该党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并随即发表声明，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

① 周恩来：《如何解决——周恩来双十节讲演》（1944年10月10日）。

行民主政治”。[1] 9 月 24 日，重庆各党各派各界代表共 500 余人集会，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0 月上旬，成都一些学术团体举行国是座谈会，也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以上表明，国统区的民主运动随着关于成立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而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二）毛泽东同赫尔利会谈民主联合政府问题，《延安协定草案》的提出

1. 赫尔利使华及其背景

在国民党政府面临严重危机、中国国内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同时，美国政府越来越关注国共关系的变化及处理。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即已开始注意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但一般采取谨慎和不介入的态度。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美军开辟了太平洋战场后，美国政府对国共关系的处理呈现出越来越积极的姿态。1943 年底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总统与蒋介石就今后的中美关系问题进行了协商。

当时，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对日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战火越来越燃近日本本土，但日军仍进行拼死抵御，美军受到很大伤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战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然而，令美国政府失望的是，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出现大溃退的局势，国民党政府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如何加强中国战场的对日作战力量，

---

①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年 4 月版，第 32 页。

防止国民党政府崩溃，更重要的是在战后如何得以实现中国各种力量的统一和控制亚洲太平洋地区，已成为美国政府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敦促蒋介石和国民党迅速着手改善中苏关系和解决国共矛盾。7月22日，由包瑞德上校任组长，还有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等人参加的美军观察组飞抵延安进行考察。正在这种背景下，曾担任美国陆军部部长的赫尔利少将，以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的身分，于9月6日来到中国。他来华的使命是：(1)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2)支持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的主席与军队的委员长；(3)使蒋委员长与美国司令官间的关系和谐；(4)增进中国境内战争物资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5)为击败日本计，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①

赫尔利到达中国后，在调整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紧张关系的同时，又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如何调处国共矛盾方面。到达重庆后的第二天，赫尔利就与蒋介石见面会谈，敦促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举行谈判；并对蒋介石说：苏联并不支持中共，不必对此问题存有疑虑。9月12日，赫尔利向蒋介石提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10点建议。建议提出：为打败日本和解放中国而实现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统一，同时应在蒋介石指挥下统一中国的军队和在民主基础上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统治。这就是当时美国政府解决中国问题和调处国共矛盾的目的和原则。赫尔利还与国民党同中共谈判的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人频繁接触，以争取他们同意美国方面提出的建议。

正在这时，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中共代表林伯渠于9月15日在

---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39页。

会上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召开国是会议以改组政府，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此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又发表声明要求组织联合政府，指出这是克服目前危机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根本办法。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得到热烈反响，并得到他们的一致赞同。正在与蒋介石谋划国共谈判问题的赫尔利，对这一政治势态极表关注。他担心的主要不是联合政府问题，而是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有可能不被承认的问题。因为扶持蒋介石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出发点。在这种情况下，赫尔利转而建立和加强与中共代表的联系。在美国驻华使馆的安排下，他于 10 月 17 日、10 月 18 日和 10 月 24 日三次会见林伯渠和董必武，了解中共对蒋介石的态度。强调蒋介石是全国公认的抗战领袖，他的态度已有改变，希望中共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为了稳住和说服中共，赫尔利表示“中国现政府不民主”，承认中共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还表示美国政府决不对党派有所偏袒，将公平分配援华物资。[1]

对赫尔利主动与中共代表会谈的做法，毛泽东估计这表示美国有可能以中共承认蒋的地位为条件，作出某些让步。[2] 林伯渠、董必武向赫尔利阐明了中共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介绍了国共谈判的有关情况，并表示欢迎赫尔利去延安访问。

赫尔利在了解到国共两党的态度后，便于 10 月 28 日向蒋介石提出一份关于国共关系的方案，内容有五条：“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合作，实现国内军队统一，以便迅速打败日本和解放中国；二、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均承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的主席及所有军队的统帅；三、中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将拥护孙

---

〔1〕 林伯渠、董必武给毛泽东、周恩来电（1944 年 10 月 17 日、18 日、21 日）。

〔2〕 1944 年 10 月 19 日毛泽东在林伯渠、董必武电报上的批语。

中山之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双方将采取各种政策，促进和发展民主政治；四、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所有国内各政党，均予以平等、自由及合法的地位；五、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和一个军队。中国共产党的官兵，经中央政府整编后，将根据其等级，享受与政府军队同等的待遇，其各单位军火和军需的分配，亦享受同等的待遇"。[1] 蒋介石不满意这个方案，认为提案中虽承认他为领袖，但却难以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统治局面。他指派王世杰等人对这个提案进行修改，将其中第二条改为"中国共产党之军队，应接受中央政府及其军委会之命令"，并将其中第五条和第四条调换位置，以强调中共军队必须接受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修改后的方案有意拖到11月7日即赫尔利出发赴延安的时候才交到他手中。这时赫尔利已没有时间与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对此提案进行磋商修改了。

2. 毛泽东与赫尔利关于联合政府问题的会谈

1945年11月7日，赫尔利乘飞机抵达延安，与中共领导人会谈国共关系和联合政府问题。

从11月8日至11月10日，毛泽东与赫尔利举行了四次会谈。

在第一次会谈时，赫尔利一开始就声明，他是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华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此次来延安，得到蒋介石的准许和批准。他表示，美国不愿意干预中国内部的政治，他的任务是企图帮助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统一，来与美国合作，击败日本。他还说，蒋介石愿意与共产党得到谅解，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承认中国其他一切政党的合法

---

①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中国卷，第659页。

地位，承认有必要在公平基础上成立统一机构，共产党军队将获得和其他军队一样的平等待遇。随后，他拿出了由他提出并经国民党方面修改的名为“为着谈判的基础”的提案，并表示这是一个试验性的方案，可以修改，并希望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考虑这个提案作为谈判基础，提出应增改或不同意的地方。

毛泽东问：“赫少将刚才所说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赫尔利解释说：原来是他的意见，后来蒋委员长作了若干修改，“我尽力提出民主自由和希望中国多党政治的意见。”他表示他的全部意见与目标，就是团结中国全国的一切力量，打败日本，使中国成为民主自由快乐的国家，并阻止内战流血。他还表示，如果美国能在这方面加些力量并收到效果，如果蒋委员长与毛泽东能在一起获得一为着真实长久的协定的基础，那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毛泽东听了赫尔利一番话后，表示欢迎他来中国帮助中国团结抗日，欢迎他来延安访问；并指出团结一切力量，快快打倒日寇，重建民主和自由的中国是我们的共同意志。

在第二次会谈时，毛泽东向赫尔利介绍和分析了中国抗战的形势。他说，现在中国分为三个区域：敌占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对于敌占区，国民党当局是不管的；对于如何在这个地区内组织地下军以期配合同盟军登陆作战，国民党当局也是不管的。而对于解放区，国民党当局则是拚命妨碍、限制、缩小和消灭，但是解放区还是天天生长。解放区这样广大，这是八年来广大人民艰苦战斗的结果。他们前面要打日本，后面又遭国民党破坏，他们是处在被前后夹击的非常困难的环境之中。在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里，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尤以军事危机为甚。从今年的 4 月初起，在日寇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已由两三百万减至 195 万，大部分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在

那个区域里，民不聊生，土匪横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从未有像今天这样低，各界人民包括大学教授、学生、小党派人士以及国民党员，都对当局不满和怨恨。毛泽东表示，希望盟国朋友能了解中国以上三个不同地区的真相，同时对美国帮助中国抗战打败日本，感到高兴。

毛泽东在发言中，针对赫尔利带来的提案中的几点内容及其中的“政府民主程序”问题，强调当前中国的首要问题不在于“政府的民主程序”，而在于改变国民党当局过去的政策，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毛泽东指出，中国大多数人民，包括我们共产党人在内，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就是有某些协定，也是没有基础的，不可能解决问题。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政府；必须改变现在政府实行的不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旧政策，代之以适合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政策。毛泽东还进一步论证和阐述了改组政府和成立民主联合的极端必要性，严重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错误政策和专制独裁的统治。他指出：改革之所以必要，首先是为了挽救国民党直接统治区域的军事、政治、财政和经济各方面的严重危机。如果不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就无法振作大后方军队的士气，就无法挽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严重危机，虽然盟国援助大量坦克、飞机等新式武器，也是无济于事的。可是，蒋先生历次所表示的，却是想拖，拖到战争结束一年后才办这件事。有人向他提出改组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他便一巴掌打回去。如果这样下去，只有把危机拖长和扩大，使国民党政府有崩溃之危险。对于这一危险，不只是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外国朋友，如许多外国记者都是感觉到的。而在解

放区，我们进行公开工作，组织人民，实行民主，坚持抗战。我们从不妨碍国民党，而国民党却来妨碍我们抗日民主活动。国民党的195万军队，其中有77.5万人被用来包围我们，还有一部分人在进攻我们。在国民党区域，当局见到共产党人，非捉即杀，从1939年起，我们在那里的党被逼迫成为地下党。虽然如此，我们还是用一切力量对日作战，还是拥护国民党打日本。根据上述事实，毛泽东强调：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危机的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共产党的存在。

针对赫尔利的提案中关于改组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应当改组的是那些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和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现在美军观察组，参观陕甘宁边区、晋西北、晋察冀等根据地。我们在敌后有几十个根据地，愿意美军组织几百个人的观察组，到各根据地看看做出来的结论，应当改组的究竟是哪一种军队。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关于改组后我们的军队将获得与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俸和津贴，我们不同意。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饥寒交迫，走路走不动。我们的军队，吃得饱，穿得暖，走起路来蛮有劲，现在要我们拿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俸，那不是要我们军队也和他们一样吃不饱，穿不暖，走路都没有力吗？

毛泽东表示：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先生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我们并不要求一下子解决全部问题，但是要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

赫尔利在会谈中，声称“为国民政府辩护，非我所为之事”，也不愿意为它辩护，但却处处站在为国民党辩护的立场上。他不

同意毛泽东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批评的言论；认为蒋介石已同意改组他的政府，同意共产党帮助他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赫尔利一面说，在抗战八年中，蒋介石周围的贪污分子利用了他，另一面又说，中国政府内虽有贪污，但直到现在，在租借物资方面还未有贪污的事。

讨论赫尔利带来的名为“为着协定的基础”的提案，是会谈的主要议题。赫尔利表示，同意毛泽东和中共把他的文件加以修改或增加。

毛泽东表示，赫尔利将军所提出的“为着协定的基础”的文件有几条是能同意的。关于第一条，即“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解放中国”的条款，完全赞成。第三条最好放到第二条前面，并去掉“程序”等字眼，只要促进“进步和民主”就行。赫尔利对此修改表示同意。原提案中第二条即“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的条款更换为第三条后，毛泽东提出在“命令”之前应加上“一切有利于抗战、有利于团结、有利于民主的”限制词。赫尔利表示，加上这些限制词就等于限制了政府的权力，这好象是用政党来限制政府，这样的政府，还不是具有最高权力，过去的弱点不存在。毛泽东表示，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和军委会的有些命令，如皖南事变解散新四军的命令，我们的确无法服从。赫尔利说：毛主席，我并不怪你不信任曾经欺骗过你们的政府；如果毛主席参加了政府，这个政府便必须有最高权力，但必须是正当的政府。接着赫尔利请毛泽东关于改组政府的问题写上一条，作为提案修改后的第三条。毛泽东提出第三条的内容是：“将现在的国民政府改组为由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并宣布和实行关于改革军事、政治、经济、

文化各方面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同时改组统帅部，成为联合统帅部，由各抗日军队代表参加。”赫尔利表示，可以加上这一条，我们应尽可能公正，以期取得国民政府的同意。毛泽东又指出，这一条内容经过修改后，还要加上各种自由才好。对此，赫尔利表示同意。经过双方协商和补充，提出确定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屈之自由、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

关于原提案中第四条的修改，毛泽东提出，可以把旧的第二条和第四条合并为新的第四条，因为都是讨论关于军队的问题。“一个政府和一个军队”这种提法可以不要。鉴于蒋介石企图解散和消灭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的野心，毛泽东提出，第四条中最好还应加上这样的条文，即共产党的军队及解放区的民兵，在抗战时期，为着有效地对日作战，应维持其现状，并帮助其必需品；在战争结束后，按照国防需要，重新规定其编制；关于盟国物资，应按照抗战成绩的比例加以分配。赫尔利则认为，有了联合政府，一切军队就要国家化，不要特别化；如果加上这样的条文，反而妨碍前面几条的效力。毛泽东明确地向赫尔利揭露了国民党方面企图解散人民抗日军队的计划，说：这一条不要也可以，但事实上国民党方面是要提出来的，不久以前，它不是说要解散我们五分之四的军队吗？我看先编十几个师，其他让其存在，在敌后继续对日作战，这样也可以。赫尔利则一再强调，若蒋同意改组，则一切都要在联合政府之下，包括国民党军队在内。双方经过协商，第四条的条文开始确定为：“一切抗日军队应遵守和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之命令，并应为联合政府与其联合军事委员会所承认。联合国所供给的物资，应按照各抗日军队抗战成绩的比例加以分配。”但赫尔利认为这条的后一句虽是公平的，但

似乎不必写上，如果毛主席加入统帅部，就可以在那里坚持，以达到解决问题。问题在于国民政府和统帅部的好坏。最后，第四条后一句根据赫尔利的意见改成为："从盟国得来的物资，应加以公平分配。"

关于第五条内容，会谈中赫尔利请毛泽东提出修改。毛泽东提出的条文为"中国联合国民政府，应承认共产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赫尔利表示，这条修改得非常好。第五条修改完后，毛泽东表示，就这几条，为了妥协就不再多提了。赫尔利对毛泽东的态度感到高兴，表示：从今天的谈话中，我感觉到毛主席的热情与智慧。

3.《延安协定草案》的提出

从1944年11月7日至10日，毛泽东与赫尔利经过会谈和磋商，将赫尔利的提案"为着协定的基础"改名为《延安协定草案——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修改后的内容包括以下五条：

（1）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2）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3）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屈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

自由之各项政策。

（4）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5）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①]。

从前面所介绍的双方的会谈情况和《延安协定草案》的内容看，毛泽东在同赫尔利谈判时，既作了某些问题上的让步，又坚持了原则，从根本上维护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利益，维护了全国人民的利益。这个协定草案与赫尔利所提出的方案相比，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不同点：

第一，赫尔利的提案只提到“中央政府被改组”和“只有一个国民政府”的说法，没提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实际上是在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而协定草案则明确规定，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这就否定了国民党顽固坚持的一党专政，使中国共产党自 1944 年 9 月中旬以来正式提出的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美国方面的承认。这是延安会谈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

第二，在军队问题上，赫尔利的提案只单方面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既没有提改组军事委员会事项，也没有规定改组国民党军队之事，这实际上是在限制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因而有利于国民党政府伺机达到解散它的目的。而延安协定草案则明确规定，在建立联合政府的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一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2 册，第 638—639 页。

合军事委员会”，“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这一规定，否定了蒋介石和国民党一党治军的专制统治，有利于打破他们保存自己实力、编散或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阴谋。

第三，在民主问题和民生问题上，赫尔利的提案只空泛地提出“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并没有提出如何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改善民生的问题。延安协定草案则明确规定“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屈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还要实行用以实现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的各项政策。虽然上述规定的民主自由权利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自由范畴，但在当时对中国人民来说，却还是非常需要的东西。这些规定如能付诸实施的话，对于打破蒋介石国民党的封建式专制统治和严密的特务统治是有重要作用的。

《延安协定草案》的提出，说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真正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利益，说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统一战线思想在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协定草案规定的五条协议，基本上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原则，对中国人民抗战和争取民主的斗争是比较有利的。毛泽东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评价这个协定说，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毛泽东还表示：我们一向愿意和蒋主席取得用以促进中国人民福利的协定。今一旦得赫尔利将军之助，使我们有实现此目的之希望，我非常感谢总统

代表的卓越才能和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①

赫尔利之所以同意这一协定，是因为他认为协定的五点内容“几乎所有的基本原则都是我们的”②，是公平合理的。他认为，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方式解决中国国共两党矛盾问题，不但不会损害国民党的根本利益，而且在政治上和道义上会加强国民党，并可消除国民党政府当时所面临的军事崩溃的危险。③

在协定签字之前，会谈双方还就一些问题交换了意见。赫尔利还担心中共把蒋介石抛弃了，便问，接受这五点，是否意味着蒋介石还在政府里面？是否要他当政府主席？当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回答后，赫尔利高兴地表示：我深信毛主席是真正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当中国二大领袖在一起，增进团结，消灭内战，使中国真正成为四强之一，这是多么好啊！毛泽东则向赫尔利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1）关于我们所同意的文件，请赫尔利将军转达罗斯福总统；（2）关于我们与赫尔利将军商谈的纲领协定，我们已经取得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并授权我在文件上签字；（3）我今天还不能与赫尔利将军同去重庆，而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赫尔利对此表示完全同意。最后，毛泽东指出：我们以全力支持赫尔利将军所赞助的共同纲领，希望蒋先生也在这个纲领上签字。抗战八年来未能得到的东西，今天在赫尔利将军帮助之下有了实现的希望。在这个纲领下，全国一切力量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建立新中国。

---

① 《毛泽东给罗斯福的信》（1944 年 11 月 10 日）。

② 《陆军少将赫尔利致罗斯福总统》（1944 年 11 月 16 日），《美国对外关系》1944 年中国卷。

③ 《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1945 年 1 月 31 日），《美国对外关系》1945 年中国卷。

11 月 10 日中午，毛泽东与赫尔利分别在协定草案上签了字。下午，赫尔利同中共代表周恩来乘飞机离开延安飞达重庆。

（三）毛泽东坚持民主联合政府主张，批判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

1. 赫尔利对调处态度的逆转，毛泽东坚持联合政府主张

1944 年 11 月 10 日下午，赫尔利在《延安协定草案》上签字后，匆匆离开延安飞回重庆。中共中央派周恩来随赫尔利赴重庆，与国民党方面继续进行谈判。

国民党政府对延安协定中的五点协议表示坚决反对。蒋介石知道国民党政府十分脆弱，经不起民主改革。他对赫尔利说，他不愿意造成南斯拉夫和波兰那种局面。五点协议在美国和英国可以作为解决争端的办法接受，然而在中国却意味着国民党的彻底失败。蒋介石还表示：在没有承认国民党被彻底击败之前，他决不会同意改组政府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宋子文也认为，中国共产党给赫尔利“开了一个旧货单子”，国民党永远不会接受中共的要求。赫尔利没想到符合美国民主精神的并为自己所接受的延安协定会如此遭到国民党方面的强烈反对。然而他对这种反对态度并未看重。他认为，只要改换联合政府的名称，把“联合”改为“多党”或“两党”的名字就可以解决问题。[①] 他批评国民党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不愿意中国团结，多次要求蒋介石在政治上作出让步，接受五点建议。在赫尔利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于 11 月

---

① 《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1945 年 1 月 31 日），《美国对外关系》1945 年中国卷。

15 日和 17 日两次提出反建议案。两个议案都拒绝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规定“中国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并只以承认中共及其军队为条件，单方面调强“中共军队应当遵守和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国防军委会的命令”，要求中共“充分支持国民政府”，“将其全部军队交于国民政府和国防军事委员会控制”。①

赫尔利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两份议案都不满意，并予以拒绝。他认为，蒋介石“无法证明他的观点是对的”，并致电罗斯福反映了这一情况②。11 月 18 日，罗斯福回电，指示赫尔利要求蒋介石尽快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③ 赫尔利虽试图压服蒋介石接受五点协议，但碰到的却是一个硬钉子，无法使其软化。结果，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的坚决反对下，赫尔利只好自己作出妥协。11 月 19 日，赫尔利与蒋介石进行了会谈。在蒋介石进行说服和申明利害的情况之下，赫尔利放弃以前的中立态度，而支持国民党的立场和主张。随后，国民党方面又提出三点反建议，其基本内容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拥护国民党政府，并交出其军队，以此为条件，可以允许中共的代表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委员会。④11 月 21 日，赫尔利把国民党的三条反建议转交给周恩来，并表示三条反建议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他还否认中共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把五点协议的实质歪曲为中共取得合法地位和参加决策机构，企图以此来改变中共在谈判中的立场和主张。

---

① 《美国对外关系》1944 年中国卷。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4 年中国卷。

③ 《罗斯福总统致赫尔利将军》（1944 年 11 月 18 日），《美国对外关系》1944 年中国卷。

④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第 143 页。

在延安的毛泽东研究了国民党的三条反建议后，在11月21日周恩来发来的电报上作出批示，指出三点反建议的实质是“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①] 中国共产党不能接受这种提案。在重庆的周恩来在赫尔利转交三条反建议时即指出：一、军事委员会委员都是挂名的，没有实权；二、只要共产党参加军事委员会而不参加政府，因而我们仍不参加决策。[②] 赫尔利表示：蒋介石告诉他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但不愿写在建议上。周恩来又单刀直入接连发问：“赫尔利将军是否仍同意我们为实现中国团结必须以组织联合政府为前提的主张？”“是否认为联合政府是合理的、是民主的？”“参加政府，是否说我们只能处在观察者的地位，而不能有实权？”赫尔利自觉理输，只好躲躲闪闪地回答说：我认为你们的联合政府主张是适当的，但我不是谈判当事人，我不处在同意的地位。联合政府毫无疑问是民主的，但你们的原提案也有可以改动之处。当周恩来问到参加政府是否有实权时，赫尔利不得不以实相告：“并不等于有实权，但事在人为，譬如我们的议会的议员，有的能够控制议会。”[③] 这表明，赫尔利已经背弃他在延安签过字的五点协议。11月22日，周恩来、董必武应约会见了王世杰、宋子文，还同蒋介石会了面。从他们的态度和所透露情况看，国民党完全没有进行民主改革的打算和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决计返回延安，经中共中央进一步研究后再做决定。

在回延安之前，毛泽东向周恩来发出电报，谈了三条意见，周恩来又把三条意见转告给赫尔利。三条意见的内容是：一、政府三项与延安五条距离太远，我们认为联合政府与联合军事委员会

---

① 毛泽东在周恩来1944年11月21日电报上的批示。
② 周恩来与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21日。
③ 周恩来与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21日。

是解决目前时局问题的关键。这既然不能获得蒋介石同意，因此无法挽救危局。二、国民党的态度至今未变，梁寒操三天前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中国目前所需者只是军令统一，党派合法问题须留待战后一年再讲。三、根据目前形势，我党中央必须召开会议，再行讨论，因此周将留在延安，不再来重庆。赫尔利又一再劝周恩来参加政府，参加军事委员会。周恩来斩钉截铁地予以拒绝。12 月 7 日，周恩来和董必武飞回延安。

赫尔利在由他调处下的第一次国共谈判失败后，并不甘心和就此罢休，因为他来华调处国共关系的目的完全没有实现。他仍想方设法继续推动国共谈判，一方面阻止在华美军同中共建立合作关系，企图以此逼迫中共回到谈判桌上来，另一方面他派人不断与中共领导人进行联系，正面说服中共同意再次与国民党谈判。1944 年 12 月 8 日，包瑞德根据赫尔利的指示会见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他在会谈时，一面为赫尔利的立场辩护，一面又向中共施加压力，说如果中共不接受国民党的建议，会在美国造成对中共不利的影响。毛泽东向包瑞德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他指出：中共不能理解赫尔利的观点，如果双手被反捆着，一只脚伸进大门毫无意义。中共希望与美军合作抗日，但美国不要指望以此来同中共作政治交易。如果美国打算继续扶持蒋介石，那是美国的权力，但这无济于事。中共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条件下战斗了七年，并非依赖外援才能生存，中共能象一切自由的人民一样行动自如。[1] 同一天，回到延安的周恩来也致信赫尔利指出："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对我们最低限度五项建议之拒绝，既明白表示不同意我们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建议，同时又提出

---

[1] 《难对付的谈判者》，《人物》杂志 1983 年第 2 期。

三点反建议案，这样就阻止了我回重庆从事进一步谈判的可能。我们发觉在这些新建议里面，不可能找到基本的共同基础。”同时，周恩来还提到，为了使各方面了解谈判的真实情况，中国共产党准备公布在延安签定的五点协议。①

赫尔利非常担心和害怕中共方面公布有他签字的五点协议。他认为，一旦公布五点协议，他就无法再进行调处工作。所以，他于12月11日致函周恩来，表示坚决反对公布五点协议，同时声称，延安五点协议和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都是谈判的基础，可以修改；三点反建议也不是国民政府的最后一言。② 这样，赫尔利便不得不否定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

中国共产党方面虽然对赫尔利的态度感到不满，却仍希望美国方面以公正态度调处国共关系，不愿意与美方破裂。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方面同意赫尔利的要求，答应暂时不公布五点协议。12月12日，毛泽东致电王若飞，让他转告赫尔利：中国共产党毫无与美方彻底决裂之意；赫尔利不愿公布五点协议，中共可暂时不公布；并声明：“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③ 12月16日，周恩来致信赫尔利，再次阐明中共的立场，指出国民党对五点建议出乎意外和直接了当的拒绝，使谈判完全陷于停顿，我回重庆已无裨益。针对赫尔利关于把国民政府行政院局部改组的人

---

① 《周恩来致赫尔利的信》（1944年12月8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43页。

② 《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周恩来先生》（1944年12月11日）。

③ 毛泽东、周恩来致王若飞的电报（1944年12月12日）。

事变动看成是走向自由与民主的欺骗说法，周恩来指出："我们认为只有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才能使中国向着民主走进一步，才能使中国人民由此开始得到自由，才能动员与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①

毛泽东的电报和周恩来的致函，在赫尔利看来，这是中共有可能恢复谈判的意向。12月20日，他又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要求中共派周恩来到重庆谈判。1944年12月28日，周恩来复函赫尔利，表示中共不愿在联合政府问题上"继续抽象的探讨"。信中提出四项要求，希望赫尔利转交给有关方面，用事实来测验他们是否有决心实行民主和团结。这四项要求是：一、释放全国政治犯，如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其他大批被监禁的爱国志士；二、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及进攻华中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国民党大军；三、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四、停止一切特务活动。②1945年1月7日，赫尔利致函毛泽东，表示不能接受周恩来信中提出的四项要求，反而要求与国民党代表一起访问延安，并说如能在原则上双方达成协议，再请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到重庆完成签署协议的工作。③ 1月11日，毛泽东复信赫尔利，拒绝他和国民党代表来延安的要求，指出这种会议不会获得结果，并提议在重庆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三方参加的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及往返自由。这一提议，如国民政府同意，周将军可到重庆磋商。④ 在收到赫尔利1月20日再次邀请周恩来或其他代表到重

---

① 周恩来致赫尔利的信（1944年12月16日）。
② 周恩来致赫尔利的信（1944年12月28日）。
③ 《驻华大使赫尔利致毛泽东和周恩来先生》，1945年1月7日。
④ 《毛泽东致驻华大使赫尔利》，1945年1月11日。

庆“作一短期访问”的函件后，毛泽东于1月22日通知赫尔利，中国共产党将派周恩来赴渝谈判。

1月24日，周恩来坐飞机抵达重庆。在延安上飞机前和在重庆下飞机后，周恩来都对记者发表了谈话，指出这次到重庆，是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民主同盟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的步骤问题。他还指出，当前全国人民期望的是立即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取消镇压人民自由的法令，废除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取消对边区的包围。在同一天国民党召开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又声明：联合政府是立场，党派会议是方针，国民党一党专政不改变，我们无法参加政府。

1月25日，在正式谈判之前，赫尔利又向中共方面提出四条补充办法：一、“行政院之下，设立新机构，等于外国所说的战时内阁”；二、“成立由美国军官一人，国民党一人，共产党一人组织之整编委员会”；三“为共产党军队设一美国军官作总司令，又设副总司令一人，由共产党任之”；四、“整编委员会成立国民政府即应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赫尔利企图以此达到控制中共军队的目的。对此，周恩来当即予以断然拒绝。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答复很满意，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你拒绝了赫尔利的四个补充办法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的军队，尤其是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①

2月2日，周恩来把他起草的一个关于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交给王世杰，内容包括：党派会议应包含国、共和民盟三方代表；

---

① 毛泽东给周恩来电，1945年1月28日。

有权讨论和解决结束党治、改组政府，起草共同施政纲领；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和来往自由等。[1] 国民党方面迫于形势和赫尔利的一再督促，不得不对中共提出的关于党派会议的四点建议作出答复，2月3日，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提交了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方案。[2] 周恩来看了之后，当即指出其方案里没有改组政府的字样，主张仍以协定草案作为讨论的基础，但答应对其方案作进一步研究。同一天，毛泽东电示周恩来："除坚持废除党治外，请着重特务、自由、放人、撤兵四条，请告诉赫、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如这四条不先办到，不能证明废党治、行民主不是骗局，我们万难加入政府。""因加入政府要负责任，没有先行四条，我们无从负责，即使形式上废除党治，成立联合政府，亦将毫无用处，不过骗人空招牌而已"。

2月13日，在赫尔利陪同下，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以傲慢的态度宣称："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3] 3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的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公然宣称：不能结束党治，也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并宣布将在11月12日召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这表明蒋介石完全拒绝了中共提出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由于国民党对民主改革毫无诚意，中共认为已无继续谈判的必要。至此，赫尔利调处的第二次国共两党谈判陷于失败。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从1944年11月中旬到1945年3月上旬的国共谈判过程中，赫尔利从支持延安协定草案很快转变为支

---

① 张治中：《我与共产党》，第48页。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48页。

③ 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945年2月18日。

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并千方百计诱使中共交出其军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同赫尔利和国民党进行谈判和斗争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挫败了美国和国民党企图控制中共军队的阴谋，维护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2. 毛泽东对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批判

美国政府在赫尔利调处的国共谈判失败后，扶蒋反共的态度日益明显。1945 年 4 月 2 日，回到美国的赫尔利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阐述美国对华政策时，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是中国统一和民主的障碍，将中共与军阀等谈；并声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被高估了，国民党军队才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他宣称："美国已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政府，并且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支持它，但并不曾支持任何军阀或武装的政党。"[1] 这就公开表明：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把共产党排斥在外。这样，在中国人民面前，赫尔利和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中扮演的双簧已经彻底破产，露出其真实面目。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指出：几个大国，同盟者，要坚决联合他们，但是，他们搞得不对的地方，要斗一下。这就表示对美国政府的错误的对华政策要进行批评。但当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没有在报纸上公开进行批评。

6 月 11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愚公移山》的闭幕词时，指

---

① 《解放日报》1945 年 5 月 8 日，第 3 版。

出："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他还说："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1]从6月中旬开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党内揭露和批判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同时要求注意区别对待的方针，以争取美国朝野有识之士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

从6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批判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

6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时评，标题为《从六人被捕案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该文把6月6日在美国发生的《美亚》杂志六人被捕案与美国政府的远东政策联系在一起，指出"六人被捕案的真正原因，不在于什么泄露'秘密'，而在于六位友华人士剧烈反对国务院里面部分统治人物支持中国反动派的政策"；"六人被捕案，无疑不是偶然的，而是和美国对华政策有密切关系的事件"，"正是美国对华政策两条不同路线剧烈争论的表面化"。文章还抨击了赫尔利在4月2日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并把它与美国对华政策联系起来。文章说："由于中国反动派和美国内部绥靖主义分子的协力活动，使近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某些变化"，其中重要的是"4月2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美国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他抛开政治上的民主团结，而谈中国的'军事统一'。正因为这样，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更感觉到有恃无恐，增强了坚持独裁、摧残民主、准备内战的决心，本月六日国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03页。

民党政府军政部长陈诚公开声明将以盟国租借武器进行内战，即是一个例证”。文章还指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上的反动路线，采取支持中国反动势力的方针，实际上助长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妨碍了对日作战的共同事业，而赫尔利之流，就是这条路线的代表者。文章希望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改弦更张，指出：“今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究竟将要怎样呢？支持独夫民贼蒋介石反对中国人民呢？还是赞助中国人民获得解放呢？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加以慎重的考虑。”文章表示：“我们中国人民欢迎美国人民给我们以更有效地援助，我们准备和美国及其他盟国一致努力，配合作战，来完成击败日寇和重建远东和平的伟业。”①

7月10日和12日，毛泽东先后为新华社写了两篇评论，即《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揭露和批判美国政府内赫尔利之流的扶蒋反共政策。毛泽东首先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逆转过程，指出罗斯福总统在世时，为了美国的利益，他没有采取帮助国民党以武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赫尔利到延安的时候，也曾赞同中共方面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计划。“但是他后来变卦了，赫尔利背叛了他在延安所说的话。这样一种变卦，露骨地表现于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所发表的声明。这时候，在同一个赫尔利的嘴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变成了美人，而中共则变成了魔怪；并且他直率地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② 其次，毛泽东揭露美国对华政策中反动路线的危害性和危险性，指出美国支持国民党，赫尔利与蒋介石一唱一和，但“不管他们怎

① 《解放日报》1945年6月25日，第1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15页。

样吹得煞有介事，总之是要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美国人民及其他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①]“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来”，“那就将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这一点，必须使美国人民认识清楚”。[②]战后中国局势的变化，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对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揭露和批判的正确性和远见性。

（四）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毛泽东对联合政府问题的阐述

中国共产党为了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粉碎美蒋反动派的阴谋，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在延安举行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 547 人，候补代表 208 人，代表着 121 万党员。大会经过充分详尽的讨论，一致通过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确定党的政治路线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这次大会是在德、意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前夜召开的。为了废止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独裁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11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115 页。

统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反对黑暗的前途，争取光明的前途。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首先，在报告的开头，毛泽东直接而明确地阐述和表达了中国人民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基本要求。报告指出：中国现在仍然不团结，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做呢？毫无疑义，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只有这样做，才是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毛泽东在这里既直接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主张和要求，又规划了实行这一主张和要求的两个步骤：第一步，建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步，成立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两个步骤所要达到的不同目的。第一步的目的是实行民主改革，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与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第二步的目的，是领导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两个目的也就是两项任务：前者是完成抗战和解放的任务，后者是进行战后的国家建设。上述两个步骤和两项任务，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要求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毛泽东强调指出："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

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①

其次，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以战胜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客观可能性，指出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有利条件，“中国人民如果能很好地利用这些条件，积极地坚决地再接再励地向前奋斗，战胜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是毫无疑义的。”② 关于国际形势，当时苏军已攻击柏林，英美法联军也在配合打击希特勒残军，意大利人民又发动了起义，这一切将最后消灭希特勒，随之而来的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为时不远了。苏联人民加上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国人民的 努力，使打倒法西斯成为可能。虽然可能会发生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但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这就是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关于国内形势，毛泽东分析说，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不但存在着强大的民族敌人，而且存在着强大的实际上帮助民族敌人的国内反动势力，但是中国人民不但已经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的觉悟，而且有了广大的中国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着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充分地存在着。中国人民克服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毛泽东充满信心地指出：“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就能争取中国光明的前途，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在分析国内形势时，毛泽东对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实行的两条不同的路线及其结果作了系统详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0页。

细的评述；对国民党政府顽固坚持一党专政，拒绝进行必要的民主改革和成立联合政府，以致使中国的政治关系处在非常严重的局面之下的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并希望国民党当局鉴于世界大势之所趋和中国人民之所向，毅然改变其错误的现行政策，使抗日战争获得胜利，使中国人民少受痛苦，使新中国早日诞生。

再次，毛泽东在报告中阐明了民主联合政府的一般纲领和各项具体政策。

一般纲领包括民主联合政府的性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性质，毛泽东指出，第一，它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第二，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因此不可能也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第三，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民主联合政府也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那末，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① 在政治上，民主联合政府建立一种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军队和其他武装力量，是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部分。在经济上，民主联合政府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采取孙中山先生关于“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和“节制资本”的政策，经济成分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部分组成。在文化方面，民主联合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6页。

政府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各项具体政策，毛泽东从当时中国的形势和中国人民所面临的任务出发，提出了以下最低限度的政策：(1) 政治军事方面包括：动员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并建立国际和平；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惩办那些分裂民族团结和反对人民的亲日分子、法西斯主义分子和失败主义分子，造成民族团结；惩办那些制造内战危机的反动分子，保障国内和平；惩办汉奸，讨伐降敌军官，惩办日本间谍；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撤退一切包围和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并将这些军队使用于抗日前线；承认中国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及其军队，收复一切失地；帮助沦陷区人民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允许人民自动武装起来，保乡卫国；从政治上军事上改造那些由国民党统帅部直接领导的经常打败仗、经常压迫人民和经常排斥异己的军队，惩办那些应对溃败负责的将领；改善兵役制度和改善官兵生活；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使前线官兵安心作战；优待殉国战士的遗族，优待残废军人，帮助退伍军人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发展军事工业，以利作战；将同盟国的武器和财政援助公平地分配给抗战各军；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改善中下级公务员的待遇；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权利；取消压迫人民的保甲制度。(2) 在经济方面包括：救济难民和救济灾荒；设立大量救济基金，在国土收复后，广泛地救济沦陷区的受难人民；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实行农村

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证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发展农业生产；取缔官僚资本；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和推销产品的便利；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并使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工业生产。（3）在文化教育社会政策方面包括：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权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4）在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方面包括：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保护因被日本侵略者压迫而逃来中国的外国人民，并扶助其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改善中苏邦交，等等。毛泽东在报告中还对上述政策中的十个主要问题即消灭日本侵略者、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人民的自由、人民的统一、人民的军队、土地问题、工业问题、文化教育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和外交问题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最后，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为着最后地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对民主联合政府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而详尽的阐述。这不仅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而且大大发展了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因而对于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党的七大上，与会代表还着重总结与讨论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其中最突出的是周恩来受中

共中央的委托，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全面总结和阐述了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他强调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清楚，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就要认清敌人、队伍和司令官这三个问题。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由于敌我关系和斗争营垒时常发生变化，形势时常变动，所以统一战线的问题就很复杂。我们应当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三个方面，来研究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①

关于敌人方面。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这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不变的。可是帝国主义不仅是一个，而国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又有不同的派别和集团，这些敌人常常不一致，所以敌人营垒又是变化的。这样，我们认清敌人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成了复杂的问题。有时候敌人是合在一起压迫人民大众，许多时候敌人是分开的。到了抗战时期，敌人有分有合，情况就更为复杂了。在这样复杂的形势面前，要求我们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善于调查研究，分析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正确地认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变化，能够随时地认识敌人，分析敌人，能够提出战胜敌人的正确方针。而犯右倾错误的人常把敌人当成朋友，犯“左”倾错误的人常把朋友当敌人。有些敌人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两面性，在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的时候，有右倾观点的同志，只注意他们可联合的一面，忘记了他们的反动性；有“左”倾观点的同志，在转变的关头看不到变化，只注意这些敌人的反动性，看不到他们可以联合的方面。敌人的营垒是变化的，右的观点把昨天是朋友

---

①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96 页。

而今天已成为敌人的人仍当作朋友；“左”的观点把昨天是敌人而今天可能成为朋友的人当作敌人。周恩来强调，敌人营垒极不统一、极不一致，变化极大，我们应该很好地分析，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才不会犯“左”的和右的错误。

关于队伍方面。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有无产阶级，有农民，有小资产阶级，有自由资产阶级，甚至有时有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来参加，所以这个队伍很大，很复杂，力量不平衡，不容易统一。对这样一个队伍要弄得很清楚，要会分析，懂得怎么争取队伍的大多数，反对这个队伍中和我们争领导权的少数人，同他们斗争；如果搞不清楚，就会发生“左”的和右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分析这个队伍时，把里面的人分作三类：一类是进步力量，就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一类是中间力量，就是中间阶层；一类是顽固力量，或者反动力量，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地方实力派近乎中间，或者是中间和顽固之间，在阶级性上接近反动派，在反蒋这一点上又起了中间力量的作用。根据这三种力量的分析，我们订出了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力量的方针。犯“左”的错误或右的错误的人都是不懂得毛泽东同志关于统一战线队伍左中右的分析，结果孤立了自己。周恩来还强调：对统一战线队伍光分左中右还不够，还必须有进一步严格的区别。无产阶级在这个队伍里是带队的，起领导作用的，其他的阶级都同它有区别。所以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就是指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他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他是去联合人家，而不是同化于人家。有了区别，就有斗争。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团结，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同人家讲团结，而不要受其他阶级的影

响。毛泽东同志常说，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最容易受别的阶级的影响，所以不主张区别是不对的。右的观点就是不主张区别，而“左”的观点是天天讲区别，不去和人家共同行动，急于搞社会主义。

关于领导权问题。无产阶级比别的阶级先进，是应当领导别的阶级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司令官”。但无产阶级也不是天然的司令官，不是从农民到大资产阶级都公推你、公认你为司令官。彭述之关于无产阶级有天然领导权的观点，这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争领导权的思想是完全相反的。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因为领导权是有人和无产阶级争，和共产党争。不但大资产阶级争，自由资产阶级也争，小资产阶级也争。他们总要按着他们的思想来领导统一战线队伍。但是和我们争领导权最主要的力量，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这个统治集团。所以在统一战线当中，互争领导权的主要是国共两党，大资产阶级就成为我们斗争的主要对象。右倾观点是不要领导权，不是把国民党的主张提高到我们的主张上来，而是把我们的主张降低到国民党那方面去。“左”的观点是只讲斗争，不讲团结和联合，空喊无产阶级领导，结果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统一战线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统一战线队伍推出去。周恩来强调指出：“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我们党在历史上几个时期的许多成功，都是因为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权问题的思想和路线”。①

周恩来在这次大会上对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所作的全面系统深刻的概括和介绍，对全党同志进一步了解和正确认识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

①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07、109页。

六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关于以实现和平民主为目标的统一战线思想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的局面。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在美国的支持下积极准备内战，妄图使用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又在美国的敦促下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企图以非武力手段实现其一党专政下的全国统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适应全国人民的要求和国际国内复杂局面的需要，提出并实施了以争取国内和平民主为目标的统一战线策略，使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得到了新的发展。

（一）抗战胜利后的复杂局势，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1. 抗战胜利后的复杂形势与毛泽东关于“和平、民主、团结”的思想

在日本宣布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从总体上来说，有利于中国人民，但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面临着复杂的局面。

这种形势变化的有利方面表现在：在国际上，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阵营中的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打败，英、

法等国的势力遭到削弱。与此相反，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势力却得到了巩固；东欧、东南欧和亚洲的一些地区开始建立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也高涨起来。这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在国内，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各解放区得到很大发展，党员人数增加到120万以上，解放区已拥有近1亿人口、120万军队和220万民兵的力量。此外，国统区的民主力量和民主运动得到很大发展，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纷纷发出呼吁，要求实现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空前提高，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建立更加广泛的统一战线，以推动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

战后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复杂和不利的一面表现在：战后成为世界第一号经济和军事强国的美国，实行遏苏反共的政策以“建立美国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企图主宰世界。它在对外扩张势力时，不但把重点放到控制欧洲，而且也要控制亚洲特别是中国。在对华政策上，它坚持扶蒋反共的方针，以种种方式巩固和加强国民党的力量。美国不但“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①]，而且以贷款、提供物资等手段和名义给国民党以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还帮助国民党运送军队、抢占战略要地和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美国还企图以推动国共谈判的方式，用政治手段实现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达到它不战而控制全中国的目的。战后强大的苏联，对遏制和抗衡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扩张行动、维护世界和平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有着支持作用，但它决不可能如同美国援助国民党那样全力支援中国共产党。苏

---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72页。

联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以出兵中国东北参加对日作战为条件，谋求在东北取得不冻的军事港口、贸易港口和铁路交通等优越权益，得到美国方面的同意。为了使这种秘密交易生效，苏联必须支持国民党以换取国民党政府对其在华权益的承认。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大连、旅顺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等。这些以确定苏联在东北享有某些特权为内容的条约和协定，不但侵害了中国的主权，而且如同一条纽带把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联系在一起，使苏联只能承认和支持国民党，而不利于它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而且，苏联领导人当时对中国共产党存有偏见，认为中共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是“人造奶油”共产党，是来路不正的共产党①；并且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与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抗衡。斯大林后来承认说：“当时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全力以赴扑灭中国的起义。”② 正因为这样，当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斯大林也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打来电报敦促毛泽东去同蒋介石会谈，并告诫中共要决心停止内战，在蒋介石的同意下进行民主化③。苏联的这种对华政策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造成了困难，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制定党的策略时面临着复杂的情况。

在国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在形式上和外交上是中国合法的政府。它保存有一支400多万人的正规军队，并有优

---

①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3页。

② 《卡德尔回忆录 1944—1947》，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页。

③ 《在历史巨人的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页。

良的武器装备。抗战胜利后，它通过对沦陷区的接收和抢夺，统治区急剧扩大。在经济上，它手中持有大量的物资和外汇储备。蒋介石在战后被捧为“抗战建国领袖”，以致国统区和沦陷区有相当多的人对他抱有很大幻想。上述情况使国民党和蒋介石在国共关系处理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蒋介石集团在国际国内要求和平民主的情况下，一方面积极准备大规模内战，另一方面又表示与中共和谈，企图以此欺骗全国人民，迫使中共“放弃武力，改走合法的道路”①。为此目的，蒋介石在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后，于8月14日、20日、23日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在上述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形势进行了清醒的分析，制定了坚定而正确的原则和指导方针，提出了新形势下的统一战线策略，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报告指出今后斗争的实质在于，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指出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是早已定了的，内战的危险是十分严重的，但经过斗争，使内战限制在局部范围内或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则是有可能的。因此，我党的方针是：一方面要坚持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和阻止内战；另一方面，必须对蒋介石可能发动的全面内战切实做好准备工作，这样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

①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156页。

在蒋介石接连发来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和谈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形势的需要，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

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时指出：现在的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了和平建设阶段。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苏美英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他又指出：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诸条件。毛泽东还强调，我们要学会在和平条件下进行斗争，准备走曲折的道路。会议经过讨论后确认，“和平、民主、团结”是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和利益所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依靠人民的力量，同蒋介石作针锋相对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意愿和要求，进行一定的政治改革，以维持国内和平，以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会议还决定，先派周恩来去重庆谈判，毛泽东暂缓前去。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阐明了中共关于“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政治主张，并要求国民党立即采取措施避免内战，实现民主政治。

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决定毛泽东亲自去重庆进行和谈。在8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去重庆谈判，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自然，去谈判就必须作出

一定的让步。由于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自己的困难，还有外国的干预等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和平谈判的通知》，指出：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通知还说明党关于和谈的方针是：在谈判中我方准备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必要的让步，以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通知还要求，如果出现和平发展的局面，我们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但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

2. 重庆谈判中毛泽东关于以让步换同情的统战思想

1945年8月28日，在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这一行动向中外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怀着真诚的愿望求和平的，是真正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因此，毛泽东等一行来到重庆时，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同时也在国内外造成了巨大影响。

重庆和谈从8月29日起始，至10月10日结束。在这段期间，毛泽东就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直接同蒋介石举行过多次商谈。周恩来、王若飞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就有关问题进行具体谈判。

8月2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在同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初次商谈时，蒋介石除空洞地表示愿意听取中共的意见外，提出所谓“中国没有内战”的说法。对此，毛泽东严正地指出，要

说中国没有内战，这是欺骗之谈。他列举了十年内战及抗战以来的大量事实，驳斥了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随后几天，双方代表就政治、军事问题作一般性会谈。

9月2日上午，毛泽东约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在桂园商谈。谈判中，毛泽东对国共关系提出了八大原则性意见：

（1）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

（2）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

（3）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

（4）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

（5）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

（6）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

（7）中共军队须改编为48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

（8）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9月2日晚上，毛泽东在蒋介石官邸同蒋介石就中共军队组编数目、军队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之旧代表等问题进行商谈。

因国民党对这次谈判缺乏诚意，并且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等真会如此快地应邀来重庆。所以，他们也根本没准备好谈判的方案，在谈判开始后，只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9月3日，中共方面将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十一项交给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其中关键的两个问题是关于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必要

办法问题。9 月 4 日上午，蒋介石召集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开会，把他仓促拟出的《对中共谈判要点》四条给他们。他的方案不但拒绝中共提出的要求，而且强调“军令政令之统一”，并严格控制中共军队以 12 师为最高限度。

在以后的谈判中，双方谈谈停停，时断时续。蒋介石企图使用压服手段，迫使中共妥协。赫尔利也向中共施加压力。9 月 21 日，他找毛泽东谈话，要求中国共产党交出解放区，要么承认，要么破裂。毛泽东沉着回答说：“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

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取得和谈的实质性成果，以实现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争取全国人民的支持，毛泽东坚持以“让步换同情”的策略，在谈判过程中很多问题上作出了灵活的让步，在一些问题上还一让再让。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第一，放弃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召开国是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是 1944 年 8 月开始中共提出的并得到各民主党派响应的政治主张，但遭到国民党的坚决拒绝。在重庆谈判开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在提出谈判方案时，考虑到国民党难于接受成立联合政府的方案，所以没有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问题，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其次，召开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之方式的问题，在国民党认为它有推翻政府之顾虑的情况下，中共的方案中根本没提召开党派会议。其三，国民大会之代表，中共主张普选，但国民党代表认为不可能，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经考虑后，决定中共虽不能放弃主张然而也不反对参加，也不在北方另行召开会议。

第二，关于军队问题，这是国共双方争执最为激烈的问题。开始谈判时，中国共产党方面认为，解放区军队在八年抗战中作出

过重要贡献，应该得到合理的编制，现在有120万军队在大量裁减后至少也应整编为16个军48个师。蒋介石却力图对它缩小甚至予以编散，坚持不能超过12个师。双方意见十分悬殊。在相持了两周之后，为了打开谈判僵局，毛泽东、周恩来在商量之后，决定作出让步，并向国民党方面表示：中央军队与中共军队之比数可让步为六比一，即中央现有263个师，中共应有43师；如中央军队缩编为60个师，中共应为10个师；中央军队如缩编为120个师，则中共应有20个师。但是，国民党代表对中共的让步仍不肯接受，在9月21日会谈时表示中共军队编制，至多亦不能超过5个军16个师。最后，中共方面又作出让步，表示在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的条件下，愿将它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至24个师，至少20个师的数目。国民党方面也被迫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的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为20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关于军队的驻地，中共方面也作出让步：第一步，拟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等八个地区之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三地区之军队撤退，而中共之军队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绥远之小部与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国民党方面开始不予接受，最后被迫表示：关于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

第三，在解放区问题上，中共方面也作出很大让步。中共方面开始提出解放区解决的办法是：1. 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2. 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3. 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4. 参加东北行政组织。国民党方面

对此拒不接受。在9月19日会谈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商议之后，决定作出让步，提出：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四省及陕甘宁边区之主席，由中共推荐；山西、绥远两省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之副市长，也由中共推荐人士充任；苏北、皖北、豫北之地区，中共军队撤退前，其专员、县长由中共委任；北平行营由中共负责，并仿东北行营例设政治委员会，由中共负责。国民党仍拒不接受，并攻击这是分疆而治，割据地盘。此后，中共方面又让步并提议：在解放区重新进行县级民选，选出县长与参议会；凡一省或一行政区有过半数县已实行民选者，由县参议会产生省参议会，省参议会选举省长与委员，呈请中央加委。对此，国民党方面还不同意。9月2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经过商议考虑后，又提出一个新的让步方案：暂时维持现状，即现在各省政府所能治理之地，由省府治理之，省府不能治理者，由解放区治理之。最后由于国民党的顽固坚持，终未达成协议。

此外，中共在其他问题上也作出了让步。

中共方面在重庆谈判中对一些重大问题一再作出让步，表明了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赢得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同情，中间派力量也普遍认为中共对和谈是真诚的，做到了仁至义尽，并对国民党方面一再使用压服手段的做法表示不满。通过这次谈判，中共不但与国民党方面签订了《会谈纪要》，迫使国民党承认中共的地位，而且使中间派力量和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因而极有利于推动党在国统区的统一战线工作。这说明毛泽东关于以让步换同情的统战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二）重庆谈判前后毛泽东关于同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广泛联系和合作的统一战线思想

1. 毛泽东与访问延安的民主党派参政员会谈

1945年6月初，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著名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为了协调国共关系、坚持团结抗战，并促成党派会议与联合政府，“发起促成继续商谈之国共问题”①。他们于6月2日致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表示“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仁深为焦虑。目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商谈。”中共方面对此表示十分欢迎，于6月18日复电：“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专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何日起程，乞先电示。扫榻以待，不尽欲言。”②

1945年7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6人由重庆乘飞机抵达延安。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等中共重要领导人均到机场迎接。六人虽然都是以参政员的名义来延安，但事实上又是各方面的代表。黄炎培不但是民盟中央常委，而且是职教社派的主要领导人；冷遹也是职教社派主要领导人之一；左舜生是青年党的领袖，也是民盟中央秘

---

① 参加发起这项工作的人员是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遹等4位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褚辅成、王云五、傅斯年等3位民主人士。

②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21页。

书长，这次以民盟代理主席的身分来延安；褚辅成是国民党元老中的民主派人士，又是民主科学座谈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章伯钧是民盟中央常委，同时也是第三党的领袖；傅斯年则是以学者的身分来延安。

六参政员来延安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与他们连续三次举行会谈，就国事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当时会谈双方的态度是坦率、真诚、亲切的，“彼此都十分坦白，十分恳切，不当作‘办交涉’，而是亲亲切切地谈心。因为大家对于大局有相同的看法，这基本观念是一致的。”① 会谈的内容，由中共方面综合写出纪要。在7月4日的最后一次会上，毛泽东将《会谈记录》分送到会诸位。《会谈纪录》如下：

六参政员与中共方面同意下列两点：

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

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中共方面之建议：

为着团结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共商国是，以便在民主基础上动员与扩大全中国的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起见，并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并提议在召开前须确定下列各点：

一、政治会议之组织，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面各自推出同数之代表及由三方面各自推出三分之一

---

①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16－117页。

（其数等于每一方代表数），并经他方面同意之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组成之。

二、政治会议之性质：公开的、平等的、自由的、一致的、有决定权的。

三、政治会议应议之事项：1. 关于民主改革之紧急措施；2. 关于结束一党专政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参加的举国一致的政府）；3. 关于民主的施政纲领；4. 关于将来国民大会之召集。

四、政治会议召开以前，释放政治犯。

五、为使政治会议顺利进行起见，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由各方面先作预备性质的协商，以便商定上述四点及其具体内容①。

这份会谈记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但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企图召开的假民主的国民大会和争取召集有民主实质的政治会议的共同主张，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交往与合作，为未来双方共同进行政治协商奠定了基础。

六参政员还对延安的社会、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毛泽东还与黄炎培单独进行长谈。毛泽东询问黄炎培“感想怎样”，黄炎培直率坦诚地谈了自己的感想与希望。他说：我60多年的所见所闻，“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在开始时“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等环境渐变好了，则“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

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814—815页。

'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听了之后，表示赞同，认为这话是对的。①

在延安期间，黄炎培等还走访了其他一些中央和边区政府方面的领导人，感到同中国共产党在一起"如坐春风中"，"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②。毛泽东则向他们表示："有诸位到延安，使我们听到许多平时不易听到的话，增加了不少了解。"③民主党派参政员访问延安，对于增加相互间的了解和信任、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同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对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广泛的统战工作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除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会谈外，还进行了争取团结各方面的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广泛地接触了各党派和各阶层人士，加强了与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团结，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毛泽东多次访晤了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黄炎培、许德珩、谭平山、陈铭枢、柳亚子、王昆仑、蒋匀田、张申府等人，同他们进行亲切的交谈，介绍谈判的进展情

---

① 黄炎培：《八十年来》，第148—149页。
② ③黄炎培：《八十年来》，第150、143页。

况和存在的分歧，阐明中国共产党对和平谈判的真实诚意，并就全国的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等问题征询他们的意见，希望他们同中国共产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国内的和平民主而共同奋斗。

1945 年 8 月 30 日，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三天，就亲赴特园拜访民盟主要领导人张澜。张澜邀毛泽东到卧室长谈，并表示对时局和谈判的关切。毛泽东向张澜详细地解释了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所提出的主张和措施，并就解放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新貌、人民福利，以及生产和教育等进行了介绍，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9 月 2 日，张澜以民盟的名义，在特园欢宴毛泽东。毛泽东一进特园，就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他勉励大家说："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毛泽东还同在场的沈钧儒谈健身运动，同黄炎培谈职业教育、同张申府话"五四运动"的往事……这种家人般的恳谈，迅速地融洽了彼此的感情，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此后，毛泽东又与民盟领导人数次举行交谈。9 月 15 日，当国共双方代表就光复省区的划分、双方军队的驻地等问题进行紧张谈判时，毛泽东又来到特园，向张澜介绍了国共谈判的近况，并指出目前关键仍在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同人民军队问题上。国民党攻击这"根本与国家政令军令之统一背道而驰"，实际上，使谈判陷于停顿，借此在美国支持下，阳为运兵接收，阴则准备内战。张澜推心置腹地对毛泽东说：在"五·四"以后，为了摆脱北洋军阀的统治，使人民能够过问政事，我曾经同吴玉章在川北推行过地方自治，深知政权、军权对于人民的重要性。国民党丧尽民心，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给你们。你们

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干净土[①]。张澜又建议："现在，是你们同国民党双方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了的，就应当把它公开出来，让大家知道，免得蒋介石今后不认帐。"他还表示："你们如有不便，由我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这些问题摊开在全国人民面前，好受到全国人的监督和推动。"毛泽东对这些建议欣然一一采纳，并当面赞誉张澜是"老成谋国"[②]。后来，张澜的信在重庆《新民报》和成都《华西晚报》上发表。

毛泽东还邀请民主科学座谈会负责人许德珩会谈，鼓励他们组织和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当许德珩汇报民主科学座谈会成员希望能成立一个永久性的组织时，毛泽东勉励说：既然有许多人参加，就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许德珩担心成立组织人数太少，毛泽东说：人数不少，即使少也不要紧，你们都是些科学文教界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经常在报上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吗？[③] 许德珩听了之后很受启发和鼓舞，于1946年5月4日正式成立了九三学社。此外，毛泽东还就国内形势、政治主张等问题同青年党负责人左舜生等和国家社会党负责人蒋匀田等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还会见了一些国民党民主派著名人物。在会见孙夫人宋庆龄时，对她不顾个人安危而献身国家民族的精神表示赞赏和敬意。在会见冯玉祥时，毛泽东对他政治上的进步倾向予以赞许。冯玉祥则盛赞毛泽东来重庆象征着国内的团结与和平。柳亚子见到毛泽东后，当即赋诗颂扬毛泽东是"弥天

---

① 吕光光：《毛泽东同张澜的会见》，见《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

② 《重庆谈判纪实》，第444页。

③ 许德珩：《毛泽东和九三学社》，见《人民日报》1983年12月14日。

大勇”。另外，毛泽东还会见一批国民党内当权的右派上层人物，如白崇禧、何应钦、孙科、陈立夫、戴季陶等，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和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政治主张。他们在表面上也不得不表示要为这次和平谈判尽力效劳。身边有的工作人员对毛泽东的这种做法不理解。毛泽东耐心地解释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要作具体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在同陈立夫见面时，毛泽东先以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批评国民党背叛革命，实行“反共”的错误政策，指出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毛泽东还谈到，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象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毛泽东这番机锋的议论，使陈立夫手忙脚乱，窘迫无词，也不得不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力效力”①。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还广泛地会见了妇女、青年、文化界和工商业人士。9月17日，毛泽东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产业界人士章乃器、刘鸿生、李烛尘、范旭东、胡西园等人，赞扬他们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做出了贡献，并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的

---

① 王炳南：《回忆毛主席在重庆》，见《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429页。

政策和态度，并强调，中国民族资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在国家独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前途。这对增进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了解，发展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起了很大作用。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还会见了在重庆的外国人士，包括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驻华使节以及其他有关外国人，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情况，反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及对和平团结的愿望。

毛泽东在重庆和国民党民主派、民主党派、各界人士以及外国人士的广泛接触，对于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争取群众的广泛同情，壮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力量，都起到了重大作用。毛泽东回到延安总结重庆之行的收获时说："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也不赞成蒋介石的政策。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①

3. 在旧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关于加强同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思想

为了解决国内和平建设的问题，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时就商定："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取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8页。

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①。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斗争与努力之下，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召集了政治协商会议。在政协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确定了关于加强同民盟及其他民主党派协商与合作的统一战线思想。根据这一思想，出席会议的中共代表团面对复杂的形势，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国民党右翼，终于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早在1945年12月5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就给中共南方局发出指示，要求“现在即着手邀集各党派无党派及会外活动分子准备政协提案，研究共同纲领及宪法草案”。12月9日，中共中央又致电董必武、王若飞，请转告民盟，表示我党主张通过民主途径解决问题，要他们也在纲领、联合政府、国大及宪法草案方面作准备②。12月28日，中共政协代表团到达重庆后，先后宴请民盟的政协代表及其在渝的民盟常委、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第三党的章伯钧等人，与他们交谈关于召开和参加政协的意见。这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会前的联系和团结，也为政协期间的进一步协调和合作创造了条件。

政协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所取得的第一个成果是顺利解决了民盟参加政协的代表名额问题，挫败了国民党和青年党分裂统一战线的阴谋活动。政协会议召开前夕，国民党为了孤立共产党，极力拉拢并分化民盟。而民盟本身却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团体，包括三党三派，有左、中、右之分。早在重庆谈判时，国共双方就已确定参加政协的四方（即国民党、共产

① 《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见《重庆谈判纪实》，第250页。

② 《中共中央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337—338页。

党、民主同盟、社会贤达）代表各9人，共36人。国民党分化民盟的一个主要阴谋是将青年党从民盟中拉出来，单独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政协。青年党决心投靠国民党，无理要求要5名代表的名额，否则要以独立单位参加政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方面多次向民盟领导人表示自己的态度，鼓励民盟内部除青年党外更应当加强团结。同时又与国民党方面多次协商，为解决代表问题作出很大让步。结果民盟仍保持9名代表，青年党有5名代表单独参加，多出的代表人数由中国共产党方面让出2名，国民党让出1名，总额再增加2名，参加政协的代表人数由36名增为38名，从而解决了青年党在国民党支持下在代表名额方面挑起的事端。中国共产党自己作出让步以顾全大局的做法，进一步获得了民盟的信任，使它决定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团结一致共同抵制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1946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我在政协斗争中之方针原则的指示》，要求中共代表团对一些问题“应说服中间派了解”，以“争取其共同行动”。在政协会议上，中共代表团与民盟及其他民主党派在许多问题上完全是互相协商，互相支持，紧密配合。对政协会议上各种重大问题的讨论、中国共产党与民盟总是事先商量交换意见取得一致。当时，中国共产党同民盟双方的代表每天晚间总是聚在一起来共同讨论这些问题，“往往是白天开会，晚上再到特园碰头，互相交换情况和意见”①。在改组政府的问题上，国民党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法”，企图用联合政府之名保存国民党独裁专制之实。中共代表与民盟等代表一起研究，把改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633页。

变蒋介石的个人专制独裁作为问题的关键，提出要把国府委员会变成一个实权机构，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施政纲领以及主要人事安排都要经过它同意才能生效。在国府委员名额的分配上，中国共产党和民盟同国民党多次斗争之后，否定了国民党的提案，确定国府委员总名额为40名，国民党占20名，其他党派20名。中国共产党提出要10名，民盟提出要6名，青年党提出民盟要多少它也多少，这就超过了20名的数额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再次作出让步，提出名额由10名减至9名，民盟由6名减至5名，青年党又提出同民盟一样要5名，这实际上是青年党故意作鬼捣乱。为了解决名额问题，并加强同民盟的团结，中共代表周恩来向民盟领导人表示：在目前的政治斗争中，共产党与民盟一定要加强团结，这14个名额怎么分配都可以，你们要多少大胆提出，丝毫不必客气，我们共产党没问题。民盟领导人对此深为感动，最后确立民盟国府委员为7名。在宪法草案、和平建国纲领和军队等几个重要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与民盟及其他民主党派协商合作，并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作出很大的让步，使政协会议结束时胜利通过政治组织、施政纲领、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和军事问题等五个决议案，使国民党企图孤立中国共产党的阴谋破灭。这些决议规定的内容，虽然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有很大差距，有许多方面是不彻底的和资产阶级性质的，但因它们公开地否定了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和内战政策，所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这是中共运用革命的统一战线策略、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团结合作所取得的很大成果。

在政协会议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又进一步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合作，为维护政协决议和实现国内的和平民主而斗

争。1946年4月18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指出民主同盟和国民党内民主派两方的动态关系甚大，要求对他们“多做工作”。根据这一电示，周恩来和其他中共代表进一步加强同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同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破坏国内和平的反动内战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促进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统战工作的发展。

（三）战后初期毛泽东在军事问题和经济问题上的统一战线策略思想

1. 毛泽东关于同国民党军队建立反战统一战线的思想

抗日战争胜利后，久经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十分渴望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反内战、求和平，是全国人民的最大愿望和根本利益之所在。全国人民的这种情绪也深深地感染着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他们经过长年的战争之后，希望能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因此很多士兵是非常厌战的。而国民党军队的有些军官，包括一些高级指挥官，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是没有出路的，也反对打内战。

上述这种情况，对于坚持和平民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十分有利的。它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军队建立反战统一战线以抵制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争取和平民主的过程中，正确地分析了形势，估计了这种可能，提出了同国民党军队建立反战的军事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

首先，对建立这种统一战线的可能性进行了正确的估计。1945年10月，在邯郸战役中，由于我军争取，国民党新八军在战斗紧

张之际举行起义，宣布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成立民主建国军，站到人民的立场，给我军以顺利歼灭敌三十、四十两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战斗结果使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八军军长马法五以下2.3万人被迫放下武器。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在10月30日的通电，在国民党军队中、甚至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产生了很大影响。鉴于上述情况，中共中央于1945年11月12日发出《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指出："国民党不可能动员与团结在它自己指挥下的士兵和广大军官，来进行反对人民的内战，更不可能动员全国人民，来进行内战，这是国民党在内战中最大与最基本的弱点。高树勋新八军起义，及其在全国获得的深刻影响，就是明证。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邯郸起义的宣传，从国民党的内战中的致命弱点上来痛击国民党，瓦解国民党军队，促成第二个、第三个邯郸起义的爆发，制止内战的无限期延长。"① 11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宣传攻势的指示》，又一次指出："国民党此次进行内战是违背全国人民意志的。它没有可能动员广大的官兵和人民进行反对人民的内战，军心不固与民心不固，是国民党在此次内战中最大最基本的弱点。"指示要求有关部队在战斗中，除了在军事上积极进行防御与认真准备战场，以消耗敌人的兵力外，"还必须认真对顽军进行有力的政治攻势，从敌人最基本的弱点上来痛击敌人，以瓦解敌人军心，使敌人丧失战斗意志，然后进行主力决战歼灭之"。② 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中央仍强调这一问题。1946年9月5日，中央军委指示：根据各方反映，蒋军官兵厌战心理非常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95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01页。

浓厚、甚至在军长一级的军官中、空军中和由特务组成的交通队中，都有表现。指示要求各部队“必须好好利用这种空前未有的现象，以促成我们的胜利”。

其次，提出了建立这种统一战线的具体策略和措施。同国民党军队的厌战官兵建立反战军事统一战线，不同于与某一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建立统一战线。军队是执行武装任务的特殊的政治集团，其内部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国民党对其军队的控制，包括思想控制和组织控制，都是十分严密的，甚至一些高级军官都受到特务机关的暗中监视。鉴于军队的特点和这种统一战线本身的特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此制定了特殊的策略和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组建专门的部门或机构，来开展这项工作。1945 年 10 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指出：国民党依靠近 200 万军队，作为它统治中国的最重要支柱，我们必须在这一军队中进行有力的系统的工作，才能够达到战胜它的目的。中央决定在各中央局和分局之下设立机构，专门进行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指示要求：为使这一工作有效而迅速地开展，除应抽出有经验的得力干部主持这个部门外，还应选调一批与国民党各系军队有某种关系和适宜于这项工作的干部，加以适当训练，分配他们打入国民党军队、军事学校和军事机关中工作，在这些军事组织中，长期埋伏，结交朋友，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国民党军队集中的地方，要派出得力干部，就近指导这项工作。设立某种机构负责这项工作，这就为建立反战军事统一战线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1945 年 12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的指示中又强调：为了切实开展“高树勋运动”，“各地必须依照中央指示，设置专门部门，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各地领

导机关，则要给以密切指导”。[1]

第二，把工作重点放到如何争取敌军指挥官尤其是高级指挥官方面。由于军队本身的特点，指挥官的政治态度往往决定着其所率军队的状况，如能争取指挥官，也就可以争取其所率的军队。邯郸战役中，高树勋就率领整个新八军举行起义。毛泽东十分重视高树勋起义的作用和影响，即使在起义后仍争取和帮助他。1945年11月2日，毛泽东同朱德向刚起义不久的高树勋致电，电文说：“建候将军吾兄勋鉴：闻吾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士，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11月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西北军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利用俘虏军官及高级干部，向各部西北军展开这一运动”，以“争取西北军在内战中守中立，并进而起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第三，对国民党军队开展宣传攻势。利用国民党军队厌战情绪和敌军起义的例子，提出适当口号，开展宣传攻势。1945年11月12日，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扩大邯郸起义的宣传，具体措施包括：召集军队的和群众的大会，报告邯郸战役的胜利和新八军起义的意义，由各解放区民众团体和军队的负责人致电高树勋及其将士，表示慰问和庆祝，由新华社发表；将邯郸战役和新八军起义消息、高树勋通电和谈话印成传单，用一切方法向国民党军队、向一切大小城市的人民散发。并在国民党区域进行口头宣传，扩大邯郸起义的影响，在国民党军队和人民中扩大反内战、主张和平的运动，号召国民党军队中的官兵，学习新八军榜样，拒绝进攻解放区，在战场上实行怠工，和八路军新四军联欢，到解放区，回家去，等等。1945年11月17日，中央又专门发出指示，要求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5页。

冀热辽和东北的部队动员全体指战员及人民中的积极分子，对国民党军队开展宣传攻势，宣传的口号如："不打八路军，停止内战，平安回家"；"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官长要压迫你们打枪时，你们把枪口朝天放"；"想起抓壮丁，你们恨不恨？国民党对你有什么恩？为啥要拚命？"；"高树勋大将军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率万多人投了八路军，好男儿要学高树勋"，等等。1945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对党内的指示中，提出在1946年要"开展高树勋运动"。他指出："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①

第四，利用俘虏做敌军工作。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利用俘虏做敌军工作。1945年11月17日，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加强对俘虏官兵的工作，"为了揭破敌人欺骗与扩大政治攻势，可以宣传后释放少数俘虏回队，在我部队中应深入优待俘虏教育"。1946年9月5日，中央军委专门发出关于利用俘虏做敌军工作的指示，要求各解放区的政治机关"要用很大的力量，来教育俘虏，从俘虏方面调查研究对蒋军的工作方法和组织俘虏自己来做敌军工作"；要利用现有条件，创造更多的工作方法，如选印散发敌人官兵厌战日记、回忆、诗歌、歌谣、记者访问，召开俘虏官兵座谈会，利用广播逐日发表俘虏官兵全体姓名，让俘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4页。

虏写信回家，写信给其友人同学，广播俘虏官兵的座谈，书报上登载俘虏官兵报告平安的集体广告，等等。事实证明，这种利用俘虏做敌军工作的方式是行之有效的。

2. 毛泽东关于在经济方面照顾各方利益的统战思想

如果说毛泽东在军事方面的统一战线策略主要目的是直接削弱和动摇国民党的力量，那么，他关于经济方面的统一战线策略的目的则是如何直接巩固和壮大共产党的力量。毛泽东关于经济方面的统一战线策略，集中反映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关于土地问题，另一个是关于私人企业的问题。

在土地问题上，已如前述，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都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既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又保证地主的利益，因而达到调动地主和农民两方面的抗战积极性的目的。这也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策略在土地问题上的反映。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继续进行和谈，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仍维持着合作的局面。但在解放区，主要是抗战时期建立的老解放区，当时，农民的觉悟日益提高，对土地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有的地区农民自觉起来同地主作斗争，从地主手中夺得了土地。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既要维护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和农民的利益，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政党同农民的统一战线；又要照顾到地主方面的利益，不能搞公开的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以维护同国民党的合作关系，力争国内的和平民主，并减少中间派对共产党的疑虑。

从抗战胜利到1946年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解放区土地问题上是要求各地开展并深化减租斗争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1945年11月7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中强调："务使整个解放区，特别是广大的新解放区，在最近几个月内（冬春两季）发动一次大的减租运动，普

遍地实行减租，借以发动大多数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以实行减租和发展生产两件大事作为帮助人民解决困难的重要关键，我们就会获得人民的真心拥护，任何反动派的进攻是能够战胜的”①。在1945年12中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布置各解放区1946年的工作时，又强调开展减租减息和复查减租减息运动，并指出：“在新解放区，如无此项坚决措施，群众便不能区别国共两党的优劣，便会动摇于两党之间，而不能坚决地援助我党。”②

在这场大规模的减租运动中，山西、河北、山东、华中解放区很多农民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在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有的甚至实现了平分土地。另一方面，一部分汉奸、豪绅、恶霸、地主逃跑到城市中，大骂解放区的群众运动；有些中间人士，则发生怀疑，党内亦有少数人感觉群众运动过火。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从巩固党与农民的统一战线和党与中间派势力的统一战线的需要出发，对解放区土地政策作了新的规定：(1) 在广大群众要求下，应坚决拥护群众从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2) 坚决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并使其获得利益，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凡中农土地被侵犯者，应设法退还或赔偿。整个运动必须取得全体中农的真正同情和满意，包括富裕中农在内。(3) 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如在清算退租土地改革时期，由于广大群众的要求，不能不有所侵犯时，亦不要打击得太重。应使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2—117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5页。

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应着重减租而保全其自耕部分。(4) 对于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家属之属于豪绅地主成分者，对于在抗日期间无论在解放区和国民党区与我们合作而不反共的开明士绅及其他人等，在运动中应谨慎处理，适当照顾。(5) 对于中小地主的生活应给以相当照顾，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应多采取调解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与农民的纠纷。(6) 集中注意于向汉奸、豪绅、恶霸作坚决的斗争，使他们完全孤立，并拿出土地来，但仍应给他们留下维持生活所必须的土地，即给他们饭吃。

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还特别强调：对一切可以教育的知识分子，必须极力争取，给以学习与工作的机会。对开明士绅及其他党外人士，或城市中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只要他们赞成我们的民主纲领，不管他们还有多少毛病，或对于目前的土地改革表示怀疑与不满，均应当继续和他们合作，一个也不要抛弃，以巩固反对封建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一方面肯定和维护广大群众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愿望和热情，支持他们的行动，另一方面又照顾到富农、中小地主，并为此确定了具体的政策。这个土地指示，虽然在解决土地问题时还不可能彻底满足广大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却有利于巩固党的统一战线。正如中共中央在这个指示中所指出的：只要能遵守上列各项原则，保持农村中 90%以上人口和我们党一道坚持反封建的广泛统一战线，我们就不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万万数千万人口的解放区解决了土地问题，就会大大巩固解放区，并大大推动全国人民走向国家民主化。

在私有企业的问题上，主要是保证私营企业不受侵犯并支持

其发展、照顾劳资双方的利益等。1945 年 12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一份指示中指出：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工人则酌量增加工资”。1946 年 2 月 5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私人企业的政策方针问题给邓子恢的指示》中规定：凡在敌占期间，未与敌合作的私人企业，一律保护其继续经营；凡被敌伪没收的私人企业，一律发还原主；因敌伪资本强迫加入而变成敌伪资本与私人资本联合经营者，只没收敌伪资本，私人资本并不没收，以公私合营的形式继续经营。同时政府应帮助私人资本发展：私营企业购买机器原料及运销成品时，政府应尽可能予以便利，帮助其解决困难；私人企业如感资金不足，可请求政府贷款，亦可请求政府投资，但政府不强迫加入官股；私人企业如遇不可抗拒之意外损失，可请求政府以特别补助，政府在可能范围内当给以适当的补助。在劳资关系方面，规定政府当予以保护私人企业的正当利润，使私人资本有利可图，但私人企业不得故意高抬物价，紊乱市场，操纵国计民生，必须遵守政府的工厂法劳动法及其他一切法令，不得违法压迫工人，并应适当增加工人工资，以提高工人的劳动热情，增加生产。

上述政策，既照顾到私人企业的利益，有利于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又考虑到工人的利益，有利于调动工人的积极性。这对于解放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对于巩固和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战后初期毛泽东关于中立美国的统战思想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 1946 年 6 月全面内战爆发这段时间里，中

国共产党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国际环境。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打败，英、法等国受到很大削弱，苏联和美国成为两个主宰世界的大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开始从合作逐渐转向对立和冷战的局面，但在中国问题上，双方受《雅尔塔协定》的约束和各自在华利益的牵制而采取基本一致的态度。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一方面大力扶植蒋介石和国民党，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方面予以大规模援助，另一方面又先后派赫尔利、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关系，企图运用政治的和平的手段，帮助蒋介石建立一个统一的和亲美的政府，以实现其“不战而控制全中国”的目的。在这种非常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确定并实施了中立美国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

在抗日战争结束之际，毛泽东曾对赫尔利执行的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提出过强烈批评。但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并没有马上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大规模武装进攻中国共产党，而是力促国共和谈。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对美国采取中立并力争合作的统战策略。1945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对美外交政策的指示》，指出：目前我们对美外交极宜谨慎，方针仍是避免与美军冲突。对美国军民应不予扣留、不加伤害并负责保护，其所带武器电台亦勿收缴。如与国民党特务一起向我区活动，也仅扣留国民党特务，而不牵及美国人①。9 月 29 日，中共中央向山东、晋察冀和华中各局发出关于《美军登陆后我之策略的指示》，指出：“美国日内在天津及中国沿海登陆，如与我军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62 页。

及我之行政人员接触，我应采取欢迎友好态度，避免与美军冲突”。如果美军有反我行动，向我开枪开炮或拘捕我方人员、占我地方等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时，则要求将美军干涉行动的具体情形尽速电告中央，并加以公布，而不要实施抵抗反击。[①] 当时采取这一态度的出发点，是考虑到“美国政界及舆论界同情我们的甚多”、所以“我们对于赫、魏暂时不采取公开揭露的政策，对美国情报人员军事人员均应采取友善态度，不要敌视他们”[②]。1945 年 10 月，因美军多次挑起袭击中共办事处和解放区军民的事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曾决定采取顽强反击和激烈对抗的态度，但并未完全放弃中立美国的政策，曾多次指示部队在抵抗美军行动时绝不要先开枪。10 月 29 日，中央在关于对待在华美军的方针的指示中仍指出：目前我们对美军的方针，是在其尊重我方权益的条件下，欢迎其与我合作；在一般外交场合下，应向美军人员解释我方在相互尊重精神下，一贯与美方友好合作的方针[③]。11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正式而明确地提出了“中立美国”的统战策略思想。这个文件指出：“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美国对华政策是尽力扶蒋、打共、反苏，而蒋之政策则在打共时企图中立苏，在反苏时必定连上共。故苏联目前对华政策在形式上乃不得不与中共隔离，在对美斗争时有时中立蒋，在对蒋时亦常不联系美。因此，我们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一方面固应表示与苏联无关，另方面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册，第 302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册，第 304 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册，第 390 页。

们一时或某一种程度的困难。”[①] 这份文件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中立美国”的原因及目的表述得一清二楚，在当时情况下这一策略思想也起到了某些效果。当然，实行这一策略并不意味着对美国的所作所为完全退让，对其干涉中国内政的举动必须揭露、批评和抵制。中共中央在同一文件中又指出：中立美国只是对蒋斗争中的一种策略，即是对美采取不挑衅的政策，以减少美国寻隙借口，并非不反对美国殖民地中国的政策，也非不抗议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和参加中国内战的政策，更非在美军进攻我们时采取不抵抗政策。相反地，对于美政府这种帝国主义政策，应持坚定的立场，严正的批评和坚强的抵抗以反对之，才能给以打击和教育人民[②]。

1945 年 12 月 15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主张由中国各政治力量的代表召开全国会议，商量和平团结的有效办法。12 月 22 日，被杜鲁门任命为特使的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来华以调停国共关系。12 月 27 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公报，声明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上述情况的出现，使内战有可能暂时停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采取与美国合作至少使美国中立的策略。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在与马歇尔会谈时，多次表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诚意和愿与美国合作的良好愿望。毛泽东通过周恩来转达了对马歇尔的谢意，感谢他为促进中国停止内战所进行的努力，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以他的态度和方法为基础与美国进行合作[③]。

在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之下和马歇尔的调停下，1946 年 1 月，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册，第 455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册，第 455－456 页。
③ 《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41 页。

国共双方先后达成了停战协议和《整军方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1946 年 1 月至 3 月，中国曾出现了一段短暂的和平时期。但从 4 月份开始，因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大举进攻共产党的军队，并在全国实行恐怖统治，迫害民主人士，国共关系急剧恶化。马歇尔在 3 月 11 日回国述职后，又在 4 月份返到中国继续调处国共矛盾，但他的态度越来越倾向蒋介石一边，这是美国对华政策新变化的反映。

在上述形势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仍决定采取对美国和蒋介石区别对待的态度。4 月 20 日，毛泽东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发出电报，要求不要准备对国民党和美国两方同时弄僵。电报指出，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内战与独裁的方针，力争和平与民主，为此目的，不怕与国民党弄僵；但对美国则除非他恢复赫尔利政策，公开全面地赞助国民党内战与独裁，我们不应和他弄僵。所以，一切反内战反独裁的主张均应向马歇尔严正表明意见，但避免用激烈态度与抗议形式，要同马歇尔保持友好关系。1946 年 6 月 21 日，在全面内战爆发的前夜，毛泽东还给周恩来发出电报，要求按既定方针，“争取美国人，打击反动派。”

在国民党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方面严词抨击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租借法案和支持中国内战的做法，另一方面在外交上仍持谨慎的态度，并注意把美国政府中的民主派与反共的反动派分开，把美国人民与美国政府区别开来。1946 年 7 月 6 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发表纪念“七七宣言”后对美国及国民党斗争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加强对美国民主人士之联系，主张国内开各党派在内的政治协商会议，不论何人，只要赞成政协者均表欢迎”，“因此，各地对北平执行部及各小组仍应照前指示，尊重国美两方代表，并注意拉拢美国

一切人员，对马歇尔不要公开说他好，也不要公开说他不好，在谈判中仍须经过他来缓和局面；对各地美军，仍应避免冲突”①。7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对美宣传斗争的指示》中又指出：“为了争取更多美国人民与进步官员对我的了解与同情，我们在一切宣传中必须严格掌握美国的政府与人民（后者一般地一贯同情支持我国民主势力）之间的区别，美国政府人员中的帝国主义分子与民主分子之间的区别，美国政府人员中决定政策者与不决定政策者之间的区别，美国政府今天的政策与明天可能改变的政策之间的区别，甚至同一个人（如杜鲁门、马歇尔）今天与明天态度的区别，同一个人同一机关所发表的同一篇声明或谈话中不同语句中的区别，不要笼统反对，更不要笼统反美。”②

中国共产党当时对美国的这种中立的、严格区别的和灵活的政策，既达到了尖锐批评美帝国主义分子的反动政策的目的，又有利于争取美国广大人民与民主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同情，扩大党的外交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

①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111页。

②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123页。

七、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彻底破裂，毛泽东关于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

1946年6月下旬开始，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随后，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并宣告国共谈判完全破裂。在国民党反动派气势汹汹的进攻面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内战爆发后的形势，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除了在军事上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以粉碎敌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外，还提出建立更为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这对于团结全国人民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一）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对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关于建立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

1. 毛泽东对全面内战爆发后形势的科学分析

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政府的援助和支持下，经过一系列的内战准备工作，于1946年6月下旬开始派重兵围攻鄂豫边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接着又在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南等，大规模地进攻解放区，发动了以消灭解放区和人民军队为目标的反革命全面内战。

国民党反动派在发动全面内战之初，其军队的数量、装备和战争资源等方面与人民解放军相比，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1946年7月，国民党军队的总人数达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仅约127万人，其中野战军约61万人。从装备方面看，国民党政府接收了侵华日军和伪军的装备，并得到美国政府的大量军事、经济援助，拥有各种新式装备的陆、海、空军；人民解放军不仅没有海军和空军，就是地面部队步兵的装备也是“小米加步枪”，在装备上得不到任何外援。从战争资源看，国民党政府统治着约占全国76%的面积、3.39亿人口的地区，占领着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拥有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当时解放区的面积只约占全国的24%，人口约1.36亿，并且处在经济落后的农村。从战争前线的兵力来看，国民党用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总计为193个旅，160万人，占国民党正规军队总数的80%，大大超过人民解放军的力量。

无论从全部的军事、经济力量还是从战场直接作战的兵力看，国民党方面都大大强于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在这种敌强我弱的局势下，许多人认不清形势。国民党方面认为自己会很快取得内战的胜利。蒋介石声称，只须三个月到六个月，他就可以取得胜利；他的参谋总长陈诚更是认为，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整个解决中共的军队。[①] 国内很大一部分人民中间，对人民革命力量能否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表示担心和疑虑。党内也有一部分同志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惧怕美帝国主义和新的世界大战，在美蒋反动派的进攻面前，存在着悲观软弱

---

① 1946年10月17日陈诚对记者的谈话，见《中央日报》1946年10月18日。

的情绪。在国际上，外国也有人不相信中共能战胜国民党的力量，并害怕中国革命会导致美国大量出兵干涉，把苏联卷进去以致引发新的世界大战。

在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清醒的估计，从而为党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在全面内战爆发前，毛泽东于1946年4月就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全面内战爆发之后，毛泽东在《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中，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以及在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谈话时，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人民革命力量必然会战胜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趋势，鼓舞了全党和革命人民争取胜利的信心。

在分析国际形势时，针对当时很多人在中外反动派反苏、反共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言论的宣传影响下，对国际形势感到悲观，并散布妥协的论调，毛泽东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美、英、法等国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较迟妥协的问题，不至于爆发战争。所谓妥协，是指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作坚决有效的斗争的结果。然而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反而要求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在中国，广大的人民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不但不会因此引起新的世界大战，与此相反，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和革命战争的胜利，将成为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毛泽东还进一步明确

指出：美帝国主义进行反苏战争宣传，虽然是进行反苏战争的政治准备，但它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而它在没有压服本国人民和处于辽阔的中间地带的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所以，“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①] 在《三个月总结》这一指示中，毛泽东又明确指出，极有利的国际政治形势在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已引起各国广大人民日益不满。各国人民的觉悟程度日益提高。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民主斗争日益高涨，各国共产党力量有很大的发展，反动派想要压服它们是不可能的。苏联的国力及其在各国人民中的威信日益高涨。美国反动派和被美国反动派所扶助的各国反动派，必然日益陷于孤立。”[②]

在分析国内形势时，针对国内和党内有些人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惧怕于国民党反动派力量表面上的强大，毛泽东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 。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③] 全面内战刚爆发三个月，毛泽东在分析国内形势时又说：“三个月以来，国民党区最广大阶层的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对于国民党和美国政府互相勾结，发动内战，压迫人民这一种情况的认识，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9页。

③ 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7页。

很快地提高了。关于马歇尔调解是骗局，国民党是内战祸首这些真理，明白的人已日益增多。广大群众在对美国和国民党失望之余，转而寄希望于我党的胜利。这是极有利的国内政治形势。"[①]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虽然在军事上处于暂时的优势，但在政治上却是劣势，因为全国人民逐渐看清了他们不要和平民主、坚持战争与独裁的真实面目，转而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自卫战争。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这是能够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根本保证。就是从军事上看，国民党反动派也有其不可克服的弱点，即战略意图与兵力的矛盾、战术要求与战略意图的矛盾、中央军和"杂牌军"的矛盾、"首领"意图和下级情绪的矛盾以及战术的弱点等等。[②]此外，国民党反动派随着内战的发动和扩大，经济上的困难也将日益突出，引起国统区的危机。从国内形势看，人民革命力量也有自己的优势条件，没有理由悲观失望。

在正确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时，毛泽东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考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③] 沙皇是纸老虎，希特勒是纸老虎，墨索里尼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至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

---

① 毛泽东：《一个月总结》(1946年10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9页。

② 《新华社记者评蒋介石军事上的五大弱点》(1946年8月19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471—473页。

③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5页。

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①] 毛泽东特别指出：提起美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真正有力量的是美国人民。就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国民党依仗其优势兵力发动全面内战的严重关头，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抓住事物的本质，高瞻远瞩、洞察国际国内形势，善于估计有利于人民力量的各种因素，科学地阐明劣势转变优势、正义战胜邪恶、进步战胜反动的道理，因而为中国人民提出了根本的战略思想。这就是，革命人民在战略上必须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认清形势和前途，从理论上武装自己，增强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具有重大的作用。

2. 毛泽东关于建立广泛的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对国际国内形势的上述分析，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制定了一系列正确而富于远见的原则和策略，以便能够以劣势力量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

在军事上，面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采用哀兵必胜的策略，中共中央提出了“武装自卫”的口号。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努力争取和平局面的，而战争是国民党强加给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在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5页。

进攻面前被迫应战以武装自卫，其目的还是恢复人民所希望的和平。这就得到了人民的广泛同情。在作战方针上，中共中央军委制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及地方为主要目标。在作战形式上，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同时还强调，在每一战役中，我军必须集中4倍、5倍、6倍至少3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这样就可以在总的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创造各个战役中敌弱我强的优势，以有效地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进攻。由于采取了正确的作战原则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从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的一年时间里，人民解放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为人民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创造了条件。

在经济上，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和应付长期战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必须依靠自力更生作持久打算的思想。解放区应有计划地努力发展生产和整理财政，坚持实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等方针。在财政供应上，必须使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又必须使人民负担较前减轻，其生活仍能改善。同时还必须提倡节约，力戒浪费。

在政治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全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以彻底孤立国民党反动派的原则。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中提出：“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

争取的人。”①

1946年11月下旬，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的一次谈话中指出：要胜利就要统一战线，就要孤立敌人。敌人也想孤立我们，但敌人是孤立的。世界上三块地方，美国、苏联、美苏之间，这三块地方的人都反对美国反动派。因此，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宽广的。我们现在的条件比抗战时期更好些，统一战线比那时更广，很多人以前不理我们，现在要来理我们，我们在国际国内都有广大的统一战线，这是基本问题。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为了总结全面内战爆发以来党领导自卫战争的经验，对国内形势新变化作出分析，以推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向前发展，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就中国革命的高潮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着重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毛泽东指出，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在中国半个世纪中只有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几次。而这一次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高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三次，在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上是第四次。这一次与前几次不同，它是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的，在规模上和深刻程度上都将超过前几次高潮。前几次革命高潮，都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性质。而这一次，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由于美国要同国民党反动派共同统治中国，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就“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这里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7页。

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①] 毛泽东强调指出：“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它和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不但规模同样广大，而且有更加深刻的基础。全党同志必须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而奋斗。”[②]

在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毛泽东于1947年10月10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起草的政治宣言里指出：“日本投降后，人民渴望和平，蒋介石则破坏人民一切争取和平的努力，而以空前的内战灾难压在人民头上。这样，就逼得全国各阶层人民，除了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以外，再无出路。”[③] 在宣言中，毛泽东把“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项基本政策而列为八项政策之首。

1947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为了全面制定党的行动纲领以准备夺取全国胜利，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重要报告，阐明了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各项纲领和政策。毛泽东在论述政治纲领时，把建立全民族的民主统一战线当作一个主要内容。毛泽东指出，1947年10月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关于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策，也是中国共产党现时最基本的政治纲领。从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3页。

③ 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5页。

表面上看，我们的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时期相比似乎是缩小了。但是在实际上，革命的统一战线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巩固。这件事，不但同我们的土地政策和城市政策相联系，而且同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同蒋介石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新的高潮时期这一总的政治形势密切地联系着。

此后，毛泽东在1948年春（至1948年3月下旬毛泽东东渡黄河离开陕北时为止）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指示和文件，对党的统一战线的各项具体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补充和完善，因而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关于建立广泛的全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原则、方针和策略。

从1946年6月下旬全面内战爆发，到1948年3月下旬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陕北的近两年时间里，毛泽东对建立广泛的全民族的民主统一战线问题作了全面的论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阐明了建立这种统一战线对战胜国民党反动派、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性。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① 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虽然从全体看从长远看是纸老虎，但从暂时来看，在当时发动内战之初，其力量还是相当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不团结一切可

①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7页。

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就难以达到战胜和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目的。

第二，指出了组成这条统一战线所应争取的力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毛泽东指出，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包括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在另一次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毛泽东又指出，由参加这个革命的人们所组成的统一战线是十分广大的，这里包括了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大众。在统一战线中，他们所处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包括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等）是统一战线中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是团结和争取的力量，对于他们必须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称许其对的方面，批评其错的方面，淘汰其中的坏分子，这是很重要的。”①

第三，分析了全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特点。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统一战线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比较，有以下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两者的组成成分不同。后者包括了以国民党和蒋介石为代表的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而前者则因他们发动反革命内战而把他们抛弃了。毛泽东指出，由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他们就宣布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为敌，他

---

① 《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1947年10月27日）。

们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放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使这个斗争迅速发展下去。其二是两者的范围和深度不同。前者比后者范围更广、程度更深。毛泽东指出：从表面上看，现在我们的革命民族统一战线比较抗日时期似乎缩小了。“但是在实际上，只是在现在时期，只是在蒋介石出卖民族利益给美国帝国主义，发动反人民的全国规模的国内战争之后，只是在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罪恶已经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之后，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才是真正地扩大了。”① 这是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和国民党在中国人民中还没有完全丧失威信，还有许多的欺骗作用。在他们发动全面内战后，他们的一切欺骗已被他们自己的行为所揭穿。他们已经失去群众，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与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由于采取了彻底的土地政策，在解放区获得了比抗战时期广大得多的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压迫和中共采取坚决保护群众利益的正确方针，中国共产党也获得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同情。所以，现在的革命统一战线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大，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巩固。其三，两者的目标也不一样。后者的目标是打败日本侵略者，而前者的目标是推翻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无产阶级（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第四，强调了无产阶级在这条广泛的全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问题。毛泽东强调指出，这个统一战线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反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6页。

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①] 毛泽东要求全党要牢记党的历史上统一战线方面的教训。在1927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时，党的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在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又出现过过分信任国民党、把抗日战争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后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这种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执行了“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使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并不断取得胜利。所以，在全民族的民主统一战线中，必须反对党内的和统一战线中的右倾投降主义倾向，“我们必须领导同盟者，决不能让同盟者领导我们，这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反蒋反美斗争中极为重要”。[②]

（二）毛泽东关于解放区统一战线的具体政策的论述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解放区既是国民党军队包围和进攻的目标，又是人民革命力量借以粉碎敌人进攻和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基本依托点和根据地。因此，如何巩固解放区，充分调动解放区人民的积极性以支援解放战争，是关系到能否粉碎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一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7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1947年10月27日）

个重大问题。要调动解放区人民的积极性，就必须实行统一战线的各项具体政策。毛泽东在一些会议上作的报告和为中央起草的很多指示中，对全面内战爆发后党在解放区实行的各项统一战线具体政策进行了阐述。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阐述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政策。

土地改革政策是党在解放区实行的一项极为重要的统一战线政策。这是因为，解放区处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农民占总人口的90%以上。实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既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又是无产阶级团结农民、争取农民支持和与农民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各解放区不可能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取得自卫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在论述土地改革与争取农民支持的关系时说：经验证明，凡坚决和迅速执行了中央的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凡对中央的指示执行不坚决，或借口战争忙而忽视土地改革的地方，“农民即站在观望的地位”。① 这种观望的态度，显然是不利于争取农民的支持和巩固解放区的。所以毛泽东强调：各解放区今后不论战争如何忙，必须“坚决地领导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② 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务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都能获得土地。”③

全面内战爆发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

---

① 毛泽东：《三个月总结》(1946年10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8页。

② 毛泽东：《三个月总结》，《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8页。

③ 毛泽东：《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6页。

个阶段是从1946年6月至1947年9月为止，这个阶段基本上执行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这个指示是党总结过去20多年领导农民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又结合当时历史发展形势及革命斗争策略需要制定的。当时，内战局势虽十分严重，但国内和平之门尚未关闭，因此这个指示一方面肯定了农民的土地要求，批准农民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并使之合法化，提出了通过群众斗争实现耕者有其田；另一方面又给地主以较多的照顾和让步。这有利于争取实现国内和平。在“五四指示”实行后一个多时间里，各解放区很多农民获得了土地，调动了他们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据1947年7月统计，东北解放区有629万多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土地500多万垧，平均每人得地8亩。从1946年8月至1947年7月的11个月中，东北地区参战者达59万人，动员担架4.3万副，大车8.6万辆，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但是，土地改革运动发展很不平稳，很多地区的农民翻身却没有得到土地，这影响了农民积极性的民挥。其原因虽有多方面，但与“五四指示”本身的土地政策不彻底，对富农和地主照顾过多以致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有重要关系。

从1947年7月开始，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标志着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以支援和推动人民解放战争向前发展。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委在刘少奇主持下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同年10月10日正式公布。从这时开始，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进入平分土地、彻底消灭封建半封建的剥削制度的阶段。毛泽东在谈到全国土地会议和土地

法大纲时说："一九四七年九月，我党召集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立即在各地普遍实行。这个步骤，不但肯定了去年'五四指示'的方针，而且对于去年'五四指示'中的某些不彻底性作了明确的改正。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原则下，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是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一种方法，这是完全适合于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的。"① 毛泽东还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地主和富农应得的土地和财产，不能超过农民群众。

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得到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各解放区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土地革命高潮。但由于政策规定不完善，加上农民中绝对平均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土地改革中很快出现了侵犯中农利益、过分打击地主富农以及侵犯私营工商业等"左"的错误，结果从另一个方面损害了党在农村的统一战线策略，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针对这一情况，中共中央于 1947 年 12 月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讨论了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具体政策，对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开始进行纠正。随后，毛泽东在 1948 年春为中央起草的一系列指示中，对农村土地改革中的各项具体政策进行了阐述：(1) 提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2) 指出土地改革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只能是和必须是贫农。这个贫农阶层和雇农在一起，占了中国农村人口的 70%左右。因此，

---

①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 年 12 月 25 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50 页。

土地改革的主要的和直接的任务，就是满足贫雇农群众的要求。为着坚决地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必须将贫雇农的利益和贫农团的帮头作用，放在第一位”。[1] 党必须经过贫雇农发动土地改革，必须使贫雇农在农会中在乡村政权中起带头作用。“乡村中不但必须组织包括雇农贫农中家在内的最广泛群众性的农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而且必须首先组织包括贫农雇农群众的贫农团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以为执行土地改革的合法机关，而贫农团则应当成为一切农村斗争的念领导骨干。”[2] (3) 强调“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3]“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4] 各地在平分土地时，必须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在没收分配封建阶级的土地财产时应当注意某些中农的需要。在划分阶级成分时，必须注意不要把本来是中农成分的人，错误地划到富农圈子里去。对中农和其他阶层订错了成分的，应一律改正，分了的东西应尽可能退还。划分中农的标准是有剥削收入的农民，其剥削收入占总收入 25%（四分之一）以下者，应订为富裕中农，以上者为富农，富裕中农的土地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4) 提出“必须将新富农和旧富农加以区别”。[5] 在解放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时期发展起来的富农，在平分土地时，照富裕中农待遇，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其土地。旧式富农按照

---

① 毛泽东：《关于目前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 年 1 月 18 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68 页。

②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 年 12 月 25 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50 页。

③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51 页。

④ 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69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70 页。

平分原则将多余的土地及一部分财产应当拿出来分配。他们的剥削带有封建半封建性质，而且他们所占土地数量较多，质量较好，如不平分则不能满足贫雇农要求。但对待富农同对待地主应有所区别。(5) 对大、中、小地主，对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和非恶霸，在平分土地的原则下应有所区别。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分子必须经人民法庭审判和县级以上政府机关批准才能予以枪决并公布，但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它只会使我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于孤立”。① 要把一切不坚决破坏战争和土改而在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地主富农看作是国家的劳力而加以保存和改造。“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必须按照土地法给以不高于农民所得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② (6) 要求“在不同地区实行土地法的不同策略”，③ 即在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早已分配土地，只须调整部分土地；从日本投降到大反攻(1945 年 9 月至 1947 年 8 月) 两年内所解放的地区，按照土地法的规定，普遍彻底地分配土地；在大反攻扣新解放的地区，因地主、富农势力大，群众尚未发动，土地法的实施应分阶段进行，应采取先专门打击地主然后解决富农多余土地的做法。以上政策的实施，使土地改革运动很快走入正轨，达到了发动贫雇农、团结中农和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目的。

第二，论述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所应采取的统一战线政策。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即中小工商业者，毛泽东指出：这个阶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7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71 页。
③ 1948 年 2 月 3 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

级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软弱的和动摇的阶级。他们中的少数右翼分子是革命的敌人，“但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由于也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迫害和限制，他们又可以参加人民民主革命，或者对革命守中立”。[①]他们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而不是人民大众的主体，也不是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但是因他们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又因为他们可以参加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或在斗争中采取中立态度，所以“我们便有可能和必要去团结他们”，以争取其大多数，孤立其少数。毛泽东强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②]“必须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③]“否 则，我们便要在政治上犯错误”。[④]毛泽东还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而不是一般地消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而且，“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⑤]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采取过左的错误政

---

① 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1948 年 3 月 1 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88 页。

② 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89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69 页。

④ 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89 页。

⑤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 年 12 月 25 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54 页。

策，如像我们党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所犯过的那样（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得税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者，不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目标，而从近视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为目标），是绝对不许重复的，“这些错误如果重犯，必须要损害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利益”。[①] 针对彻底平分土地过程中出现的没收地主富农的工商业的现象，毛泽东指出，各解放区过去保护并奖励一切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人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仍应继续；减租减息时期鼓励地主富农转入工商业的政策是正确的，认为“化形”而加以反对和没收分配是错误的。“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一般应当保护，只有官僚资本和真正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才可以没收”。[②] 因此，在领导方针上“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家、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③] 同时，还必须处理好政府与私营工商业的关系和劳资关系。政府对于有益于国民经济的私营工商业征收营业税，必须以不妨碍其发展为限度。在劳资关系方面，必须“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④] 毛泽东强调：“应当向工会同志和工人群众进行教

---

①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5页。

② 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9页。

③ 毛泽东：《关于工商业政策》（1948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5页。

④ 毛泽东：《关于工商业政策》，《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5页。

育，使他们懂得，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应当引导工人和资本家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共同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产，便利推销，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支持战争的目的。”① “工人生活必面酌量改善，但是必须避免过高的待遇。”② 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够达到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发展生产和支援解放战争的目的。

关于知识分子，他们也是全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力量。对于他们应采取团结教育的政策。毛泽东指出：“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中国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因此，我党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只对其中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才经过群众路线予以适当的处置。”③

关于开明士绅，毛泽东指出，他们是地主和富农阶级中带有民主色彩的个别人士。他们同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矛盾，同封建地主、富农也有某种矛质。抗日时期，我党在各解放区政权机关（参议会和政府）中同开明士绅合作，是完全必需的，并且

---

① 毛泽东《关于工商业政策》，《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5页。

② 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9页。

③ 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9－1270页。

是成功的。我们现在团结他们，并不是因为倔们在政治上有什么大的力量，也不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有什么重要性，而是因为他们在抗日时期和反美蒋斗争中，在政治上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因此，对于那些同我党共过患难确有相当贡献的开明士绅，在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照顾。其中政治上较好又有工作能力者，庆当继续留在高级政府中给以适当的工作。政治上较好但缺乏工作能力者，应当维持其生活。其中为地主富农出身而人民对他们没有很大恶感者，按土地法平分其封建的土地财产，但应使其避免受斗争。另一方面，在土地改革时期，如果有少数开明士绅表示赞成我们的土地改革，那么对于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也是有益的。特别是对于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和争取全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争取全国范围的几十万开明士绅，以及孤立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蒋介石反动派，都是有益的。毛泽东强调说："正因为开明绅士有这些作用，他们也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中的的一分子，所以，团结他们也是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在现阶段，只要开明绅士能够做到赞成反美、反蒋，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土地改革，"我们应应该毫无例外地去团结他们，并且在团结中教育他们。"①

第三，论述了解放区政权建设中的统一战线政策。

针对土地改革中一些通讯社、报纸或广播电台错误地孤立地宣传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或者说民主政府只是农民的政府，或者说民主政府只应该听工人和贫雇农的意见，而对中农、对独立劳动者、对民族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等则一概不提的做法，毛

---

① 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1948年3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0页。

泽东指出："这是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1] 他强调说：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它是一种联合性质的政权。因此，贫雇农虽在农会中在乡村政权中起带头作用，但必须团结中农和自己一道行动，而不是抛弃中农由贫雇农包办一切。在老解放区中农占多数贫雇农占少数的地方，中农的地位尤为重要。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找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佃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找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如果在政权建设中不实行统一战线政策，不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学生、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绅士），"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2]

---

(1) 毛泽东："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1948年11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0页。

(2) 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8页。

（三）国统区人民运动的高涨，毛泽东关于运用统战策略发展第二条战线的思想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后，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希望完全破灭了。他们对国民党当局的独裁内战政策和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表示极大的愤怒。全面内战的爆发和美国对华侵略的加紧，造成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致使民不聊生，各阶层人民纷纷起来进行斗争。这样，从1946年底开始，国统区的人民运动高涨起来。

1946年11月和12月间，上海市3000多摊贩为反对国民党政府禁止营业，举行请愿游行。国民党当局严加镇压，军警开枪打死17人，打伤100余人，逮捕一大批人。但是，严厉的镇压并不能扑灭人民斗争的火焰，斗争的队伍越来越大。上海全市绝大多数商店停业，声援摊贩的斗争。这场斗争，明显地具有反美侵略和反官僚资本垄断的政治色彩。

1946年12月底，北平爆发了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大规模的斗争。1946年12月24日傍晚，在北平发生了美军士兵强奸去看电影的北大女学生沈崇的暴行。12月26日，北平三家报纸报导了这一事实的真相。但是，国民党当局不但不处理美军士兵，反而通过中央社污蔑受害者“似非良家妇女”，美士兵的所为是“酒后失检”。这种造谣污蔑，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在北大校园，1000多名学生举行了各系级和各社团代表大会，决定于12月30日进行罢课游行。12月30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5000多名学生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游行。他们高呼“美军退出中国！”“维护主权独立！”等口号，还在美军的军事调处执行部门口用英语高

呼："美军滚回去！"他们的斗争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许多青年店员和公务人员也自动加入到游行队伍的行列。随后这场反美爱国斗争，很快扩展到全国各大中城市。从12月底到1947年1月，天津、上海、南京、开封、重庆、昆明、武汉、广州、杭州、苏州、台北等地的学生，先后纷纷集会、罢课或示威游行，开展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的爱国示威运动，参加运动的学生达50万人。在北平、上海等地，许多教授、学者、文化界知名人士，纷纷表示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一些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成员也纷纷发表声明或捐款，对学生反美暴行的爱国行动表示支持。

上海摊贩掀起的斗争和由北平开始的抗暴学生运动，表明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为主体的人民运动走向高涨，并开始形成第二条战线。中国共产党在这种形势下，加强了对斗争的组织，使国统区人民运动在1947年5月出现了新的高潮。

1947年四五月间，南京、上海等一些城市的学生提出了"抢救教育危机"、"向炮口要饭吃"的口号。5月4日，上海学生上街进行反内战宣传，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各校立即开展了罢课斗争。5月15日，南京中央大学等高校学生3000人到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请愿，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在未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他们决定于5月20日举行大规模的游行。5月18日，北大、清华等高校学生也上街举行游行活动。这样，在南京、北平等地很快形成了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斗争中心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5月18日，国民党当局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企图以高压手段平息学生运动。但学生们并未屈服。5月20日，宁、沪、苏（州）、杭（州）16个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在南京走上街头，举行"挽救教育危机大游行"。游行队伍在珠江路口遭到军警的镇

压，重伤19人，轻伤90余人，被捕20余人。学生们向当天开幕的国民党一手包办的第四届三次国民参政会请愿，高呼“反饥饿、反内战”口号。同时，北平大中学生7000多人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游行，时间长达5个多小时。天津的学生也进行了游行斗争。

“五二〇惨案”发生后，广大学生进行了更强烈的反抗斗争，这场斗争又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并席卷长沙、昆明、重庆、广州、福州、南昌、桂林、开封、沈阳等60多个大中城市，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和援助。学生运动的高涨，又促进了国统区工人、农民和市民斗争的向前发展。在1947年，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主要工业城市有120万工人进行了3000次反内战、反美暴行的罢工游行斗争。南方各省区反抗国民党残暴统治的农民武装达数十万人。很多大中城市的贫民因面临饥饿而掀起了大规模的抢米风潮。以上斗争标志着国统区的人民运动已正式形成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标志着国民党反动派陷入完全孤立的困境。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高涨表示十分关注，对形势作了科学的估计，提出了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发展第二条战线的思想。这一思想具体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首先，分析了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发展第二条战线的客观可能性。

毛泽东对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作了科学准确的估计，充分肯定了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来发展第二条战线的客观可能性。这种客观可能性包括国民党统治下的经济政治危机和各阶层人民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与反抗情绪。关于政治危机，毛泽东指出：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

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全国人民除了斗争，再无出路”。“美蒋的上述反动政策，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这里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①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中国几乎成了美国的殖民地，美国人在中国享有一系列特权。1946年10月，国民党当局与美国成立了所谓“中美商务仲裁会”，规定美国人在中国犯罪应交美“当局”裁判。北平的国民党当局还与驻华美军签订《中美宪警联合勤务协定书》。依“协定书”规定，美军肇事须由美警宪处理，而北平警察局仅有旁听权而已。1946年11月和12月，国民党先后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中美空中运输协定》。通过上述条约，美国人在中国境内（包括海上、陆上、空中）获得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种种特权，成为中国的太上皇。驻华美军以“占领者”的姿态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犯下了累累罪行。仅据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等五个城市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8月到1946年底，美军暴行至少有3800起以上，中国人死伤人数超过3300人以上②。从1945年8月至1946年7月，美军强奸中国妇女达300余人。美军在中国的暴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国民党政府在大量出卖主权的同时，置各阶层人民的和平民主要求于不顾，不仅破坏政协决议发动内战，而且单方面召开分裂国家的国民大会，强迫中共代表团离开国统区以关闭和谈大门，并派重兵进攻延安。这种倒行逆施，使

---

① 毛泽东：《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2—1213页。

② 1947年1月10日《解放日报》第1版。

广大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更加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面目。美蒋反动派在政治上把自己放在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地位，势必激起人民的反抗怒潮。

关于国统区的经济危机，毛泽东指出："由于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在著名的卖国条约——中美商约中同美国的帝国主义资本相结合，使恶性通货膨胀迅速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日趋于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趋于恶化，为数众多的中等阶级分子日益丧失了他们的积蓄而变为毫无财产的人，罢工、罢课等项斗争因之不断发生。中国空前的经济危机，已经威胁着各阶层人民。"① 由于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取得了种种特权，美国的商品和资本大量流入中国。据海关统计，1946 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中，对美贸易已占 53. 19%，美国商品占据着中国各地城乡市场。美国在华投资占全部外国在华资本总额的比例，由 1936 年的 8% 上升到 1947 年的 70%（以后又达到 80%）。与此同时，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同美国资本结合在一起，垄断和操纵着中国的国民经济。在工业方面，官僚资本已占中国全部工业资本的 2/3，在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中占 80%。在商业和金融业方面，四大家族也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绝大多数的商业机构、贸易公司和金融机构。此外，国民党政府还对各行各业征收苛捐杂税，如名目繁多的工商业税就占一般中小工商企业营业额的 20—30%，在农业方面，苛捐杂税超过战前（1936 年）的 4 至 5 倍，有的地方还超过 20 倍。这样，在美国的经济侵略和官僚资本的控制垄断之下，在国民党政府的残酷剥削下，国

---

① 毛泽东：《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13 页。

民党统治区的民族工商业遭到严重摧残，工农业生产和工商业经营受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随着内战规模的扩大和军费开支的增多，国民党政府财政赤字急剧增大，大量钞票的发行，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1947年7月的物价比抗战前夕的物价上涨6万倍。物价飞涨造成工商业大批倒闭和农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使广大劳动人民和一般市民、学生以及中下层小资产阶级处于饥饿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企图以经济统制的手段挽救经济危机，其结果事与愿违，导致经济的进一步混乱和恶化。毛泽东在谈到国统区的经济危机时指出："这种情形，迫使各阶层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为救死而斗争。"① 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危机和各阶层人民的不满与反抗情绪，为中国共产党运用统战策略发展第二条战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二，论述了运用统战策略发展第二条战线的重要性。

毛泽东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② 毛泽东把国统区的学生运动和整个人民运动比作第二条战线，从而肯定它对配合第一条战线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具体来说，这种重要作用表现在：（1）学生运动的日益扩大并受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同情，使"蒋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入孤立，蒋介石的狰狞面貌暴露无遗"③，这样，"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就将在广大人民面前日益丧失自己的威信"④。这就是说，这种

---

① ②③毛泽东：《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24—122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4页。

运动可以起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和教育人民的作用。(2)“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而国统区人民运动的高涨，就严重地动摇了敌后方的稳定，使国民党反动派处于两面作战和前后受到夹攻的狼狈困境，就会分散敌人的力量，对人民解放战争起着重要的配合作用。(3) 国统区人民运动的发展，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斗争走向高潮的一个重要因素。毛泽东指出：“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①

第三，制定了一套正确的以发展第二条战线为目标的统一战线策略和措施。这套统一战线策略和措施有以下几点：

(1) 从组织上加强对国统区人民运动中的统战工作的领导。1946 年 12 月 16 日，中共中央决定对中央城市工作部进行改组，由富有国统区统战工作经验的周恩来兼任城工部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随后，中共中央又确定中央城工部的工作任务是在中央领导下，管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工作（包括工、农、青、妇），并负责训练这方面的干部。解放区的各中央局、分局和有关区党委均设城工部。在国统区，由上海局管辖长江流域及西南各省与平、津、青岛、台湾地区的工作；由香港分局管辖华南地区的工作。1947 年 4 月 29 日，中共中央又正式作出《关于中央城工部的工作方针及各地城工部工作办法的规定》。上述措施对加强国统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2) 根据运动发展的情况和群众的觉悟程度，提出易于为群众接受的口号和主张，以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参加，并逐步把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12 页。

运动引向深入。194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各大城市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中，要求在不能游行的地方，也可进行请愿及组织后援会，一面提出目前具体要求，如要求美兵强奸女生案及以前历次悬而未决的惨案彻底解决，要求美兵犯罪由中国法庭按中国法律公开审判，一面依据情况联系到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出卖军火，进行借款，助长内战，及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等口号①。这样，既利用群众的民族观念和社会公德对强奸行为的公愤以发动和团结群众进行斗争，又可以使运动朝着孤立美蒋和反对美国使中国殖民化的政治高度发展。在1947年“五二〇”运动中，党组织开始从“要饭吃”、“反饥饿”等口号入手，以广泛争取群众参加斗争。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又提出了“反内战”、“反迫害”和其他政治口号，把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1947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蒋管区群众斗争方针的指示》中指出：“我们尽管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借款的斗争，向蒋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在这一斗争中，“适当地提出实施民主自由，肃清贪官污吏，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驱逐反动好战分子与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援蒋内战等口号是很对的”②。

(3)在运动中注意利用合法形式，争取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建立广泛的阵营，扩大斗争规模。毛泽东指出：“被蒋介石政府各项反动政策所压迫、处于团结自救地位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包括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为广泛的全民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366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56页。

族的统一战线。”① 因此，在国统区的人民运动中，建立最广泛的阵容和广泛的统一战线，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1946 年 12 月底抗暴斗争刚爆发，中共中央就及时指示：“望在各城市（平、津、京、沪、渝、昆、蓉、杭等）及海外华侨中发动游行示威，坚持下去”；“在运动中要尽量推动一般中立分子出面，造成最广泛的阵容，并利用国民党所宣布的元旦起实行宪法人权条文，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国民党不敢压迫，并达到暴露国民党之媚外卖国及其国大制宪全系欺骗之目的。”② 在抗暴斗争中，由于采取了这一斗争策略，结果不但争取了国内各界大力支持学生运动，而且也争取了海外华侨积极响应学生爱国运动。海外华侨政党致公党对美军暴行提出抗议，并指出国民党“引狼入室”，“此种卖国求荣行为，实为人民之公敌”，“若政府不临岸勒马，自动请求美军即行撤离中国，是无异自绝于国人，即本党与全国人民当鸣鼓而攻之”③。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致电各界声援学生的斗争，还发动了美军退出中国周和十万人签名运动。在 1947 年的“五二〇”运动中，国统区党组织也十分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果参加运动的不仅有学生，而且有教师，同时还有各民主党派和广大工农群众，形成了一支巨大的反蒋斗争大军。

（4）在运动中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以争取多数，减少斗争损失。在“五二〇”运动中，当国民党立法院以及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和一些大学校长担心国民党的军、警、宪、特的暴行造成事态扩大，主张用调解和谈的手段解决问题时，中共上海局就及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25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6 册，第 366 页。

③ 《反对美军继续驻华事发表声明》（1947 年 4 月 4 日），见《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21—622 页。

时引导群众把矛头指向国民党军、警、宪、特的迫害。5月23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文件中指出：为避免与青年军学生及宪警士兵造成对立，并争取他们同情学运，以瓦解蒋介石镇压后方的力量起见，应通过各种组织、各方积极分子赶紧进行青年军及宪警中的士兵工作，提出适当口号，使之由同情学生要饭吃、要和平的斗争，进到其本身要求加饷退伍的斗争①。一些地方的党组织执行这一指示后，产生了比较好的效果，减少了国民党军警同学生的对立情绪。

（5）在运动中采用灵活多变的斗争方式和策略。1947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蒋管区群众斗争方针的指示》中，要求“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② 这种灵活的方式和策略，既可以在斗争程度上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有利于争取广大群众特别是中间群众；又能如同军事斗争中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防不胜防，使其无法把人民运动镇压下去。

（四）第三条道路的破产，毛泽东关于团结民主党派的统一战线策略

中国各民主党派，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海外侨商和知识分子的政治团体，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后

---

① 《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73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54页。

的维护政协决议、拒绝参加伪“国大”和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的斗争中，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在第三条道路破产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教育下，各民主党派发生了历史性转变。

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后，民主党派有的领袖人物和一些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主张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实行“中间路线”，另走“第三条道路”，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这种主张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只不过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一种幻想，是完全无法实现的。国民党政府对民主党派的打击和镇压，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各民主党派在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尖锐斗争中，坚持与共产党合作，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因而遭到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恨。国民党反动派在向共产党和解放区发动全面军事进攻的同时，也用法西斯手段对各民主党派进行迫害。他们首先把民盟作为首要迫害对象，利用其手中控制的宣传工具对民盟进行一系列污蔑和攻击。随后，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5月3日以中央社名义公布了一份捏造的所谓《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攻击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农工民主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均为中共操纵的工具。中央社在同一天又发表了一个所谓“观察家”的谈话，污蔑“民盟组织已为中共所实际控制，行动亦均系循中共意旨”，“民盟及各民主政团，目前倡组中之民主统一战线，亦为受中共之命，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①。

各民主党派对这种污蔑予以驳斥，指出这“完全是有心陷害的阴谋”，并纷纷致函张群进行质问。国民党当局虽一时还不敢宣

①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326页。

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却在1947年6月1日以后动用大批军队、警察和特务，在全国各大城市对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成员、民主人士和进步教师进行大逮捕，其中民盟成员被捕的就达100余人。同年7月，国民党政府通过并颁布所谓《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的法令后，又进一步加紧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迫害。国民党训令其各级组织机构，对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这三个党派的中下层分子只要发现，不问其情由如何，“一律格杀勿论”。10月7日，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惨遭国民党杀害。11月份，在上海、北平、杭州等8个城市被杀害的民主人士达2100余人，而当时列入黑名单准备加以逮捕的就达6万多人。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终于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0月28日，国民党中央社正式发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的声明，攻击“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企图颠覆政府”；命令“各地治安机关，对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自应依据《妨碍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及《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以遏乱萌”①。民盟中央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交涉，并吁请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面斡旋，结果均遭拒绝。行政院院长张群还威胁说：“民盟总部如不号召解散，各地干部将有700余人继续被捕，罗隆基等有生命危险。”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民盟中央被迫决定民盟自动解散。1947年11月6日，民盟主席张澜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告示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②。11月7日，张澜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表示自己

---

① 《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947年10月27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60页。

②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56页。

“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同时号召全体盟员“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①] 在民盟被迫解散之后，其他民主党派一面谴责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一面纷纷转入地下以保存实力，迎接新的斗争。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则相继密赴香港，筹划和研究本组织的纲领和行动计划。

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党派残酷镇压，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而强令其解散，这表明“中间路线”和“第三条道路”的破产，表明中国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一个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民主党派从这一事实中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当民主党派遭到国民党政府残酷镇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则向他们伸出了热情援助之手，一方面强烈抗议蒋介石的法西斯暴行，声援困境中的民主党派；另一方面则鼓励和教育民主党派清除其内部存在的中间路线思想，转到人民的立场上来。在这一过程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对民主党派采取争取、团结、合作和教育的统一战线策略思想。这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对各民主党派的性质、状况及政治态度作了正确的分析与估计。各民主党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海外侨商及其他爱国分子的政治团体。从阶级关系上看，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及乡村富农，其政治态度是妥协的、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从民主党派看，“这些党派虽带中间性，但其组织成分又常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如民主同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建国会等皆是，而其中政治

---

①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 361 页。

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① 自民盟在蒋管区被迫由其一部分领导人接受国民党的命令自行宣布解散后，全国性的第三大党运动已经失败，民盟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走第三条道路的想法破产，这表明“在中国现况下，要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领导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独裁政权，要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政权，不可能有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独立的旧民主政权”，“自由资产阶级所希望的欧美式的旧民主，在今日世界上已经一去不返”。② 但第三条道路想法的破产并不等于这种想法就完全消失，并不等于民主党派不再恢复活动，“相反，在香港，在海外，乃至在蒋管区许多大城市中，现在已经有，将来还会有代表某些资产阶级集团，或地方性上层集团，或进步的民主分子集团的小党派出现”。由于美蒋随着军事上的失败也注意拉拢民主党派，而民主党派本身的情况又十分复杂，这就需要我们在对他们的统战政策上“需要有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分析”。③

其次，确立了发展进步、争取中间、孤立右翼的政策。由于各民主党派本身情况的复杂，其成员的政治态度差异较大，因此，需要对他们有不同的政策。对于民主党派中进步的左翼力量，无疑是实行团结和发展的政策。对于其中的中间派，则采取争取与合作的态度。对于他们的一些好的观点予以鼓励，对于错误的观点，则进行适当的批评以达到教育他们的目的。1948 年 1 月 14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对中间派和中产阶级右翼分子政策的指示》中指出：“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

---

① 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1948 年 1 月）。

② 《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1947 年 10 月 27 日）。

③ 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1948 年 1 月）。

对在美的冯玉祥，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的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善意的批评态度。”并强调：“对一切应当争取的中间派的错误观点，在报纸刊物上批评时，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说服性。”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右翼分子（包括民主党派中的少数右翼分子），因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并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对他们的反动倾向要予以公开揭露和批评。中共中央指示：“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① 批评右翼分子的反动倾向，目的是从政治上打击他们，把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把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当然，这并不是说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②。

再次，提出同民主党派合作必须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同民主党派合作并建立统一战线，必须以一定的政治原则作基础，不能搞无原则的团结，更不能迁就于他们的一些错误观点。这实际上就是在统一战线中掌握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中共中央在1947年10月27日指出：“反蒋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反帝反封建，就是要彻底摧毁蒋介石所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卖国统治。”而反蒋统一战线的具体纲领，“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双

---

① 《中央关于对中间派和中产阶级右翼分子政策的指示》（1948年1月14日）。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77页。

十宣言，而中心问题是平分土地与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1]。中共中央在1948年1月又指出：实行争取多数的统战方针，“均须以我党的行动纲领（即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及十月十日解放军宣言、土地法大纲）争取之”。[2]

第四，发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共中央于1948年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团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3]。中共中央发出的这一号召，对于争取和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得到他们的纷纷响应和一致赞同。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共就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发出指示，提出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关于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及蒋介石卖国政府的斗争中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要求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就民主党派是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他们是否愿意派代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76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1948年1月）。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145—146页。

表来解放区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首先征询李济深、沈钧儒的意见，并就各民主人士来解放区有何困难，亦望电告。同一天，毛泽东还亲自写信给李济深、沈钧儒，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问题，征询他们的意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上述主张和行动，极大地推动了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合作。毛泽东对此明确指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口号，团结了国民党区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于我党周围。"①

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并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上述统一战线策略，对推动和帮助各民主党派开展革命斗争，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起到了巨大作用。各民主党派和许多民主人士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转变。民盟于1948年1月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严厉谴责蒋介石的迫害行为，宣布不接受被迫解散的任何决定，表示决心为彻底推翻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而斗争，表示积极支持以人民的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反动武装。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也于1947年11月12日至1948年1月1日在香港举行第一次联合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 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等为中央常务委员，并发表《成立宣言》。《宣言》宣布"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集中党内忠于总理、忠于革命之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规定其行动纲领为推翻蒋介石卖国

---

① 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1948年10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7页。

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确定其基本原则为同中共合作，赞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同意新民主主义纲领。其他一些民主党派也表示要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在中共中央于 1948 年 4 月 30 日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后，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从 5 月 5 日起相继发表声明、宣言和通电，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各民主党派和一些民主人士，还根据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在香港等地就召集新政协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意见。与此同时，各民主党派还发动和组织其成员积极开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如进行反蒋政治宣传、策动军政人员起义、从事反蒋军事活动、获取敌方情报、在华侨中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参加护厂护校斗争、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等等，为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有些民主党派的成员在斗争中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八、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继续发展

（一）新政协的筹备与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召开政协会议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各种条件都完全成熟。中国共产党在这种形势下抓紧进行新的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

从1948年8月开始，邀请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先后陆续从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进入解放区。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向他们表示慰问和欢迎。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向宋庆龄发出邀请信。信中恳切地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宋庆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亲切致意和盛情邀请极为兴奋和感动，当时因患病和国民党对她的行动非常注意而未马上北上。1949年6月19日，毛泽东又一次亲笔致函宋庆龄。信中说："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

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①] 1949 年 8 月下旬在邓颖超等陪同下宋庆龄从上海到达北平，受到中央领导人和民主党派人士的热烈欢迎。1949 年 1 月，毛泽东还亲笔致函司徒美堂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司徒美堂是中国致公党元老，爱国华侨领袖。毛泽东在信中热情地说：“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②] 此后不久，83 岁高龄的司徒美堂便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回国参加新政协。

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后，中共中央代表与他们进行协商，在成立新政协的一些问题上很快达成共识。1948 年 11 月 25 日，中共代表与在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共同协议。关于新政协筹备会，协议规定：（1）由中共及赞成召开新政协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共计 23 个单位的代表组成；（2）筹备会的任务是：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负责起草新政协的文件，负责召集新政协的正式会议；（3）筹备会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经各方审阅同意后，俟筹备会集会时正式通过。关于新政协的参加范围及任务：（1）新政协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南京反动政府

---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版，第 326 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314 页。

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2）新政协举行时间在1949年，具体时间及地点由筹备会决定；（3）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两项问题：其一是共同纲领的制定，其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先后从哈尔滨等地到达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共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建设新中国，这为新中国建立后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基础。

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代表来解放区筹备政协的同时，各界人民团体也纷纷建立、扩大或统一起来。1948年8月，在哈尔滨举行了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决定恢复中国工人阶级统一的全国性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1949年3月初，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正式组成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3月至4月，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在北平举行，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成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5月，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成立。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这些全国性群众团体的组建和全国性会议的召开。是新政协会议召开的重要准备工作，也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的标志。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选出毛泽东、朱德、李济深等21人组成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六个小组分别进行以下工作：（一）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二）起草新政协的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后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五）起草宣言；（六）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以迅速完成召开新政协及建立民主联合

政府的准备工作。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总结了中国近百年革命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并为新中国的建立确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

1949 年 9 月 17 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基本上通过由各小组分别起草的政协组织法草案、共同纲领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和其他事项。会议一致同意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确定参加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单位 45 个，代表 510 人，候补代表 77 人，特邀代表 75 人，共 662 人。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不仅包括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国内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宗教界的代表人物，而且还有从国民党营垒分化出来的爱国民主人士，其中包括前国民党政府参加和谈的代表。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工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 1949 年 9 月 21 日在北平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他还指出：“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共同纲领》还明确

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9月30日，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同时又选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180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通过了人民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宣言。会议还通过了给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以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以及从1840年以来在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会后，毛泽东率领全体政协代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执锹铲土。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一致决定，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会议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和罗荣桓为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署检察长。

10月1日下午3时，首都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已成为一个

崭新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国历史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同时，它也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标志着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二）在筹备新政协过程中，毛泽东对统战理论的发展

从1948年5月至1949年9月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了巩固，毛泽东对统一战线理论作了新的论述和发展。

首先，毛泽东通过中国革命的经验，进一步阐述了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①。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又一次强调："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② 他又说：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之一，就是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③。在《将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2页。

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毛泽东在谈到同盟军和统一战线的作用时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所以，"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必须容纳一切愿意参加目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①。

其次，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合作和帮助他们进步的方针。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代表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需要中共进一步增加同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并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中共达成共识。1949年1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指出我党对待民主人士的方针，应该是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政治的及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积极地教育与争取他们。对政策问题，均予以正面解答，不加回避。除党的秘密和某些具体策略外，一切可以公开谈的都可以谈。对政策实行的情况亦应据实相告，在强调说明各种重大成就时，并应指出困难和缺点，以及我们依据群众力量、虚心学习等克服困难和缺点的方法。同时，请民主人士充分发表并提出批评和意见，以加强共同努力的方针。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还指示各地对民主人士可以进行以下方式的工作：（1）依据他们的建议，由我党各部门负责同志作关于战争、军事政策、政权、土改、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妇女运动等问题的报告；（2）举行座谈，除座谈上述报告外，还座谈我党1949年的新年献词，关于和平的八条文告以及有关新政协诸问题；（3）民主人士可以和我任何负责同志谈话，交换意见；（4）组织一部分同志进行日常的接触和交谈；（5）组织参观；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8页。

（6）供给他们以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党的公开文件及材料、解放区建设的材料、报纸及参考消息（无党内消息）；（7）他们得自由与老百姓接触交谈；（8）民主人士间推有负责人，并有分组研究，许多工作进行均经其负责人与我方负责同志商洽；（9）关心他们的生活及疾病。[①] 由于中共采取积极主动的争取、团结、帮助和教育的态度，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代表进入解放区后在政治上思想上进步很快，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很快与中共达成共识。1948年11月，中共代表与民主人士就召集新政协筹备会的一些问题达成共同协议。在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声明，提出和谈八项条件，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并希望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大家起来争取真正的和平、反对虚伪的和平之后，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等55人于同年1月22日共同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的声明，表示他们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革命进行到底，争取真正的和平[②]。这一声明的发表，大大加强和巩固了中共同他们团结合作的政治基础。中共中央对此表示充分肯定，指出："五十五人声明影响极好"[③]。1949年8月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表痛斥美国白皮书的声明，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或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毛泽东读了声明后，两次致函黄炎培，称赞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

---

①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240—241页。

② 《我们对时局的意见——李济深等五十五人于解放区》（1949年1月22日）。

③ 《中共中央关于征求各民主人士对战犯名单意见给东北局电》（1949年1月28日）。

的”；“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①。

第三，初步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下的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种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逐步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②。毛泽东在这里勾画出了在人民民主专政下的统一战线蓝图，确定了各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相关的统一战线政策。这就是：（一）工人阶级领导人民民主专政，也领导人民民主专政下的统一战线。因为这个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③。（二）农民阶级，它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联盟的主要对象，工农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统一战线中最主要的联盟。但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需要长时间的耐心细致的工作，才能实现农业社会化，所以

---

① 毛泽东：《致黄炎培》（1949年8月24日、8月26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33、33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6—143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9页。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①。（三）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工人阶级应当联合的重要力量。（四）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有其很大的重要性。“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市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②。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统一战线的第二个联盟。根据我国的情况，根据工人阶级的斗争任务和民族资产阶级在统一战线的地位，所以必须实行“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③。其具体措施包括：“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而不能采取迁就态度、敷衍态度或关门态度；“每一个大城市和每一个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性区域和每一个省，都应当培养一批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毛泽东强调指出：“全党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认真的检讨和正确的认识，必须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两种倾向，而采取完全正确的态度”④。

第四，论述了建立反帝国际统一战线的问题。针对战后美帝

---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7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79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37 页。

④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37－1438 页。

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实行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冷战”政策和在中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种种行径，毛泽东提出建立反帝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代替法西斯德意日的地位而疯狂地准备新的世界战争、威胁全世界的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们，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极端腐败及其濒于灭亡的恐怖情绪。这个敌人还是有力量的，因此，每一个国家内部的一切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一切国家的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必须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并遵循正确的政策，否则就不能胜利。”①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指出：“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他强调：一边倒，是孙中山的40年经验和中国共产党的28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②。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它为50年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格局的形成确定了理论基础。

（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统战思想的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恢复国

---

① 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48年11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2页

民经济、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在这一过程中，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得到新发展。这种新发展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统战工作重要性方面，毛泽东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统战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指出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指出："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必须做好统一战线的工作。毛泽东指出："在国内，我们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巩固我们这个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不论什么人，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贡献者，我们就欢迎他，他就是正确的；凡对于这个革命的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损害者，我们就反对他，他就是错误的。"② 他说："统一战线是否到了有一天要取消？我是不主张取消的。对任何人，只要他真正划清敌我界限，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要团结的。"③ 他要求全党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改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同我们的关系，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确定了和平赎买和和平改造的方针。这是统一战线策略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运

---

①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8 月版，第 744 页。

② 毛泽东：《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1950 年 6 月 23 日)。

③ 毛泽东：《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1952 年 8 月 4 日)。

用。到1953年初，我国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和各项社会改革胜利完成，国内的阶级关系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在这种形势下，党确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的正确方针，找到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能够进行和平改造，是由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特性和我国当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状况决定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毛泽东指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①]。关于建国后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状况，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②]。1953年9月7日，毛泽东邀约一部分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专门谈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阐述了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和步骤。他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8—759页。

② 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1953年7月9日）。

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但这项工作的进行必须“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毛泽东还十分注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说服教育工作，提出“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①]。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过程中，一是坚持赎买政策，做到在过渡时期，使他们得到的利润除用于扩大再生产外，还能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在改造完成后，也能保证他们的消费财产、生活水平超过人民群众，对一些生活有困难的，则给予照顾。二是把改造企业与改造人结合起来。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改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其具体途径是把企业作为团结、教育和改造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基地，通过鼓励、帮助、教育和使用等方式把他们改造成为抛弃了剥削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名副其实的劳动者。通过这种积极的和风细雨的改造方式，民族资产阶级绝大多数人经过多年的改造和考验，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在我国已不复存在。这是毛泽东统战思想和党的统战政策的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方面，毛泽东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新思想。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内部分同志对民主党派的存在和作用有怀疑和忽视的倾向，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

---

① 毛泽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1953年9月7日）。

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的开幕词中进一步强调，民主党派是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亲密的朋友。“他们一向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① 党的八大通过的决议强调：“必须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继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并且充分发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级协商机构的作用。”②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时，进一步阐明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指出这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希望各民主党派不断进步，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对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改善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关系，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提出了团结教育的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改进和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改善党同非党知识分子的关系，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956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知识分子的特点、阶级属性、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和调动其积极性等问题作了阐述。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指出：我国经济上还没有独立，科学上 也没有独立，文

---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816页。

化落后，要实现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必须充分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搞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一道，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1956 年 4 月 28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时，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他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和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当然，这种方针必须在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等政治标准之下实行。"双百"方针的贯彻，对于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加强党同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合作，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民族问题上，提出加强民族团结，反对大汉族主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主张。毛泽东指出："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他强调："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以便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在国际战略格局上，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建

立新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思想。50年代，中国政府从当时国际形势出发，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联合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反美统一战线。60年代，因苏联霸权主义的扩张及其他多种原因，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处于与苏联、美国两面作战、“两个拳头打人”的紧张状态。到70年代初，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作出新的判断，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其基本内容是：将世界划分为三个部分，苏美两个大国为第一世界，它们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为第三世界，它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是第二世界，如日本、西欧国家等，它们是中间势力，具有两重性，即既有殖民主义的某些特点，又不同程度地受到美苏的控制和威胁。它们虽想维护旧的殖民制度，但又力图摆脱苏美的控制。根据这种分析，毛泽东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要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为打败超级大国的侵略、控制和压迫，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运用，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新发展。它对于打开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改善中国同英国、日本和西欧各国的关系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得到了空前的新发展。中共中央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把毛泽东提出的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把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为包括全体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在内的更加广泛的爱国

统一战线。我们要积极、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十四大决议的精神，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